

# 歷史的轉捩點

古偉瀛 編著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歷史的轉捩點

## 目次

課程簡介	i
前言	I
第一講 公元前 480 年：波希戰爭	1
第二講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帝國	21
第三講 公元前 3 年：基督宗教的興起	35
第四講 公元 476 年：西羅馬帝國的興亡	49
第五講 公元 622 年：伊斯蘭的征服	69
第六講 公元 800 年：歐洲的中古時期	87
第七講 公元 1492 年：地理大發現	109
第八講 公元 1517 年：宗教改革	135
第九講 公元 1776 年：美國獨立	155

This One



7RTK-EZX-8WYH

第十講	公元 1789 年：法國大革命	175
第十一講	公元 1840 年：鴉片戰爭	197
第十二講	公元 1914 年：兩次世界大戰	219
第十三講	公元 1917 年：俄國大革命	241
第十四講	公元 1958 年：電腦科技的創新	261
第十五講	誰的轉換點？	285

## 課程簡介

- 一、課程名稱：歷史的轉捩點
- 二、所屬領域：人文學領域
- 三、學分數：二學分
- 四、授課教師：古偉瀛教授（歷史系）
- 五、課程說明：

（一）歷史是人類對過去的記憶，更是人類教養的重要基礎。作為一個人應該對自己、對社會及國家、甚至世界自古以來的重大的變遷等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瞭解。故本課程中將自古今中外的歷史中選擇若干重要的轉捩點，作一綜合論述。希望能讓同學覺得本課不但能體會到讀史的樂趣；而且也能對歷史上重要關鍵有所掌握，體認歷史知識的可能用處。

（二）目標：

1. 有深度地認識歷史上的關鍵人物或事件；
2. 掌握到若干共通的歷史知識及方法；
3. 引發自行研讀其他歷史之興趣；
4. 希望在閱盡人間天下古往今來之轉折變遷後，對

於自己今後一生之輕重緩急有較清楚的概念及安排。

講授者希望能深入淺出地呈現歷史發展的關鍵，相信縱然不能完全脫出個人主觀選擇，但也絕非迎合時尚，而是在此時此地可供討論及參考的重大歷史議題也。

(三) 本課程共列十六個講授單元，除首次開場外，每一講授單元包括下列各項：

1. 講授主要單元內容。
2. 指定閱讀：配合講授單元之主題，提示相關參考文獻。
3. 思考問題：就每一講授單元或閱讀作業之相關課題，列舉問題若干則，提供學生思考空間，並作為檢驗學習效果之參考。
4. 延伸閱讀：列舉與該單元有關之論著書目，作為學生進一步自修之參考。

(四) 課程要求：

1. 上課方式：演講、分組討論。
2. 評分標準：本課除了期末考外，分組討論時每位同學要提出一次報告，其題目或就你的專業範圍，找出影響此學門的其中一個轉捩點，進行你自己的深度瞭解及詮釋；或者也可就本學期的歷史轉捩點中，任選一個加以整理發揮。如果同學認為自己有更好的看法，認為有歷史上較重要

的轉捩點而未見於本課程中者，也可試擬另一個轉捩點來說明其在歷史上的意義。此報告提出後，再由教學助理帶領同學討論並評分，作為平時成績的重要依據。

學期評分標準：平時成績 50 分（包括課堂出席、發問、報告及討論），期末考 50 分。

期末考範圍涵蓋講授內容及指定閱讀資料。

## 六、教材：

本課程除了本教材外，要求儘量參考閱讀在各講授單元中的參考文獻及延伸閱讀。

## 七、課程進度：

1. 開場：介紹歷史轉捩點的背景、意義
2. 公元前 480 年：波希戰爭
3.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帝國
4. 公元前 3 年：基督宗教的興起
5. 公元 476 年：西羅馬帝國的興亡
6. 公元 622 年：伊斯蘭的征服
7. 公元 800 年：歐洲的中古時期
8. 公元 1492 年：地理大發現
9. 公元 1517 年：宗教改革
10. 公元 1776 年：美國獨立
11. 公元 1789 年：法國大革命

12. 公元 1840 年：鴉片戰爭
13. 公元 1914 年：兩次世界大戰
14. 公元 1917 年：俄國大革命
15. 公元 1958：電腦科技的創新
16. 誰的轉捩點

# 前 言

一直在想如何使得歷史教學能引起興趣，沒想到台大通識課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三年前，我為大學部二年級以上的同學開了一門「歷史的轉捩點」，第一年就吸引了兩百人左右的選課，還有一些旁聽生，由於加選的同學太多，只好抽籤選出一定的人數。三年下來每次上課都是人滿為患，一方面感到高興，一方面也在探究其中的道理。

其實道理很簡單，人類都有想對過去了解的願望，想要從歷史中找出個人及大我的意義。但歷史一去不復返，史實又浩瀚無邊，如何開一門在有限的時間中能讓同學增長見識的課程並不容易。而我想到的是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中有些影響到今日的一些關鍵性轉變的事件或人物，選出其中最重要的十四件，將其來龍去脈及與今日的相關性整理出來讓同學參考，最後再加上一講，對此進行反思，因而有「歷史的轉捩點」此一課程的雛型。

我以自己的出身及後來留學加拿大的教育背景，亦即在中華及西方文化的薰陶下長久住在台灣的人的視野，選出了下列十五個題目：

1. 公元前 480 年：波希戰爭
2.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帝國
3. 公元前 3 年：基督宗教的興起
4. 公元 476 年：西羅馬帝國的興亡
5. 公元 622 年：伊斯蘭的征服
6. 公元 800 年：歐洲的中古時期
7. 公元 1492 年：地理大發現



## II 歷史的轉捩點

8. 公元 1517 年：宗教改革
9. 公元 1776 年：美國獨立
10. 公元 1789 年：法國大革命
11. 公元 1840 年：鴉片戰爭
12. 公元 1914 年：兩次世界大戰
13. 公元 1917 年：俄國大革命
14. 公元 1958：電腦科技的創新
15. 誰的轉捩點

從以上的十四講題可以看出，將中外歷史的重要變遷及關鍵發展都依時間的先後照顧到了。最後一講主題是「誰的轉捩點？」特別討論自己可能有的偏見，並指出歷史的主觀性問題；同時也要求同學自己擬定一個自己認為重要的轉捩點，並分析為何如此選擇的理由，目的無非是要同學有自己的判斷力及主體性，並慎防被人牽著鼻子走。

另一受到歡迎的原因是採取電腦輔助教學的方式。通常上課的方式是這樣的：開始時我先講演今日的主題，將一些重要的名詞及人物加以介紹，其次就以播放 PowerPoint 的方式講授，每一講都先介紹一句與該主題有關的格言式的「歷史短喻學」。例如談到伊斯蘭教時，就引用拿破崙對該教的評論。一方面有開宗明義的作用，一方面也方便大家很快掌握此講的精髓，並使同學印象深刻。除了文字的大綱要外，更從網路上廣為蒐集相關的各種圖像，尤其是配合眼前發生的時事，一方面討論其與歷史的相關性，一方面將最新畫面呈現，不但使教學趣味化，且更生動地、形象地呈現歷史上的關鍵變化。只可惜由於版權問題，所介紹的圖片無法在本書中與讀者分享。每一講的最後，總是會將本次主題加以綜合，

使同學能迅速掌握此講之作為歷史轉捩點的意義。無論如何，有三個原則是教授此課所不斷提醒自己的，那就是與現在的關聯性、趣味性以及最重要的，也是歷史的核心價值——真實性。

總之，我相信歷史是吾人向前邁進的動力來源，有無窮的能量待我們開發及動員，以完成我們個人小我及大我的目標，而歷史的轉捩點即是啟動這些能量的關鍵。這門課程不但希望能增進同學的歷史知識，更希望藉此能學得經驗，汲取處理生活中各種問題的力量與智慧。

三年來同學在期末寫出的教學評鑑及建議，十分肯定，以下是一些較具代表性的感言：

## 2003 年

我覺得以通識課程來說，這是一門絕對可以學到東西的課程。

謝謝老師，這門課很有意義，很有趣，資料豐富，謝謝您！！很值得細細玩味的一門課，歷史可以是嚴謹但有趣的。

這一門課令人獲益良多，可以學到許多有趣事件背後的必然與偶然，也可以因為這門課而激發出許多有趣的想法，狂薦！

此堂課深入淺出的介紹了歷史上的轉捩點，覺得老師上課風趣且內容能引起學生的興趣。

這學期在這堂課中真的有學到東西的感覺，課堂的氣氛

#### IV 歷史的轉捩點

十分有趣，感覺上和老師沒有距離，對於歷史的觀點，有了相當的轉變，這是一堂選了不會後悔的課。

我高中是自然組，但是這門課給我歷史的感覺，獲益良多，老師為了教材搜尋了不少資料，配合深入簡出外加詼諧的言談，此外做報告找資料也見到了歷史的另一面，獲益良多，謝謝老師，辛苦了。

教授，您上課之內容生動有趣，連我這個平常愛打瞌睡的人都聽的津津有味唷。

老師製作的 PowerPoint 很棒，您的上課內容也讓我學到以前很多不知道的東西。

剛開始我只是無意中選到這門課，看到課程大綱時，還以為是歷史(主要是西洋史)總複習，國中一次，高中一次，再多一次也沒差。沒想到內容還挺有趣的，尤其是上課前歷史短喻學，我可以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原本已知的事物。

#### 2004 年

上老師的課真是一種享受  
您真是一位有學養又幽默的好老師  
希望以後還能當你的學生  
謝謝

超級謝謝老師在這一學期以來的教導  
老師的教學方式可以讓學生有更多的深思空間  
發現很多很多事情的發生或出現的背後都有其原因  
這些原因都可以在歷史的轉捩點中找到

希望老師一定要繼續開這門課  
讓更多更多的學弟妹可以有機會向老師學習

這門課的設計很棒，每一次上課都為我們介紹一個歷史上的大事件，從上古到中古到近代到現代，涵蓋很多東西，上課時的投影片很有趣，老師的解說也很棒，常常有一些新的發現，新的見解，真的很喜歡這門課！

## 2005 年

老師上課真的很風趣  
內容也都很吸引人  
會用不同的故事和圖片吸引我們的注意

我覺得我對歷史開始不會覺得無聊反感了

教材豐富，難度適中！棒！

老師的講義把一整段歷史的轉捩點解釋的很清楚，……，很棒。

本書並非本人的著作，而是編輯他人的研究成果完成的，除了全書所引用的諸位前人及學者的研究成果外，感謝下面諸位助理的協助：汪正晟、汪正翔、盧意寧、徐苑儒、李修平，尤其要感謝博士生凌華苓小姐的通盤整理及補充，才有今日的面貌。至於疏陋及偏差之處，當然我應該負責，尚請諸位方家指正。

# 第一講

## 公元前480年：波希戰爭

- 一、波希戰爭的背景與成因
- 二、希臘哲學的成就
- 三、文明對立的反思

希臘的國土一直是貧窮的。但由於智慧和有效的法律，希臘人卻得到了勇氣；而希臘人便利用了這個勇氣，驅除了貧困和暴政。

——希羅多德，《歷史》

黃金時期的雅典孕育了燦爛的希臘文明。當波斯入侵希臘之際，正值雅典最富創造力的時代。雖然戰爭造成極大的苦難，但是希臘人有足夠的自信能超越這些不幸與偶然，進而不屈不撓地凝視痛苦。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便認為，當希臘人心靈康健、充滿活力時，他們熱愛悲劇，並且能將此悲傷昇華為生命的力量。然而當希臘日趨衰疲時，他們反而無法接受悲劇的刺激。<sup>1</sup>事實也確實如此，當希臘歷盡艱辛，終於戰勝強敵波斯，他們的自信心也愈發堅強。希臘人堅信，以一個蕞爾小邦打敗橫跨歐亞的波斯強權，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生活方式

---

<sup>1</sup> 參看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悲劇的誕生》。

## 2 歷史的轉捩點

（城邦體制）的勝利。它使希臘人贏得了自我發展其經濟生活（不需要向外國朝貢和交納賦稅）和政治制度（不受東方諸王獨裁統治）的機會。同時也使得希臘商業獲得了徹底的海上貿易自由。薩拉密斯海戰後的雅典艦隊，為希臘貿易開闢了地中海沿岸的每一個港口，繼之而起的商業擴展，提供了雅典在伯里克里斯(Pericles)時代娛樂和文化上所需要的財務支持。

### 一、波希戰爭的背景與成因

波希戰爭(Greco-Persian Wars)之所以成為歷史上著名的戰爭，與希臘在西方文明史上的重要性有不可割捨的關係。因此在探討波希戰爭的意義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希臘文明的特質與其對西方世界的影響。

英國詩人雪萊(Percy B. Shelley)曾經感性地說道：「我們都是希臘人，我們的法律、我們的文學、我們的藝術、我們的宗教皆根源於希臘。」詩人多情，不免誇大其辭；然而考諸歷史，的確很難找到還有其它文明能如此鮮明地反映現代西方所標榜的精神。諸如肯定人性，追求自由，高唱理性，甚至於倡行民主政治等種種特徵，<sup>2</sup>都能發現與

---

<sup>2</sup> 大體而言，在伯里克里斯時代的雅典，很多民主政治的慣例已經成熟，但那是直接民主政治的慣例而非現代的代議政治。雖然很重視官吏的選舉，但是它係根據所有公民應有同等機會以任官職的原則，通常是由抽籤決定。整個制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徵是，為數極多的公民參與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各部門基層工作。在美國，新英格蘭各州的鄉鎮集會與雅典的直接民主政治最為相似。當然，這種由每一公民參與的直接政治對於人口眾多、問題複雜的二十世紀的民主政治而言是十分不切實際的。然而，對現代民主政體論者而言，回想伯里克里斯說的話：一個

現代世界的關連。由此看來，今日西方對波希戰爭的重視，絕非僅僅為了傳頌過去的豐功偉業，而是為了尋找其文明的根源，了解我之為我的原因。

## （一）城邦體制

在希臘文明的諸多特徵當中，城邦體制無疑地最具有關鍵的意義。它是希臘政治、軍事與經濟的基礎。從形式來看，典型的城邦是以一個城市或城堡為中心，包括附近數公里以內的若干村落組成，與其他城邦之間往往有山河海洋為自然邊界。在中心城市可以看到供奉神祇的廟宇，設有法庭的簡陋建築物以及可作為集市和舉行政治集會的廣場。這種城邦既不同於古代東方那種包括眾多城市和地區領土廣大的國家，也不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據記載，一般城邦面積為五十至一百平方哩，最大的城邦也不過是一千平方哩，相當於中國的一個大縣。半徑超過十哩的城邦只有幾個。居住在每一個城邦狹小疆域的城鄉公民人數在六百至一千二百人之間。總人口一般約數千人，數萬人的並不多。全盛時期的雅典(Athens)城邦，人口也不過四十至五十萬。

## （二）雅典的民主

城邦中又以雅典最具有代表性。雅典地處於阿提卡(Attica)平原上，農產豐富，礦藏充足，並擁有良好的港灣。種種條件使得雅典能夠和平地發展貿易與城市文化。早期的雅典，經歷了王政、貴族、寡頭與僭主等政治體制，在

---

逃避公民責任的人，則被視為「無用之人」一語，是極富啟發性的。

#### 4 歷史的轉捩點

西元前七世紀，政治家梭倫(Solon)開始雅典的民主改革，並立法解除窮人的債務。接著克來斯提尼(Cleisthenes)建立五百人會議，落實民主政治的原則。<sup>3</sup>最後在伯里克里斯時代，公民大會獲得了立法權，雅典的民主達到巔峰。<sup>4</sup>其中

---

<sup>3</sup> 克來斯提尼(Cleisthenes)發動徹底的行政改革，擴大「公民大會」的權限；但是這個機構，由於是由所有男性公民組成，組織太龐大而無法執行例行公事。因此，例行公事就付託由雅典政府的地方單位——「區」(demes)代表組成的「五百人會議」(Council of Five Hundred)處理。「區」是克來斯提尼改革的樞石。從前，每個雅典公民來自四個傳統的部族之一，每一部族有它自身地方的基礎，沿著海岸，在平原或在山區。因為，地方和黨派的利益在犧牲了全帕勒斯的福利下而有所助益。克來斯提尼掃除原有地理的部族區分，建立十個新部族，每一部族包括若干散布於雅典境內之「區」。在嶄新的安排下，部族無足輕重，重要的是「區」本身。這種「區」幾乎有二百個之多，大約與現代的行政區域如教區、鄉村，或選舉區相類。克來斯提尼藉此摧毀了貴族勢力的舊有部族基礎。他准許「區」有地方自治的權利，而且允許公民在「區」內獲得公職進而參與中央政府的事務，以增加公眾的素質。

<sup>4</sup> 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是雅典的最高權力機關，廿歲以上的男性公民均可參加。所以其他國家機關，如五百人會議、陪審法庭、貴族會議、十將軍委員會以及執政官和其他國家公職人員，都隸屬於公民大會。大會每年召開四十次，聽取一切官吏的重要報告，舉行辯論和通過各種提案，選舉國家官吏，制定法律，決定戰爭與和平等國家大政方針。遇上特殊情況，還可召開非常大會。在公民大會上，與會者可以自由發言並討論議案，每個雅典公民都有權對現行的政策措施和任何公職人員進行評議，提出意見。表決通常採用公開舉手的方法，以多數票為通過。在選舉公職人員時，除了選舉十將軍以外，採取秘密投票方式。公民大會是實施直接民主最重要的機關。

五百人會議：五百人會議實際上是雅典的政府。它除了為公民大會準備議程和預審提交公民大會討論的議案外，主要是執行公民大會的決議，負責日常行政會議。由雅典十個區從年滿三十歲的男性公民中抽籤產生五十人組成，任期一年。五百人會議的常設機構是五十人團，由五百人



以「陶片放逐法」(Ostracism)與抽籤任官法最能體現此時代民主的精神。<sup>5</sup>本於這些制度，雅典的民主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在世界各古文明當中，幾乎是絕無僅有的。無怪乎伯里克里斯自傲地說：

我們熱愛美好的事物，而不因此奢靡；我們熱愛智慧，卻不因此意志薄弱。富有，我們並不以此誇耀私己，而以之服務公益；貧窮，我們並不以之為恥，儘管我們認為不去克服貧窮是可恥的。我們相信一個人應像關心個人事務一樣關心公共事務，因為我們認為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不但是無趣的，也是沒用的。<sup>6</sup>

——伯里克里斯，《葬禮演說》〈論雅典的理想〉

### (三) 斯巴達——極權的軍事政體

相對於雅典，斯巴達(Sparta)走向另外一條截然不同的

---

會議成員分組輪流執行，每組輪值一個月。國家的最高元首——主席由抽籤產生，負責保管國家檔案庫、國庫和國璽所在地神廟的鑰匙。五百人會議和陪審法庭都對公民大會負責。然而，西元前四二九年之前的民主派領袖似乎都是貴族出身。

<sup>5</sup> 陶片放逐法：每年的第六個月份，雅典公民均舉行公民大會表決是否需要投票以流放具有政治野心的政客。如果同意則於同年八月舉行流放投票，由每位公民將希望流放的人名刻寫在陶片上。抽籤任官法：在古代雅典除了專業軍事將領外，所有官員均由抽籤產生。每一位雅典的成年男子，都可以投下刻有自己姓名的木球。

<sup>6</sup> 並非雅典的所有公民都是欣然地履行公民的義務。為誘使公民出席「五百人會議」和法庭的常會，它供給日薪和免費餐食。但這種誘導不適用於「公民大會」，而且似乎只有部分市民參加大會。鄉下的農夫認為，要放棄自己工作，整日跋涉走向城裏，是件艱難的決定。因而住在城裏的人控制了雅典政府。

## 6 歷史的轉捩點

道路。就地理位置而言，斯巴達位居四戰之地。早期的歷史即是一部不斷與周圍民族征戰的歷史。它必須維持軍事化的組織，以應付頻繁的戰事。同時斯巴達也缺乏如雅典一般豐富的礦藏與良好的港灣，因而無法發展繁榮的商業貿易，只能維持基本的農業生活。基於這種外力的威脅與農業的生活型態，斯巴達的體制一開始便具有一種集體化與軍事化的傾向。這種傾向幾乎觸及社會與經濟的每個層面。舉例而言，為了維持軍隊之素質，斯巴達的嬰兒自一出生便要接受嚴格的篩檢。資質差的就被扔到深山裏。又為了鼓勵尚武之風，斯巴達的男人必須以武力在新婚之夜將新娘帶走。可是結婚之後往往又少有家庭生活，許多斯巴達的男子直到小孩出生都不知道自己的妻子面貌如何。不過儘管斯巴達有上述迥異於其它希臘城邦的特徵，斯巴達仍然自詡以法治治國。

### （四）波斯——東方的專制帝國

相對於希臘的城邦體制，波斯是一個不斷擴張的帝國(Persian Empire)。西元前五五九年，波斯剛開始是西南波斯地區的一個小國家，在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 529BC)時，征服亞洲少數民族，逐漸日益強大。其後陸續征服了里底亞、巴比倫與埃及等國。西元前五五二年，大流士(Darius)繼位，其文治武功皆有可觀之處。大流士統治從蘇薩(Susa)的首都，到瑪代(Media)的亞馬他(Ecbatana)，他的帝國涵蓋亞洲古代少數民族的活動範圍，如敘利亞、埃及、巴勒斯坦、阿拉伯、波斯、美索不達米亞，還有現在的阿富汗、阿曼、亞塞拜然、土耳其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西巴基斯坦，還有部分現在的吉爾吉斯。這個龐大的帝國分成二十

個行政區域，由緊密的波斯七大家族聯合的團體所治理，並且由包括一萬名持矛士兵和騎兵組成的傭兵保護。相同的貨幣，相同的市場和貿易路線，使帝國延續了超過二百年。直到西元前三三〇年才為亞歷山大(Alexander)所滅。

### （五）愛奧尼亞的叛亂

西元前五五〇年，波斯的勢力擴張到小亞細亞沿岸，即所謂的愛奧尼亞(Ionia)地區。米利都(Miletus)便位於此地。其統治者本是大流士的女婿，但在攻打納克索斯(Naxos)的戰役中失利，因而擔心自己原本的地位不保，惶急之餘，煽動其他愛奧尼亞城邦叛亂。為了爭取援助，他首先向斯巴達尋求支持，但斯巴達拒絕提供任何支援，只有雅典和埃雷特里亞(Eretria)給予援助，提供了不到三十艘的船隻。儘管兵力單薄，但在戰事初期，叛軍卻取得出乎意料的成果。西元前四九八年，愛奧尼亞諸城邦普遍發生叛亂，然而只是曇花一現。就在攻打薩狄斯(Sardis)時，叛軍為波斯所擊敗，米利都繼而失陷，愛奧尼亞的叛亂可說是徹底的失敗。希臘人對此深感哀悼，據說當描寫米利都失陷的戲劇在雅典上演時，所有的觀眾都熱淚盈眶。

### （六）馬拉松平原之戰

對於大流士而言，愛奧尼亞的叛亂雖然成功收平。然而雅典人援助愛奧尼亞人這筆帳卻還未算清。西元前四九〇年，在一連串對希臘城邦的征討後，大流士終於決定向雅典進攻。他派遣了兩萬多名的士兵於馬拉松(Marathon)平原登陸，矢志要消滅雅典，進而降服斯巴達。當時雅典

方面只有一萬多名士兵。為了求救兵，雅典派了跑步最快的信差費迪皮底斯(Pheidippides)在三十六小時內飛奔至斯巴達，<sup>7</sup>但斯巴達因為宗教原因，要等到滿月才出兵，情況十分危急。

在此存亡之秋，希臘決定以米勒喜底斯(Miltiades)擔任指揮官。由於波斯軍隊的主力由弓弩手組成，因此當希臘的軍隊前進至波斯軍的射程內，便必須將移動的速度加倍以免為弓矢所傷。然而在這種速度下要維持原來的陣勢幾乎是不可能，這對於希臘軍的統帥無疑是一大難題。不過由結果看來，希臘軍奔跑的戰術的確是成功的。事實上，正是因為奔跑時，面對敵方中央的攻擊，造成隊伍兩翼的突出，才能對波斯軍隊形成包圍。<sup>8</sup>結果波斯軍隊在希臘軍隊的包圍下擠成一片，秩序大亂，死傷六千餘人，反觀希臘人只死了近兩百人。馬拉松之戰，希臘人獲得了全面的勝利。

### （七）薩拉密斯戰役

西元前四八六年，大流士在統治三十六年後去世，由薛西斯(Xerxes)繼位。薛西斯無法忍受父親的失敗，以五年的時間籌備，計劃攻打希臘。西元前四八〇年，波斯動員了十五萬的士兵與近兩百艘船攻打希臘，這是史上罕見的軍事。但薛西斯在一意增加兵力的同時，卻忽略了補給的問題。另外一個隱而未發的致命弱點是，大部分波斯人生

---

<sup>7</sup> 全程約二百四十一公里。奧運馬拉松賽跑項目即為紀念此事。

<sup>8</sup> 這個結果與三百年後，漢尼拔(Hannibal)在卡坦戰役造成的形勢極為相似，但只不過出於巧合罷了。

活離海遙遠，甚至根本不會游泳。他們和海疏遠的關係可說是戰爭成敗的關鍵。（中國歷史的赤壁之戰差可比擬，曹軍雖然看似軍容壯盛，然而實際上所屬龐雜，又不習水性）

雅典當此危局，幸虧狄密斯多克里斯(Themistocles)早有遠見，建設了一隻強大的艦隊。在陸上，則由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Leonidas)率斯巴達精兵三百人防守詹莫皮萊(Thermopylae)隘道，作為希臘軍的屏障。然而波斯王亦非等閒，他繞過易守難攻的隘道，從後面突擊斯巴達軍隊。結果斯巴達國王及其三百壯士皆力戰而死。經此一役，希臘屏障盡失，只能退守薩拉密斯(Salamis)海灣，縮小防禦面。此時希臘人心惶惶，許多城邦皆打算撤離薩拉密斯海灣。然而狄密斯多克里斯卻堅決主張在薩拉密斯灣決戰。其理由有二：第一，波斯軍長途跋涉，補給困難，全賴海軍運補才能繼續戰爭。所以只要能摧毀波斯海軍，波斯軍必然得立刻撤兵；第二，薩拉密斯灣地勢狹隘，波斯大軍無從施展。以現代軍事的觀念來說便是預設有利戰場，縮小接戰面，以降低敵軍在數量上的優勢。然而這種戰術成功的關鍵在必須確定波斯艦隊會從薩拉密斯灣進攻。為此，狄密斯多克里斯甚至放棄了薩拉密斯灣的防禦以引誘波斯軍，並放出謠言，說希臘軍將由薩拉密斯灣逃跑，只要波斯軍在此阻截，必能大敗希軍。戰事開始後，正如狄密斯多克里斯所料，波斯的艦隊全部擠在狹隘的海灣中動彈不得，以致為希臘海軍所敗。波斯艦隊有二百多艘沉沒，而希臘艦隊僅損失四十多艘。波斯制海權盡失，波希戰爭的成敗至此昭然若揭。

## 二、希臘哲學的成就

希臘文化光彩輝煌，在各個領域皆有長足發展，於今看來，某些部分更展現了超越時代的「先進」；其中最精采者，莫如希臘的哲學。

希臘哲學起於西元前六世紀希臘的米利都城，當地居民開始擺脫紛亂物質世界的表象，試圖思索其中的基本原理。該派創始人泰利斯(Thales)認為萬物皆由水所構成，由此打破了希臘人關於世界起源的神話信仰，而代之以理性的探索，被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譽為哲學之父。因此這時期哲學的發展，主要是關於今日哲學中宇宙論與物理學雛型的探討。到了西元前六世紀末，希臘哲學開始轉向形上學，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針對存在問題，首先提出精神與物質的二元論，由此展開了世界究竟是恆常穩定，還是變幻莫測這一至今爭論不休的問題。德謨克里特(Democritus)的原子論，提出一種調和的看法：原子論者主張，宇宙的基本要素是數量無限但無可分割的原子，這些固有而形狀各異的原子，經由偶然的結合、分離與再結合，形成了萬物的形態與生滅。因此人和樹唯一的不同，只在原子排列組合的方式不同，這反映希臘哲學早期唯物主義的傾向，德謨克里特因此否認靈魂不滅與神靈世界的存在。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在道德上卻是一個堅定的唯心主義者，他說：「善不僅意味著不去作惡，也意味著不願去作惡。」再看看西元前六世紀的哲學家色諾芬尼(Xenophanes)所說的話，當可更加感受希臘人思想上的突破：

人認為，神也是生出來的，會說話，有形體，穿戴和

人相同。如果牛、馬或獅子也跟人一樣，有手，能用手畫畫，能從事藝術活動，那麼，馬會把神的模樣畫得像馬，牛會把神的模樣畫得像牛，每一種動物都會把神的身體描繪得跟自己一樣。埃塞俄比亞人說，他們的神是黑皮膚、扁鼻子；色雷斯人說，他們的神是藍眼睛、紅頭髮。<sup>9</sup>

### （一）智者學派的興起

大約西元前五世紀中期，希臘開始一場知識革命，隨著雅典民主的高峰期，哲學家放棄了對物質世界的研究，轉而思考與人密切相關的問題。智者學派由此興起。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是其中最重要的詭辯家之一，「人是萬物的尺度。」正是他的著名格言，概括了智者學派哲學的要義。智者學派許多時候雖是城邦政治鬥爭的幫兇，但他們這種十分「後現代」的態度，卻也擴展了人們對於複雜人世各種權威、道德、真理、主張的思考，正如西賽羅(Cicero)所言，智者學派這種關心人事的傾向，把「哲學從天國帶到人間」。也就在智者學派的孕育下，產生了希臘哲學最偉大的時期。

智者學派的興起，還有其政治與社會的背景。當時整個希臘文化因為城邦之間長年爭戰而盛極轉衰，在外部的壓力下，雅典原始的氏族民主制度，已趨崩壞，權勢人物挾民主以自重，漸漸成為城邦政治生活的實際操控者，這可以由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劇本《騎士》的台詞看出，

---

<sup>9</sup> 轉引自斯塔夫理阿諾斯(L. S. Stavrianos)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第八章：希臘和羅馬的文明，（上海：新華書店，1999）。

一位將軍在勸誘一個賣香腸的小販奪取民主派領袖的職位：

賣香腸的人：……怎樣才能成為那樣的大人物？

將軍：……你已具備一切應有的條件：卑賤的出身、受過市場交易的鍛鍊，又蠻橫無理。

賣香腸的人：我想我還不夠資格。

將軍：不夠格？……你父親是一位紳士嗎？

賣香腸的人：……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無賴。

將軍：幸運兒！你要擔任公職的話，已有一個多麼好的開端啊！

賣香腸的人：可我幾乎不識字。

將軍：……適於作人民領袖的不是那些有學問的人，或者誠實的人，而是那些無知而卑鄙的人。千萬不要錯過這個絕好機會。<sup>10</sup>

這種混亂的政治情境，不僅是雅典一邦的特例，而是整個希臘世界普遍的寫照。人們發現，那些城邦政治生活過去賴以成立的傳統觀念、習俗與信仰，在野心家的操弄下，不再符合大多數人心中公義的觀念，城邦之間為不同的政治制度與生活方式作戰，更促使在紛爭下的人們反省，自己以為天經地義的傳統觀念，是否確是無可懷疑的至理。在此情境下，出現了許多因應政治生活的職業辯士，他們在傳授煽動人心、唇槍舌戰的技巧之際，發展出一套邏輯思考，因而對許多舊有制度賴以成立的前提，提出深刻的

---

<sup>10</sup> 轉引自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新華書店，1999），頁215。



批評。由於這些習慣衍生的制度往往缺乏邏輯的一致性，常在批評下體無完膚，也就造成智者學派的新思潮：認為所有政治法律制度與相關的道德，不過是不同人群一時的選擇或習慣（無論出於強者或弱者的意願），故而也就沒有什麼普遍的真理存在。制度道德的價值，端視其是否滿足特定人群的需求。

智者學派的興起，無論對哲學或倫理學的發展，原有其正面的意義。他們因為不相信既有的權威，自然比較傾向有利多數人的政治措施，如取消奴隸制，要求平等的公民教育及財產權，甚至提出男女平等參政的主張。但隨著全面批評產生的懷疑論、個人主義與相對主義，卻也衝擊了政治以外的倫理道德秩序，造成人心失序，價值虛無的亂象。如果沒有終極真理，一切善惡將只是個人的一時興致（後現代主義者傅科即如此主張），生命除了苦痛，又還有什麼價值呢？更有甚者，既然價值相對，政治便僅剩下弱肉強食的法則，全無正義公理可言。那麼不僅宗教、道德、國家，甚至連社會自身也將無法維持。這種憂心的結果，導致了希臘哲學轉向倫理學的偉大探索，試圖重新尋求終極真理。

## （二）蘇格拉底的倫理學

正是感於這種相對主義對政治生活的傷害，蘇格拉底(Socrates)挺身而出。蘇格拉底出身雅典的工匠之家（稍後將分析這種出身對於他一生思想的影響）。由於靠自學而成，蘇格拉底所接受的教育訓練，自不免帶有當時流行的智者學派的色彩，這可從他慣於以詭辯技巧引人思考看出，這也是當時知識人表達想法的共有模式。不同的是，

智者學派的末流，著重以辯論否定普遍價值的存在，而蘇格拉底卻想要藉由辯論證明，經過理性的思考，揭穿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之後，仍然存在一些真理。可以說，蘇格拉底雖然接受了智者學派對既存觀念的懷疑態度，但並不滿足於此，他更希望在摧毀不牢靠的舊觀念後，能重建真正普遍的倫理價值，以支持理性公義的政治秩序，而這種政治秩序，在他看來，絕非當時眾聲喧嘩的民主制度，而是賢明的貴族政治。遺憾的是，也正是這樣的政治主張，觸怒了雅典的極端民主派，導致由該派控制的法庭判處蘇格拉底死刑。

蘇格拉底認為，只要透過謹慎的思辨，啟蒙每個人固有的理性，就能重獲共識，這是因為他預設以下的前提：人們所以意見紛然，並不是因為真理不存在，只是因為人們缺乏知識。在他看來，充分的知識將導致共識，也就是普遍倫理價值的善，因此知識也就等同於善。他宣稱人類生活目的不在聲色犬馬，乃是追求德行；而他所謂的德行，即是基於對善的認識。然而什麼是善？蘇格拉底教導人們，善總是與有利與有用相吻合。以此推論，德行便成了對於符合預定目的與有用的事物的認識，也就是說，蘇格拉底將美德比作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才識。依靠自己的才智，蘇格拉底其實想要向世人說明，傳統的倫理觀念真正的核心價值是什麼，並盼望人們經由反思，仍能維護固有的權威與秩序。這種經過理性闡釋傳統的信念，使他與全然挑戰價值，促進新時代來臨（無論新時代的好壞）的智者學派與民主派，有了根本的差別。

簡單的說，蘇格拉底企圖訴諸某種實用理性的觀念，來重整一個舊有共識日趨崩潰，政治活動紛擾無效率的社

會。這種實用理性與工匠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作為有技術的公民，工匠比一般人更習於理性地評估行為所產生的結果，而不致流於全然的抽象思考。他所關注的首先是如何做好，而不是各種各樣的理想概念，這使得工匠不容易受到民粹主義的影響。在一個已充滿懷疑論與價值相對主義的時代，蘇格拉底只能借重這種工匠的實用理性，把善建立在更有效的處理人生問題這一命題上，而不真正提出一個普遍恆常的信念（雖然他本人確實遵守一種自制、正直，寧願人負我，不願我負人的道德標準）。此可說是蘇格拉底聰明之處，也是其努力的悲劇所在。日後尼采激烈批評蘇格拉底的樂觀思想是希臘文化衰敗的產物，其實只對了一半，蘇格拉底比起悲觀的智者學派，有著更堅強的意志與洞察力。現代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列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便指出，蘇格拉底充分了解，人類政治社會生活在實際上，無法以哲學所推出的真理與知識來運作，因此他與許多明哲的思想家一般，在其宣講中包含了兩個層次：一個是通俗的常識，用以教育大眾；另外深奧的部分，則只留給少數慎思熟慮的精英反省。可以說，他與現代哲學的不同在於，蘇格拉底抑扼了自己追求知識的衝動，而以仁厚之心致力維持社會的穩定。

### 三、文明對立的反思

回過來看波希戰爭的意義。上述關於希臘與波斯生活方式的對抗，一般視為東西對立的具體呈現與強化。希羅多德便認為波希戰爭是自由與奴役、民主與專制（所謂東方的專制）之間的抗爭。在這個意義上，波希戰爭作為歷

史的轉捩點確實是當之無愧。也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理解雪萊所說的「我們都是希臘人。」這句話背後真正意涵。如果沒有波希戰爭的勝利，希臘文明便不可能綿延長久，建立在希臘文明之上的羅馬帝國面目將變成如何也難以想像。如此一來，今日的西方文明究竟會如何，任誰也無法預料。

以客觀冷靜著稱的希臘史家修西底德(Thucydides)解釋波希戰爭的起因：

希臘人從異邦人那裏劫走了一個婦女，  
異邦人從希臘人那裏劫走了一個婦女，  
希臘人又從異邦人那裏劫走了一個婦女。

上述那種東西正邪對立的概念是否確能成立？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薩伊德(Edward Said)批評所謂的東方，往往是西方人為了對照自己而建構出來的。若以此概念來檢視上述東西對立的說法，所謂希臘文化的優越性與西方價值的勝利等等概念，便有重新檢驗的必要。事實上，這並非什麼新奇的論調，西方學界已然意識到，希臘的影響有被誇大之虞。希臘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龐大的奴隸勞動上，也早已為人所熟知。因此有理由懷疑，波斯的野蠻，甚至於斯巴達的極權，都可能是西方學者本於文化成見與現代經驗（譬如法西斯，Fascism）而過度渲染的結果。發現頻道(Discovery)曾經製播波斯的專輯，描述波斯宮殿中，聳立數百根極為平整光瑩的圓柱，巧妙地布置在四周。當外邦的使臣朝見偉大的波斯君王時，他們由漆黑而漫長的階梯拾級而上，進入大殿之際，陽光當頭照耀，所有的圓柱同時將日光聚合至殿堂的中心，剎那間光明奪目，謙卑之情油然而生。此一形象所展現的，並非衰頹腐

敗，而是君臨萬邦的泱泱氣象。

就某方面而言，也許世人該試著如同朝覲的使臣，懷抱謙虛的心態去領略每一個文明。作為歷史關鍵的波希之戰，才可能獲得比較中肯的評價。事實上，希臘文明給我們最寶貴的啟示之一，恰恰便是謙卑中肯，探求真相的歷史學精神。希臘偉大的史學家修西底德如此寫道：

雖然對於遠古時代，甚至對於我們當代以前的歷史，由於時間遙遠，我不能完全明確地知道了。但是盡我的能力所及，回憶過去，所有的證據使我得到一個結論，過去的時代，無論在戰爭方面，或其他方面，都不是偉大的時代。……

我這部歷史著作很可能讀起來不引人入勝，因為書中缺少虛構的故事。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的類似事件（因為人性總是人性）的人，認為我的著作還有一點益處的話，那麼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久遠。<sup>11</sup>

修西底德這種深刻反省的知性真誠，或許才是希臘文明令人懷想的真正原因。

**§ 波希之戰作為轉換點：**

- ◆ 民主與極權之戰。
- ◆ 東方與西方之差異——一種偏見？
- ◆ 雅典之黃金盛世。
- ◆ 志得意滿之際，即是走向衰亡之始。

<sup>11</sup> 修西底德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第一卷第一章。

## § 參考文獻

1. 布林頓(Crane Brinton)著，劉景輝譯，《西洋文化史》（臺北：臺灣學生，1984）。
2. 王晴佳，《西方的歷史觀念——從古希臘到現代》（臺北：允晨，1998）。
3. 王斯德主編，沈堅、金志霖著，《世界通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1）。
4. 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務，1998）。
5. 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新華書店，1999）。
6. 富勒(Fuller JF)著，鈕先鍾譯，《西洋世界軍事史》（臺北：軍事譯粹社，1968）。
7. 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著，羅建仁譯，《西洋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1998）。
8. 陳啟能主編，《西方歷史學名著提要》（臺北：昭明，2002）。
9. 黃俊傑，〈古希臘民主政治的制度及其涵義〉，《歷史的探索》（臺北：水牛出版社，1981）。

## § 思考問題

1. 雅典民主的極端發展，導致社會共識的瓦解，而有蘇格拉底悲壯的奮鬥。這對我們觀察今日臺灣的民主社會現象有無啟發？
2. 希臘以彈丸之地而抗擊帝國，除了軍事上的因素，希臘人民有何成功之道？

## § 延伸閱讀

1. F. I. 芬利主編，張強、唐均、趙沛林、宋繼杰、瞿波譯，  
《希臘的遺產》（上海：上海人民，2004）。
2. 柏拉圖(Plato)著，吳獻書譯，《理想國》（北京：商務，  
1986）。
3. 修西底德(Thucydides)著，謝德風譯，《伯羅奔尼撒戰爭  
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4. 伊蒂絲·漢密爾頓著，徐齊平譯，《希臘方式——通向  
西方文明的源流》（杭州市，浙江人民，1988）。
5. 列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自然權利與歷史》（北  
京：三聯，2003）。
6. 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王志弘、王淑燕、莊雅  
仲等譯，《東方主義》（臺北：立緒，1999）。

## 第二講

#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帝國

- 一、秦國崛起的條件
- 二、秦始皇鞏固統一的各項措施
- 三、秦帝國覆亡的原因
- 四、秦帝國統一的意義

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

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

### 一、秦國崛起的條件

何以一個各方面相對落後的邊陲小國，能夠終結自春秋、戰國以來，長達五百五十年的霸主迭興、群雄混戰的局面，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東亞大帝國？秦帝國雖僅有短暫的十五年壽命(221BC~206BC)，然而威名遠揚，<sup>12</sup>對後世

---

<sup>12</sup> 說明帝國威名甚至遠揚於中華世界以外的例子是，秦(Ch'in)這一名稱很可能是英語「中國」(China)及各種非漢語中其他同源名稱的原型。例如，“Thinai”和“Sinai”就作為這個國家的名稱，出現在公元一、二世紀的希臘和羅馬著作中。參見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第一章與同章註2，頁33~34。



有無可比擬的影響。箇中原因，必須從它崛起的條件開始探究。

### （一）地理優勢

秦國本是僻處西方的一個小國，其文化更為中原國家所輕視，甚至被視為西陲的戎狄之流。但也因此，當東方六國為了爭權奪利而拼個你死我活之際，秦國卻往往能處於風暴圈外，努力儲備自己的實力，進而一舉奪天下。不僅如此，秦國所處的關中地區，經濟資源可說是非常豐富，後來取得的四川一帶，也是沃野千里，出產富饒。秦國的西北草原還能畜養大量的牛馬，以利作戰所需。自古以來，能掌握關中經常就能控制華北，秦國正享有這樣的地理優勢。

### （二）重用客卿

秦國的富強，重用客卿也是原因之一（李斯的名文〈諫逐客書〉，專門在闡述客卿的作用）。秦國雖然物產豐饒，但是缺乏優秀人才。由於秦國求賢若渴，對於遠來的人才，君王通常破格重用，完全不因他們是客卿，而心存懷疑。例如春秋時代的秦穆公，費盡心血爭取到老邁的百里奚和蹇叔，甚至連這兩位老人家的兒子也一併重用，好讓他們在秦國能落地生根。秦國君主對於賢才的種種禮遇，逐漸贏得東方遊士的好感，紛紛前來求發展。如商鞅、張儀、范雎、呂不韋、李斯等，皆是東方人，他們對於秦國的發展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若沒有商鞅變法，秦國能否邁向富強還是未知；若非採用張儀、范雎所設計出的種種外交

政策，秦國想要以一敵六，無異於痴人說夢；而李斯對於秦國統一事業的完成與穩定，同樣功不可沒。秦國的富強，大半應歸功於異國人才的效力；而客卿能夠全力以赴，一展長才，必得有君主的信任支持才行。

### （三）商鞅變法

秦之所以能兼併六國，統一天下，商鞅變法是一個重要的關鍵。秦孝公(361BC~338BC)即位後，力圖振作，下詔求賢，吸引商鞅前來投奔。商鞅是衛國的公子，本游仕於魏，但魏惠王並不重用他，於是他自魏赴秦求發展。商鞅在秦孝公堅決的支持下實行變法，歷時一、二十年，使秦國變成一個「兵革強大，諸侯畏懼」的富強國家，整個社會形成了「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的風尚，出現了「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山無盜賊，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及《戰國策·秦策一》）的局面。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可分成以下五項來說明。首先，商鞅將秦國東方靠近魏國處的新占領地，編組成三十一縣，並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縣令、縣丞等官員統治，此舉對於後來郡縣制的發展貢獻極大。其次，實施什伍之制，把人民納入組織，以十家為一大組（什），五家為一小組（伍），相互監視，連帶負責。第三，禁止已婚男子繼續與父親同居，此即「分異之法」，用以摧毀傳統的氏族部落結構。第四，未墾的土地，人民可自由佔耕，由政府對人民直接計田徵稅。最後，提倡軍功，創設「軍功爵」，通稱「二十等爵」。軍功爵是給那些在戰場上英勇建功，尤其是取下敵人首級的軍人。軍功爵可以換算成田宅與奴隸，這對於下層人民來說是極大的誘因。這也是為何秦軍

在沙場上總是表現勇猛。曾有人這樣描述：作戰時，東方六國的軍人都穿戴著厚重的頭盔與冑甲，秦國的軍人則是不披冑甲，甚至是裸著上身，直向敵人跑去，左手還提著人頭，右手抓著俘虜。秦軍打仗之所以有這麼高昂的士氣，應該和軍功爵的獎賞有很大的關係。整體來說，商鞅變法的主要精神在於打擊秦國的舊貴族，加強中央集權，建立官僚體系的威信。

#### （四）外交靈活——連橫與遠交近攻

商鞅變法之後，秦國邁向富強，列強中能與之抗衡的只剩齊、楚、趙三國。齊國因和北方的燕國長期對壘，國勢已然大不如前，而楚國的土地遼闊，又未曾遭逢大戰，故國勢漸強。秦惠王（秦孝公之子，337BC~331BC在位）時，齊、楚兩國有意交好，秦國不樂見這樣的情形發生，就派張儀至楚，以土地為餌，勸楚國與齊國絕交。楚、齊斷交，秦卻不肯割地，於是雙方交戰，楚國大敗，國力因而大挫。張儀趁秦國聲威大振之際，提倡「連橫」，勸各國與秦親善，一時甚有成效，各國君主，多向秦輸誠。雖然在秦惠王死後，張儀因與其子武王不合，離秦赴魏，「連橫」隨之破局，但此時秦國的勢力已無法動搖。齊、楚等強國相繼衰落後，只有趙國尚可威脅秦國獨霸的局勢。秦、趙兩國間曾發生過多次戰爭，各有勝負。秦國眼見未能佔得上風，在秦昭襄王（武王子，306BC~251BC在位）時採納魏人范雎的建議，定出「遠交近攻」的外交策略。其中的內容是，秦國先以全力進佔離秦較近的韓、魏兩國的土地，不作跨國遠征，以減少不必要的兵力浪費，並與遠方的趙、楚等國交好，孤立韓、魏。「遠交近攻」的策略果

然奏效，秦國因此獲得了大片的土地，也聚積了足夠的實力，來對付東方僅剩的強權——趙國。

### （五）東西爭霸——長平之戰

長平之戰是一場重要的戰役，西方的秦國大敗東方強權趙國，從此秦國獨霸的形勢已然成形，一統天下只是遲早的事。西元前二六二年，兩國為爭奪韓之上黨（山西省高平縣一帶），雙方軍隊在長平（山西省高平縣）對峙。趙將軍廉頗採堅守戰略，偶而出來應戰，以期曠日持久，使秦自動退兵。秦軍久攻不下，因而散布流言，挑撥廉頗與新即位的趙孝成王之間的感情，結果長平的守將改由趙括接替。他是一位理論家，卻缺乏實戰的經驗，最後終究不敵秦軍。投降的趙軍將近四十萬人，秦將白起只讓幼弱的二百四十人回國，其餘全部坑殺，手段之兇殘，令趙國人再無復仇的勇氣和能力。

趙國的勢力瓦解後，秦國可說已無對手，之後便以幾近摧枯拉朽之勢，陸續滅了韓、趙、魏、楚、燕、齊六國。終於，在秦王政二十六年(221BC)，統一了中國。

## 二、秦始皇鞏固統一的各項措施

### （一）制定「皇帝」尊號

秦王政在統一天下後，自覺這是「自上古以來未有」的大功業，於是下令群臣商議一個相稱的尊號。秦臣建議改稱「泰皇」，因為泰皇在上古三皇中最為尊貴。可是秦王政不願襲用舊號，又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

乃合三皇之「皇」與五帝之「帝」而組成「皇帝」這個稱號，也藉此宣示自身已不再只是秦的王，而是全中國的支配者。由於他是第一位皇帝，故稱「始皇帝」，他的子孫則稱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帝」原是對神的尊稱，秦王政採用「皇帝」一詞稱呼，顯然自認為其地位與權威有如上帝一般，是具有神格與神性的統治者。人君稱帝不是秦王政的創舉，戰國時代已經如此，但還沒有稱皇的。由此看來，秦王政以「皇帝」為號，是為使自己顯得更神聖，更偉大。而「皇帝」尊號的出現，也標示著中國自此以降，沿用兩千多年皇帝制度的開端。

## （二）確立統治的合法性——套用五德終始說

在六國人的眼中，秦本是不得參與中原盟會的西陲小國，一向以「夷翟遇之」。雖然秦人終究憑藉著強大的武力，完成吞併六國的霸業，但要想六國的遺民皆心悅誠服於秦國的統治，卻不是光靠武力就能做到的，還須仰賴一套能說服人的學說，來合理化秦得天下的事實，以確立秦國統治的合法性。<sup>13</sup>因此，在戰國末年時極為流行的五德終始說，就成了秦始皇手中一項便利的工具。五德終始說是由齊國人鄒衍所提出，他認為自天地開創以來，人類的歷史便由五行（即五德，金、木、水、火、土）所輪流支配。甲德輪值之時，人間便有代表甲德的甲朝興起，其服色、制度以及政治精神，必須和甲德相配，例如周為火德，色尚赤。等到甲德既衰，乙德繼之而盛；相應於人間，則為

---

<sup>13</sup> 好比周人為解釋自己何以能推翻殷商，因而提出「天命靡常」的觀念，兩者是一樣的道理。

乙朝興起，取甲朝而代之。秦始皇便根據這套理論，推算出秦屬水德，水剋火，故秦能代周而興；為了配合水德又有一連串的改制，如以十月為歲首、服色尚黑等，還配上昔日秦文公出獵，獲黑龍的故事。目的就是希望利用被統治者所相信的理論，來贏取他們的支持，緩和他們的反抗，以便統治者維持大局。

### （三）確立中央集權的制度——廢封建行郡縣

秦為維持統一所施行的種種政策，其中最重要、對後世影響也最為深遠的，可說是廢封建行郡縣。雖然春秋戰國以來，已有郡、縣的設立，但只限於局部地區，直到秦國統一天下後，郡縣制才普遍推行於全國。其實在秦帝國成形後，秦始皇身邊的大臣，對於到底是要恢復古代的封建制，還是推行郡縣制，有過一番激烈的爭論。當時丞相王綰主張行封建，理由是東方的燕、齊、楚舊地離秦本土遙遠，治理不便，不如分封諸子為王。齊人博士淳于越則是以殷周行封建而能國祚長久為例，來說明行封建的好處。不過他們的意見，遭到廷尉李斯強烈反對。李斯指出，昔日周所分封的諸侯不但不能共輔周室，反而相互攻擊，不受周天子的控制，春秋戰國時代的紛亂足以證明封建是不可行的。他建議秦始皇行郡縣制，透過層級的官僚行政，將廣土眾民置於皇帝的直接統治之下。最後李斯的意見獲得採納，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和監，郡下設縣，縣置令、長，皆由皇帝任命，隨時移動任所，防止地方官在同一個地方固定下來，進而扶植勢力，形成割據。此後，緊密隸屬於中央的郡縣制，取代諸侯列國並存的封建制，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地方行政組織的基本架構，同時奠定

了中國中央集權式官僚政治的基本規模。

#### （四）防制地方叛亂——銷毀兵器與修築馳道

前面曾經提過，六國遺民並非全都甘受秦帝國的統治，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句流行於楚地的諺語，即可反映出部分人民仍存著激烈的反抗情緒。秦始皇當然也明白這種情況，為了防制地方力量再起，鞏固統一，秦始皇有幾項重要的措施：其一為「銷兵」，下令沒收民間的一切武器，改鑄成無數的大鐘和十二尊龐大的金人，放置在宮廷中。此舉一方面是為了防止民眾作亂，另一方面則是一種弭兵理想的實施，不能盡以專制觀之。在收沒武器後，繼而將全國的富家豪族十二萬戶遷至咸陽附近，以削弱地方豪強原有的實力，並就近看管。之後，他又下令修築馳道。馳道的幹線可分東南兩線，都以咸陽為起點，東線直通燕齊舊地，南線直達吳楚故國。築馳道的用意，一方面便於巡幸，展現皇帝的威儀，同時兼有壓制地方叛變的作用，因為一旦地方有事，秦始皇可以利用馳道迅速的遣兵平亂。

#### （五）統整各地制度文化風俗——車同軌、書同文 與以法為教

所謂統整各地制度文化風俗，即是把秦國原有的制度推行到全國。主要的工作是將度量衡的單位標準化，車軌的寬度也須劃一（「車同軌」），還有統一錢幣的形制，以及文字和法律。其中以文字和法律的統一最為重要。秦在統一中國後，有鑑於戰國時期各國文字不統一，造成溝

通困難，遂一律改以秦國文字為標準。秦國本來流行的文字是西周的籀文，後來李斯將其簡化，稱為小篆，作為全國通行的標準字體。其後，隸書比小篆更為簡易實用。文字的統一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貢獻是難以估計的，它使得中國各地的人民雖然使用不同的方言，卻可以書寫相同的文字，促進了各地之間的溝通聯繫，有利於維持帝國的統一。此外，秦始皇也力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政策。所謂以法為教，是指社會上的文化風俗習慣必須以秦國的法律為標準。凡是與秦國法律相抵觸的，地方官都有取締的責任。所謂以吏為師，則是人民只能從官吏那裡學習法令。換言之，民間自由學術是不容存在的。這其實就是希望讓六國人民在文化價值方面也能認同秦國，相互間在文化上也能形成一個共同體。

### 三、秦帝國覆亡的原因

秦帝國只維持了十五年，其覆亡的原因，可簡單的用「不得民心」四個字來概括。秦代的社會階級可分為三等：六國的舊貴族、士人與小農。而秦末各地的動亂，三個階級的分子都有參與。秦國統一天下後，六國的舊貴族是最大的受害者，始終難以接受其統治，當秦朝政權不穩之際，紛紛起兵從事復國運動。反秦的主要領袖項羽，其祖先即為戰國時楚國的貴族。士人對於秦政權的不滿，肇因於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舉動，使得當時的士人階層不再願意為秦政權效力。戰國時期的小農，其實一直企盼統一政權的出現，從此可以免除戰爭的破壞，獲得安定的生活。然而，秦統一後不但沒有減輕小農的痛苦，反而加重了他們



的負擔。負擔主要來自於兩方面，一是要從軍作戰，二則是要參與許多大型工程的建設。秦始皇曾派大軍對付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百越，而軍源多來自一般的農民。另外，長城的修築、鄜山陵<sup>14</sup>和阿房宮<sup>15</sup>的建造等，都須要役使大批的民力，受害最深的當然又是小農。小農平時勤於農事，尚且有時難以溫飽，更何況還要負擔這麼多的苦差事，可想而知，他們對於統一天下的秦帝國有多麼的失望。反秦戰爭首先發難的陳勝、吳廣，其跟隨者就是這樣一批處境

<sup>14</sup> 據說在鄜山陵中，除了有已出土的大量秦俑，在墓室中還建有宮殿，設有百官的座席；墓室的地板上還造設黃河、長江等主要河川，以水銀為水；天井上則以玉石鑲造日月、星辰，簡直就是一個小小的中國世界。

<sup>15</sup> 晚唐杜牧(AD803~852)曾作〈阿房宮賦〉，以恢炫瑰奇的文筆，極力描寫阿房宮室之壯觀與妃嬪之盛麗，所謂「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綠雲擾擾。梳晚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阿房宮宏侈無比的形象於是深入人心。其實它的敘述並不完全合乎史實，最主要的部分是阿房宮最後並未建成（《史記·秦始皇本紀》），最新的考古發掘也證實了這一點。不過阿房宮預定的規模確是極為宏偉的，以前殿而論，「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史記·秦始皇本紀》）；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四年阿房宮遺址的考古工作隊所發現的阿房宮前殿遺址為「東西長一千二百七十米、南北寬四百二十六米、現存最高點為十二米的夯土台基」，可供印證。而史書亦載帝都咸陽城內外宮室無數，子女玉帛充塞其中。杜牧此賦雖略嫌誇飾，但這乃是諷刺當時皇帝唐敬宗「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新唐書·宗室宰相列傳》），驕淫放縱，不愛惜百姓物力，有其深心微意。杜牧曾自承：「寶歷（敬宗年號）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全唐文·杜牧·上知己文章啟》）可說是繼承詩人溫柔諷諫的傳統。

類似的可憐小農。可以看出，在得不到任何階層人民支持的情況下，秦帝國早已註定敗亡的命運。

綜而言之，由秦始皇不愛惜人民，過度役使民力的作為可以看出，本是上古遺留下來最後一個貴族政府的秦室，依然擺脫不了貴族階級的不良習氣，最後終究還是被以劉邦為首的平民階級所推翻。秦之統一與失敗，可說是從貴族封建轉移到平民統一的過渡階段。

## 四、秦帝國統一的意義

### （一）由分裂到統一

秦王政二十六年(221BC)，秦國統一「天下」的工作完成，出現了亙古未有的新政治局面，到此乃有統一帝國的出現。以前的周王室（尤其是東周）除了擁有不大的畿土與微薄的收入，對於諸侯國的內政影響力有限；至此集權的中央政府建立，直接號令著全國各地，雷厲風行，不但可以驅使帝國內任何角落的臣民，也可以攫取全國境內各地的財富，沒有任何人或任何勢力，能與中央抗衡。這時的皇帝，是名符其實的「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在此以前，「諸夏」或「中國」，只是個籠統的概念，並沒有確切的範圍和實際的組織；到此「中國」二字有了具體的形象，它代表著一個龐大帝國和其中的土地人民。並且此後的中國，是以統一為常態，分裂為變態，縱使長期分裂（如魏晉南北朝），人心仍趨向統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統一為職志。這可說是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

## （二）由封建到郡縣

在秦國統一之前，郡縣制雖已於各國局部施行，但規模不大，制度也不完備。直到秦始皇一統天下後，於全國推行郡縣制，春秋、戰國已來鬆動的封建制，至此幾乎消滅殆盡。而此後中國的歷代君主，如有恢復封建的想法，不是立刻遭到群臣的反對（像是唐太宗曾令諸功臣世襲刺史，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立刻推辭，又如柳宗元〈封建論〉……），就是徒有形式，和古代封建的內涵已是大不相同（如西漢、東晉分封皇室子弟為王）。可見歷經春秋戰國的戰亂，中國人的政治意識已逐漸轉變，不再認同貴族世襲封建制度的存在。而在秦帝國成立後，廢封建行郡縣這類的主張和想法已然成熟，成為此後中國政治思想的主流。

## （三）由華夷雜處到文化融合

春秋戰國時代是華、夷雜處的局面，而秦併六國後，首先是打破了六國原來的邊界。邊界既除，各地間的交流往來自然容易許多，有助於消融彼此間的文化歧異。而後，秦始皇開始將秦國的制度推行到全國各地，以期造就一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社會。這番努力的確收到很大的功效。以統一文字來說，這對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難以估計，很難想像今日的中國各地仍使用不同的文字、語言，它還會是一個整體嗎？<sup>16</sup>而將車軌寬度劃一，目

---

<sup>16</sup> 這裏提供一個有趣的對照：歐盟成員國目前有二十五國，使用的官方語言有二十種，「大歐洲」的夢想正在一步步變為現實。與歐洲一體化很不協調的是，歐盟沒有一種統一的官方語言。為了解決語言隔閡

的在使各地區道路相通，對於社會、經濟與文化交流當然也有極大的幫助。至於行同倫，就是以秦國的文化風俗律法為依歸，要求各地人民遵從，同樣是為求消除各地間文化風俗的不同，使秦帝國不只是一塊統一的版圖，在文化價值取向上也是一個整體。秦帝國於文化統一上所做的努力，和其先前以武力征討六國的作為，前者的重要性可能還大於後者。武力統一天下，為時可能很短暫，文化的融合卻是一股漸進而豐沛的力量，可跨越任何有形的邊界。

**§ 作為轉捩點的秦始皇帝國：**

- 防守外族入侵，確立中國的疆域。
- 三大統一（文字、車軌、錢幣度量衡），使中國成為密不可分的系統。
- 重法治國的觀念。
- 提高了君王的地位。
- 秦瓦解經驗，儒術、仁治成為後世的重要課題。
- 官僚政治的確立。

**§ 參考文獻**

1. 林劍鳴，《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1981）。
2. 錢穆，《秦漢史》（臺北：東大，1987）。
3. 翦伯贊，《秦漢史》（香港：三聯書店，1984）。
4.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三民，1974）。
5. 傅樂成，《中國通史》（臺北：大中國，2001）。

---

的問題，預計今年(2005)歐盟在內部溝通與官方文件翻譯上的花費將超過十億歐元。這是維護語言多樣化需付的部分代價。

6. 伊藤道治等，《中國通史》（臺北：稻香，2000）。
7. 甘懷真，《中國通史》（臺北：三民，2001）。
8. 邢義田，《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1987）。
9. 崔瑞德、魯惟一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秦漢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 §思考問題

1. 統一的國家是否以武力征服為必要手段，或者可能憑藉說服、典範和規章完成國家統一的目的（共同的利益與價值）？
2. 統一的國家為社會帶來穩定、和平與較高的生活水平，並使文化、藝術和知識活動繁榮。相較於歐洲中古時代長期的黑暗和混亂，中國擁有更高且穩定的生活與文化水平。試思考近代歐洲高度的發展，是因為文化原本的優越性，還是由於政治分裂狀態產生的活力和創造力？還是有其他原因？
3. 統一的國家是否可以擁有思想文化的多樣性與競爭的活力，同時維持其和平穩定？

## §延伸閱讀

1. 司馬遷，《史記·秦本紀第五》、《史記·秦始皇本紀第六》（中華書局點校本）。
2. 劉向，《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1985）。
3. 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1998）。
4.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臺北：時報，1989）。

## 第三講

# 公元前3年：基督宗教的興起\*

- 一、基督宗教的基石——希伯來民族與其宗教簡史
- 二、上帝之子的救贖——耶穌之死與早期基督宗教的發展
- 三、使徒保羅與教層體系的發展
- 四、從異端到正統——君士坦丁之謎
- 五、基督宗教對西方文明的影響
- 六、宗教信仰的力量——基督宗教的征服

基督宗教在早期致力於爭取民眾，依靠的是自由原則。現在卻向統治者發出了呼籲，將其巨大影響投到了權威的天平上。……只有削減國家的權威，教會的自由才會得到保障。

——阿克頓，〈基督教自由史〉

美國哈佛大學神學院教授哈維·寇克斯(Havery G. Cox)曾經有過這樣的比喻：「如果一個火星人造訪地球，它會

---

\* 此處基督宗教(Christianity)乃包含信仰基督的宗教之泛稱，眾所週知，在十一世紀之後才分為天主教與東方正教，十六世紀馬丁路德改宗後天主教又分裂出基督(新)教。

驚訝有這麼多人聚在一起，稱頌一些未知的名號，為此感動，為此犧牲，它必定會問這個名為基督的宗教究竟是什麼？」其實，非基督宗教徒對於基督宗教之理解，有時恐怕不會比火星人更多。然而作為西方文明的兩大源頭之一（另一個是希臘文明），基督宗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了解基督宗教對西方的意義與影響，必須回顧基督宗教的歷史。

## 一、基督宗教的基石——希伯來民族與其宗教簡史

基督宗教是西方文明重要的根源，希伯來(Hebrew)文化又是基督宗教之基礎，因此在探討基督宗教的興起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希伯來之歷史。希伯來人大抵在政治與軍事上無可稱述，即使是所羅門盛世，其實也不過是小部落的局部統一，與亞述、埃及等帝國難以相提並論。但另一方面，希伯來在宗教文化上的影響力卻是那些遠古帝國所不能比擬的。西元前一八〇〇年，希伯來人亞伯拉罕(Abraham)率領其族人定居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西北部（今伊拉克一帶）。大約在西元前一六〇〇年之後，希伯來人為了逃荒而進入埃及，定居於尼羅河三角洲，受到埃及法老的奴役。西元前一二五〇年左右，希伯來人在摩西(Moses)的帶領下逃出埃及。這便是今日眾人熟知的「出埃及記」。經過一段顛沛流離的生活，他們在西元前一二〇〇左右進入今日的巴勒斯坦——所謂的「應許之地」。西元前一〇二五年，掃羅(Saul)建立以色列王國。到了前九七〇年左右，大衛王(King David)與其子所羅門王(King Soloman)開

創了希伯來人的盛世，外拓疆土，內修神殿。但在所羅門王死後國家便陷入了分裂的狀態，不久相繼為亞述、巴比倫、波斯與亞歷山大所征服。中間曾短暫復國，至西元前七〇年，猶太又為羅馬所征服，成為羅馬的一個行省。自此希伯來人（猶太人）便開始了流徙寄居的生活。

希伯來宗教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希伯來人在第一階段是崇奉多神的時代。在逃出埃及時由於歷盡艱辛，於是更加堅定對上帝的信仰，由此邁入了一神崇拜的階段。除了耶和華(Jehovah)以外，不再崇奉其他神祇。耶和華成為擁有任意生殺予奪，具有無上威權的唯一真神。在此同時，基礎的倫理觀念也慢慢發展出來（西元前七世紀左右出現的十誡便是代表）。更重要的是，正是在此時期希伯來人漸漸相信上帝並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超越自然的存在。人類做為自然的一部分，可以通過神意來主導自然。這種超越的神學觀對於西方人有重大的意義。它意味著人類可以純粹藉著理念的、抽象的概念來理解上帝，同時人具有隨意改變自然的能力。希伯來人宗教的第三階段被稱為先知革命。從西元前七五〇年到前五五〇年左右，先知們在國家喪亂之際，也更堅定對一神的信仰，更注重正義的價值，而不在意典禮儀文。第四階段是所謂的後放逐時代(post-exile)。此時最重要的發展是末世信條，寄望彌賽亞(Messiah)與千禧年的到來。這種將希望寄於將來的想法，是促使猶太人在離散流亡之時還能堅守信仰的重要原因。

總體而言，希伯來人對世界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的宗



教觀念構成了基督宗教的母體。<sup>17</sup>其中一神信仰與超越自然的觀念對於西方世界尤其重要。<sup>18</sup>

## 二、上帝之子的救贖——耶穌之死與早期基督宗教的發展

耶穌(Jesus)出生於基督宗教紀元開始的某一時期(不確指某一年)。祂的生平事蹟究竟有多少可信，長久以來一直引起史家的爭論。某些極端的人甚至採取十九世紀的「高等批評」(higher criticism，係指對聖經內容的批評)否認耶穌的存在。再加上最接近耶穌年代的史料如馬可福音(Mark)也是在耶穌過世後三十年寫成的，其中的許多傳聞不免失真，因此對於耶穌生平確切的掌握更是難上加難。

今日許多人相信耶穌確有其人，並在紀元初散播一種新的宗教(用史懷哲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愛的宗教)。大體而言，耶穌的教義摻雜了新舊的元素。一方面，它繼承了猶太教長久以來對彌賽亞的期待，而宣稱應許天國的到來。但另一方面，這個天國的本質卻和過去的猶太傳統不同：它的核心是倫理而非政治，它的對象擴及社會下層民

---

<sup>17</sup> 「死海文書」(Dead Sea Scrolls)是了解希伯來宗教的重要文獻，在一九四七年及稍後的日子於巴勒斯坦死海附近的洞穴內發現，這些文獻經過審慎的翻譯而於一九五五年刊布並廣泛傳播。我們從死海文書可以得知早期猶太教信仰的大致情況，特別是猶太人的兄弟族——埃森(the Essenses)的許多情形。這些民族遠離世俗，過著禁欲的生活，財貨共有共享，如同過著刻苦生活的早期基督徒一般。

<sup>18</sup> 關於基督宗教的源頭，還可上溯自許多古文明宗教，譬如埃及阿克阿頓的一神崇拜、巴比倫宗教的個人信仰與自省精神。

眾（包括妓女、罪犯），這對於那些既得利益者（或說是原本享有得救的特權者）而言當然是難以忍受。另外一點更引人爭議的，是耶穌本於這種倫理性質的教義，蔑視現存的宗教儀式。這使得耶路撒冷當地的宗教領袖大為光火，因此他們將耶穌逮捕，控告祂褻瀆上帝，自稱為猶太之王，並把他移交給羅馬總督比拉多(Pilate)，將他判刑並處死。眾所週知，耶穌在三天之後復活。這個死而復生的經歷，在基督宗教歷史上無疑是一個決定性的時刻。祂的門徒因此大為振奮，更加堅信耶穌是上帝之子，並將此神蹟四處宣揚。<sup>19</sup>

### 三、使徒保羅與教層體系的發展

耶穌升天之後，門徒將基督宗教發揚光大，賦予更深刻的宗教理論，其中最為重要的人物是使徒保羅(Paul)。保羅生於小亞細亞的塔爾蘇斯(Tarsus)城，是一位希臘化的猶太教徒。他大膽地否認耶穌僅僅是猶太教徒的救世主，認為仁慈的上帝差遣他唯一的兒子耶穌來人間，是為了要他替全體人類贖罪。將耶穌的地位，由猶太人的彌賽亞，擴大為普世的救主，同時他強調人的原罪與神的救贖。因此，基督宗教不再是猶太教的一個教派，而發展成為一個新宗教。保羅的做法使基督宗教從此以後不僅能吸引少數猶太人，甚至還吸引整個羅馬帝國千百萬非猶太人。如果說耶穌宣稱上帝的王國馬上就要降臨，那麼保羅則為這一種通

---

<sup>19</sup> 也有部分西方科學家以現代醫學來理解此事，認為耶穌在受刑之時並未氣絕，只是一時昏死過去。而猶太人在死者身上塗以某種植物香油，據說能刺激人的呼吸系統使之醒轉過來。

過基督與教會神職人員，進而實現個人得救的宗教奠定了基礎。在保羅之後，基督宗教發展了禮儀（包括聖餐禮），使教徒更加接近基督。同時也形成了管理聖事的長老組織。這種組織被賦予了超自然的權力，這使得神職人員與俗人的距離日漸遙遠，埋下了日後歐洲史上政教相爭的種子。

在耶穌之後的三百年間，基督宗教穩定發展。但直到西元第三世紀，基督宗教才真正的興盛起來。要解釋此點，就必須了解到西元三世紀是羅馬歷史上一個「憂患的世紀」。人們將塵世視為虛幻，寄望於死後的救贖。基督宗教的一個特點是，著重於靈魂的拯救，允諾人死後可獲得永生。另一特點是，堅持平等主義；基督宗教的大門向所有請求加入的人敞開，不論是男子或婦女、富人或窮人、自由人或奴隸，都一視同仁。最後，著重極高的道德準則，強調靈魂要得救，就必須遵守這些準則。這一要求加於教會組織，使基督宗教能對信徒的日常生活施行全面的影響。這些特點在古典時代較後幾個世紀特別吸引人。在那幾個世紀中，社會動盪、道德混亂，尤其在中心大城市，情況更是如此。城市裡許許多多人感到無家可歸、漂泊無定。對這些人而言，基督宗教提供了安慰、保護和指引。當彼拉多問道「真理是什麼」、表達出時代的絕望情緒時，基督徒也給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宗教的都是些地位低殘、無所歸依的人，一切並非偶然。

#### 四、從異端到正統——君士坦丁之謎

基督宗教在社會上勢力日益擴張，一直以來的說法

是，對於羅馬官方而言，這一直是個危險的宗教集團。在此之前，羅馬已有宗教集團之叛亂，似基督宗教這種更具顛覆性質的宗教，當然更引起政府的敵意（強調應許天國的來臨的另一面就是對現世政權的否定）。也因此基督宗教在羅馬境內一直未取得合法的地位，甚至於屢遭迫害。今日史學家已對此加以修正，認為羅馬官方對於基督宗教的態度基本上是漠不關心，而非大加迫害。只有在基督徒不崇拜國家神祇時，一些地方官員才會予以懲罰，但也並非致命性的打擊。總之，羅馬對基督宗教一直並不友善，但何以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I Magnus, 306-337在位）會在西元三一二年皈依基督宗教？

君士坦丁的心理狀態究竟如何，今日已難以得知。但從相關文獻看來，似乎這個改變世界的重要決定，只是出於一個夢境與戰場上的偶然。西元四世紀，當羅馬帝國分裂時，君士坦丁率領軍隊與另一勢力交戰。會戰前夕，他在夢中得到啟示：若將己方軍隊上的所有徽記改為十字圖形，必能大獲全勝。當時十字架與基督宗教之關聯已日漸確立。君士坦丁依此而為，不知是偶然還是神蹟，敵方的主帥竟在渡河時意外落馬而死。這一意外堅定了君士坦丁對於基督護佑的信心。回到羅馬時，他在自己的雕像上刻上以下的文字：

藉此拯救之標記，藉此對勇氣真正之考驗，我從暴君的重轆下解放了你們的城市，並為元老院和羅馬人民恢復他們古老的名譽和光榮。

這段話的出現無疑是歷史上最奇蹟的時刻之一。三百年前被羅馬人視作異端釘在十字架上的那個人，如今卻成為羅馬的守護者。從此君士坦丁積極地介入基督宗教事務，並

努力統合其內部的分歧（於是有尼西亞Nicaea會議的召開）。西元三八〇年，狄奧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 346~395)頒布敕令，要求所有臣民都要信奉基督宗教。過去的異端，至此成為壓制其他宗教的正統信仰，基督宗教在羅馬境內獲得了絕對主導的地位。<sup>20</sup>

當然，如同尋求耶穌復生的科學證據一般，歷史家對於基督宗教的勝利也總是尋找個人以外的原因。部分史家便認為，把君士坦丁從一個異教徒到基督徒看作不可思議的轉變，是現代觀念與古代的落差。在當時異教與基督宗教並非如此不可調和，他們同是護佑君士坦丁的宗教。而君士坦丁對信仰之忠誠，也絕不能以現代基督宗教觀念衡量，事實上，君士坦丁認為自己遵行上帝的旨意，扮演好上帝的代表，就是對神最忠誠的表現。除此之外，也有史家認為運用龐大的宗教以凝聚分崩離析的羅馬帝國是極其自然的做法。這種政治與宗教上的結合，是所有統治者必然的想法，而非偶然的轉變。

歸納一般史家認為的基督宗教勝利的原因：1. 基督徒毫不妥協的態度予人堅定的信心，這源自猶太教精神但又不似其狹隘的教義，使之更具親和力；2. 天國的來臨與靈魂得救的觀念較諸其他宗教更具有普世性；3. 不可否認，初期使徒們的神蹟給予民眾極大鼓舞；4. 基督徒純潔及嚴肅的道德，予人深深的吸引力；5. 基督徒團體的和睦及紀律給予人們歸屬感，並確保喪亂之際基督宗教的延續，發揮社會救濟的功能；6. 在某種程度上，羅馬的迫害反而助

---

<sup>20</sup> 不過在打擊異端的同時，為了凸顯與某一異端的差別，基督宗教往往同時吸收了其它異教之元素。因此基督宗教之興起也可以說是一個不斷吸收異說的過程。

長基督宗教的傳播，給予人對殉道者的感動。

羅馬帝國崩潰後，基督宗教由傳教士在西元六〇〇至八〇〇年期間，傳布到英格蘭和日耳曼諸民族中；在八〇〇至一一〇〇年期間，傳布到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諸民族中。之後，隨著歐洲的擴張，又由傳教士和移民者傳布到世界各地。

## 五、基督宗教對西方文明的影響

基督宗教的興起究竟對於西方世界有何意義呢？由於基督宗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力量，而非短暫的歷史事件，因此我們很難給一個確定的評價。

### （一）中古教會文化

考察基督宗教興起後不久的歷史，也許便能了解基督宗教對於西方的另一貢獻。自西元四世紀以來，蠻族橫行，過去羅馬文明繁盛的城市幾乎都成為荒蕪的廢墟。而自希臘羅馬以來的深厚文明也幾乎為之中絕。幸而有基督宗教教士對古典文獻的傳抄，才使得這些重要的資產得以保存。當然這些教士的出發點仍然是宗教的。即使是後來人文主義者對古典文獻的再度研究亦然。他們認為古典文化是正確理解聖經不可缺的基礎。

### （二）中古教會的社會功能

除了對上古知識的保存，中古教會也扮演相當程度的社會救濟功能，這主要指本篤會(Benedictine)的修士而言。

本篤會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在於財務管理方面，他們往往幫助了提高西歐經濟的水平，為西歐各國提供了財富。對窮困、疾病者予以幫助，一直是基督宗教能深植人心的重要原因。

### （三）對婦女否定的態度

另外一個基督宗教對世界的影響，是對婦女否定的態度。雖然基督宗教宣稱兩性都可以得救，並准許婦女參加宗教儀式，這也是基督宗教比起密特拉宗教排斥婦女的作法，更具優勢之處。但在相當程度上，基督宗教依然有男性本位之傾向。尤其當西元三、四世紀苦修盛行之際，女性的誘惑成為修行的障礙，因此視女性為洪水猛獸的態度也因此而生。受此影響，本來還可以結婚的教士，到了四世紀之時便須遵守嚴格的禁欲規定。<sup>21</sup>

### （四）西歐一體世界的形成

基督宗教另一個重大的影響是促成了西方一體世界的形成。歐洲文明以西方基督宗教和拉丁遺產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一種文化統一的永恆情感。歐洲自此逐漸形成自治的、獨具特色的文化。以後歐洲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與此有絕對密切的關係。後來法蘭克人與羅馬教會的聯合尤有重大的關係。

---

<sup>21</sup> 關於神性與欲望之間的掙扎，也一直是西方宗教與文學常見的主題，如《紅字》。

## 六、宗教信仰的力量——基督宗教的征服

近代歐洲的擴張，在某種程度上，可用基督宗教的擴張主義來解釋。基督宗教浸透了普濟主義，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和好戰精神，強調四海一家，宣稱自己是世界宗教，從使徒時代到現在，積極傳教一直是基督宗教的主要特點。而且，為了使異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宗教，基督宗教會總是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基督宗教的好戰性源自猶太游牧民族所崇拜的復仇和懲罰之神。基督宗教作家常用戰爭作比喻，將人間世界看作上帝與撒旦交戰的戰場。因之，絲毫不奇怪：基督宗教首領在執行「到世界各地去，將福音傳播給每一個人」（《馬可福音》16：15）的命令時，時常採用種種強而有力的方法。因此，歐洲有歷時很久的遠征傳統，海外擴張在某種意義上是這一傳統的繼續。早期的探險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東征，部分是出於宗教上的考慮。他們想到達印度和中國；自十三世紀馬可·波羅（Marco Polo, 約1254～1324）東遊以來，歐洲人已知道那裡有一些大國。歐洲人還知道，這些國家不屬於穆斯林，所以希望它們能同基督宗教徒聯合起來。此外，中世紀時有關約翰長老(Prestor John)的傳說也在人們中間長期流傳。人們傳說，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塊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宗教，約翰長老是他們的強有力的統治者。因此，好幾個世紀裡，基督宗教首領一直嚮往能同約翰長老建立聯繫，從東、西兩方大舉夾攻穆斯林(Muslim)世界。歐洲人沒有找到約翰牧師，但是，他們卻在非洲和南北美洲碰見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這些民族還未開化、不信教，因此，很適合征服與拯救，並使他們皈依成為合格臣民。促使歐



洲人開始海外冒險事業的動機很多，除了尋求黃金之外，為上帝服務可能是其中最強烈的動機。達·伽馬（Vasco da Gama, 約1460~1524）抵達卡利庫達時，曾向當地驚訝不已的印度人解釋說，他來這裡是為了尋找基督宗教徒和香料。北歐的新教徒之所以從事海外冒險活動，也是出於宗教上的考慮。又如近代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據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研究，背後其實有基督新教倫理中勤勉勞動以榮耀上帝的精神。

以上的例子並非僅僅在說明基督宗教世俗性的功用。更重要的是，回顧基督宗教興起的歷史，宗教與國家社會乃至個人之間有種千絲萬縷的關係。它是一股與時俱進的強大力量，小從個人倫理道德規範，大至國家民族之興亡，皆與之密切相關。如同吉爾茨(Clifford Geertz)之言：「宗教建立一種有力的、廣泛的，以及持久的人心中之心境及動機，並使之看起來真確不二。」由此看來宗教絕非僅僅是行善積德，它也是人心深處對終極價值最深的追求，而這種追求必定造成深遠的影響。所以西方文明今日會有如此面貌，基督宗教實居其中關鍵的地位。

時至今日，宗教往往被視為保守甚至落伍的力量。其尤甚者，有人憂心基督宗教面對物質文明的挑戰必會產生重大的危機（在哲學上，從尼采以來對上帝的懷疑也使得知識分子憂心忡忡）。但不論基督宗教的前途如何，至少在歷史上，基督宗教（教會）是一個能不斷修正自己面貌，與時俱進的團體。它經常發揮強大的社會功能，並能使人心有所慰藉。

§ 作為轉捩點的基督宗教：

- ◆ 倫理道德的規範。
- ◆ 統一的宗教組織。
- ◆ 宗教影響到中古時代的政治。
- ◆ 社會力量獨立。
- ◆ 政治與宗教的緊張及聯合關係。

§ 參考文獻

1. 潘光、陳超南、余建華，《猶太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2. 特雷德戈，《基督宗教史》（臺北：桂冠，1994）。
3. 尼尼安·斯馬特(Ninian Smart)著，高師寧等譯，《世界宗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4. 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務，1998）。
5. 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rvrianos)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新華書店，1999）。
6. 弗里德里希·希爾(Friedrick Heer)，趙復三譯，《歐洲思想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7. 史懷哲，《文明的哲學》（臺北：志文，1973）。
8. 羅克典，《論耶穌的神學與人性》（臺北：國家出版社，1991）。

§ 思考問題

1. 羅馬帝國原始宗教為多神宗教，當時基督宗教所面臨的情況為何？

2. 試閱讀君士坦丁《米蘭赦令》，以了解基督徒於羅馬帝國時期的形象。

### § 延伸閱讀

1. 《新約聖經》
2. 《舊約聖經》
3.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唐山，1987）。
4. 丹·布朗(Dan Brown)著，尤傳莉譯，《達文西密碼》（臺北：時報，2004）。

## 第四講

#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的興亡

- 一、羅馬的興起
- 二、羅馬共和的危機
- 三、羅馬帝國的建立——奧古斯都
- 四、戴克里先及其繼承者的改革
- 五、羅馬衰微的原因
- 六、羅馬的影響
- 七、反思

你們不應該把人類分成希臘人和蠻族人，……你們應當把人類分成羅馬人和非羅馬人，這樣你們就宏揚了你們城市的名聲。

——埃利烏斯·阿里斯提德斯，〈對羅馬的演說〉

### 一、羅馬的興起

#### （一）組織的天才

當埃及、希臘，乃至於中國古文明都已經在歷史上大放異采之時，羅馬卻還處於相當落後的狀態。據維吉爾(Virgil)的史詩，羅馬是如此建國的：當希臘聯軍進攻特洛伊城(Troy)時，特洛伊的名將阿里亞斯(Aeneas)在母親維納

斯(Venus)女神的保護下逃離了小亞細亞。經過了多年的流浪生活和數度意外與豔遇（阿里亞斯據說一表人才，當他漂流至北非時，為迦太基(Carthage)女王所愛。後來到了拉丁平原，又為當地國王所看中，將女兒許配給他。阿里亞斯也在當地定居下來。），阿里亞斯建立了自己的國家，而他的兩個兒子便是羅馬的遠祖。根據傳說，這對孿生兄弟幼年曾經流落於歐洲北部的森林裡，由母狼所撫養長大。後來互相猜忌，羅慕路斯(Romulus)殺死對方，並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羅馬城(753BC)。但根據近代史家的研判，上面的故事其實是由兩段故事所編湊在一起。羅馬人原來居住在歐洲北部的森林區域，所以有母狼撫養孿生兄弟的故事。日後，當他們來到義大利逐漸與希臘人接觸，仰慕希臘文化，於是將希臘女神維納斯引為自己的祖先。大體而言，羅馬真正引人注目的歷史要直到西元前五〇九年才開始。自此時起，羅馬推翻了國王，建立了為後世稱頌的共和體制。在這段興起的歷史中，如果說羅馬有任何迥異於其他民族的傑出之處，那便是它們在政治組織上的天份，這個天份雖不像希臘人的哲學、猶太人的宗教顯得光彩奪目，卻能使羅馬人獲得實質的勝利。以下分別就政治與軍事上言之。

## （二）寡頭政體——執政官與元老院

在羅馬共和國的早期，貴族控制了兩個最重要的政府機構——執政官和元老院(the Consulate and the Senate)。理論上而言，執政官與元老院是羅馬政治的核心，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威。執政官有兩位(Consul & Praetor)，他們的任期一年，權力有限，都擁有否決對方的權力，彼此牽制。因

此，重要的政策都必須得到兩位執政官一致同意才能實施，避免濫權。執政官在名義上也統率軍隊，但戰時交出權柄給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獨裁者」(dictator)。他和現代獨裁者不同之處，乃是經由正式立法方式由元老院選出而授與職位，且在指定的短時間（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內保有此職位。元老院雖然可以批准重大提案，但他們並沒有創制的權力。

### （三）平民與貴族的鬥爭

雖然執政官與元老院掌握在貴族手中，但羅馬的平民可以在另一個稱為「百人議會」(Centurion Assembly)中陳述他們的意見。這個議會，正如其名稱所示，是基於軍事的最小單位——百伍：許多不同的百伍聚集在一起，共同決定民事和軍事。雖然「百人議會」與民間的鄉鎮議會非常相似，實際上民主的程度究竟如何無法得知。在很多情況下，它也有可能為貴族所操縱。因此，平民難免痛恨貴族獨占大權，並要求增加政治權力。經過長時間的對抗，貴族採取了一連串的讓步以回應，譬如增訂保護平民的法律（十二木表法，Law of Twelve Tables），讓平民出任執政官，最後甚至讓平民的會議對於元老院產生約束力。這些讓步顯示了羅馬政體的適應性。

羅馬共和的政治體制，簡言之，一方面有設計良好的貴族政權去執行國家的主要事務，包括防務與戰爭，這些任職高位的人除了貴族的出身，還要具備傑出的才幹、深厚的經驗與正直的道德。他們常能在危難之際勇於任事，帶領國家渡過難關；另一方面，共和政治又能適度地吸納平民。就今日的觀念而言，雖然羅馬未達真正的民主，但

已能保有城邦政治中公民參與的精神，並激發其向心力，可以說結合了斯巴達寡頭政體與雅典民主政治的優點，同時兼顧效率與民意。這不能不說是羅馬政治組織的一大特長。

#### （四）軍事組織——方陣

羅馬的組織長才同樣表現在軍事上，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方陣(phalanx)。方陣是一個由數千個士兵所組成的長方陣形，裝備優良的配置在前列。其基本的原理在於縮小受攻擊面，同時集中火力造成局部優勢。這個戰術後來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直到火器的出現才改變。<sup>22</sup>當然，這絕非意味殺人技術的好壞是決定歷史的唯一因素，但不可否認的，羅馬的興起與此息息相關。這是在稱頌一個偉大的文明時所應該反省的。

#### （五）迦太基之役

憑藉靈活的政治與軍事組織，羅馬在西元前三世紀逐步統一了義大利。但是與迦太基的戰爭卻正要開始。迦太基是位於北非的強權，依賴海上貿易維生。當迦太基擴張到義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島時，羅馬覺得受到威脅，因而向

---

<sup>22</sup> 事實上，有些學者甚至認為這種持矛步兵陣形的長期運用，正是西方人今日稱霸世界的關鍵，它使得西方人能夠比較容易接受火器，因為火槍與長矛本於類似的步兵陣形。在歷史上，哪個民族能夠快速由冷兵器時代進步到熱兵器時代，便能取得優勢的地位。參看維克·大衛韓森(Victor David Hanson)，《屠殺與文化》。

迦太基宣戰。<sup>23</sup>第一次迦太基之役於西元前二六四年開始，經過二十三年的血戰，羅馬終於勝利，迦太基被迫交出西西里並必須償付鉅額的賠償金。但是羅馬並不因此滿足，對於迦太基的要求愈發過份。西元前一八八年，羅馬人把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經營視為對自身利益的挑戰，再次向迦太基人宣戰。這一次戰役共持續了十六年，其中不能不提到迦太基的軍事天才漢尼拔(Hannibal)。漢尼拔出生背景今日所知甚少，但在史家波里比烏斯(Polybius，約200BC~118BC)筆下，他是一個異常冷靜，近乎殘酷的人。他在軍事史上最為人稱道的，便是他艱苦卓絕地從西班牙橫越阿爾卑斯山突擊羅馬的後方，並以相對薄弱的兵力和較差的裝備與補給，卻能在義大利橫行無阻的驚人事蹟。就今日的軍事眼光看來，漢尼拔的獲勝正是靈活地進行運動戰的結果。他具有一種超人的能力，而且行動能適應千變萬化的環境（或許除了攻城戰之外），能將一支紀律不整所屬龐雜的部隊，變成神出鬼沒戰無不勝的勁旅。<sup>24</sup>毫無疑問地，漢尼拔對歷史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正是漢尼拔的一念之差，沒有在勝利時進攻羅馬城，羅馬終於逆轉情勢。結果迦太基遭受比第一次戰敗更悲慘的命運。西元前一四九年，羅馬人決意將稍微恢復的迦太基趕盡殺絕，這便是

---

<sup>23</sup> 當代史家對於羅馬向迦太基宣戰的原因一直沒有確切的解釋，過去常以為如此重大的戰役背後必定有經濟或政治上的考量，譬如貿易航線的問題。但今日看來，羅馬的出兵可能僅僅出於維護帝國的權威。

<sup>24</sup> 在同一時代東方的中國，楚漢爭霸時的大將淮陰侯韓信，也屬於這一型的軍事天才。另外，這種不拘一格的戰爭型態給予後世莫大的啟發，二戰時隆美爾(Erwin Johannes Eugen Rommel)在北非所使用的戰術便相似於此。



第三次迦太基戰爭。戰爭異常殘酷，羅馬人甚至對城市以外的居民展開大屠殺，倖存的迦太基人淪為羅馬人的奴隸。

## 二、羅馬共和的危機

迦太基之役後，羅馬展開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征服導致進一步的征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羅馬擁有壓倒一切的力量。清除迦太基後，它成了地中海頭號強國。此外，征服能帶來明顯的好處，從每個新行省可獲得源源不斷的戰利品、奴隸和貢物。最後，挑戰和投入戰鬥總是不可避免地與遼闊的帝國疆域相聯繫。西元前一四六年之後，羅馬共和國成為當時最強大的國家。它累積了廣大的帝國海外領土——西西里、西班牙、馬其頓和希臘，以及非洲省包括迦太基本土（大約相當於今日的突尼西亞）。其後二十五年中，又獲得一些新的領地——高盧南部和亞洲行省。

但當羅馬的領土不斷增加時，征服地所帶來的問題卻也慢慢的浮現。這些由對外戰爭所引發的問題，舊有的共和制度與農業經濟不足以有效應付。除了少數幾個城市能保留一些自治外，羅馬共和國並未寬大地對待它的海外屬地。因為元老院對於複雜的行省行政缺少經驗與興趣，於是賦予各省總督自由的統制權，只要總督能為軍隊募到新兵，徵集稅收，以及進貢穀類。雖然許多總督仍以高尚共和傳統的責任感執行他們的職務。然而，有些總督卻對他們的行省進行雙重剝削——既為了國庫的利益，也為總督的私囊。

於此同時，義大利本身也面臨了政治、經濟與社會各方面的危機。羅馬的同盟，在羅馬與漢尼拔的戰爭中，大

抵還能對羅馬保持忠誠，而此刻漸趨不穩。他們要求完全的羅馬公民權利，以便分享擴展後的新財富和聲望。而第二次迦太基戰爭所造成的土壤竭盡與嚴重損失，使得大部分的義大利土地不適用於穀類種植，只能改由非洲輸入，僅存的穀類耕種地也都改為葡萄園、果園和牧地。而這些產業只有大地產的經營者才可獲利，因為只有他們才能供給所需要的廣大土地，以及大量的奴隸勞工。於是一種新的社會和經濟的鴻溝產生了，羅馬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非常富有的階級，包括得志的將軍和總督、大地主，以及商人；相對的，沒有土地的人民數目急遽上升，許多人都湧向羅馬城，尋求救濟並期待大有為的改革。

### （一）格拉古兄弟的改革

面對羅馬共和的種種問題，格拉古兄弟(Gracchus Brother)提出了改革。在政治上，兄弟兩人皆企圖降低元老院的權力，並盡力去增加護民官與「部族會議」(Comitia Tributa)的重要性。在經濟和社會上，格拉古兄弟首先要限制一個家庭所持有的財產數量，以便阻抑少數農業資本家的地產過於集中。第二，將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安置在國外農業殖民地，或在義大利的國有土地上。第三，在羅馬城中的貧民，可以從國家購買低於市價的穀物作為救濟品。第四，把羅馬的公民權利給予所有拉丁人以及其他的義大利人。總之，格拉古兄弟希望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社會，以緩解迦太基戰役後羅馬社會階級的劇烈衝突，並擴大羅馬的體制以適應擴大的版圖。但是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最終仍然失敗了。由於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侵害了貴族階級既有的利益，因此招致了強烈的反對。同時愈演愈烈的黨

派對立，更使得原本立意良善的改革成為鬥爭的工具。之後羅馬的政治為軍事將領所把持。馬略(Marius)與蘇拉(Sulla)相繼掌權，最後演變為凱撒(Caesar)與龐培(Pompey)兩雄並立的局面。

## (二) 凱撒之死

龐培因征服敘利亞與巴勒斯坦享有盛名，凱撒則在征服高盧(52BC)中顯現了自己的才幹。兩人展開你死我活的鬥爭，直到西元前四八年，凱撒才在法薩盧斯擊敗龐培(落敗的龐培逃往埃及，在抵達埃及後，被當時的埃及王托勒密所殺)。西元前四五年，凱撒開始對羅馬以及整個帝國展開一些激進的改變。他下令建造了運河與圖書館，廢除舊曆，代之以一種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閏年加一天的新曆法，並把舊曆的第五個月以他的名字(Julius)命名為七月(July)。他把公民權擴及於西班牙人與高盧人，同時在安置復員的士兵上也卓有成就。不過，更重要的是凱撒早期對於西方的經略，透過征服高盧，凱撒將城市生活與文化引進了西方，後來西歐文明便是在凱撒征服的這些地區確立下來的。

凱撒是一位開明的專制君主，上述的改革措施都未事先徵得元老院的同意。他建立了更為徹底的獨裁政府。他的制度稱為「凱撒制度」(Caesarism)，破壞了共和國的體制，特別是打破了各個議會和各行政官員之間互相牽制與均衡的體系。自己出任「獨裁者」，又集執政官、護民官和大祭司長的大權於一身。他擴大元老院以容納他的擁護者，便於控制此機構。雖然凱撒功業卓著，但是他對共和體制的破壞卻壯大了反對的勢力。西元前四四年三月十五日，

就在元老院大廳中的龐培雕像下，凱撒為一群元老院政敵刺殺身死。其中帶頭者便是凱撒的好友布魯塔斯(Marcus Brutus)，他同時留下「吾愛凱撒，但吾更愛羅馬」此一千古名言。

凱撒死後，他的施政綱領為一新的三頭政治所接收，這一新的三頭政治，其中二位主要的人物是屋大維(Gaius Octavianus)和安東尼(Mark Antony)。屋大維是凱撒的姪孫、養子與繼承人，安東尼則是凱撒最倚重的副總督。西元前三〇年，安東尼慘敗於屋大維，安東尼和克麗奧佩特拉(Cleopatra)雙雙自絕身亡。<sup>25</sup>一個偉大的轉變時刻已經到達：埃及最後成為羅馬的屬地，屋大維獲得羅馬唯一的統治權。

---

<sup>25</sup> 克麗奧佩特拉即是後世所稱的埃及豔后，根據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獻記載，以其美貌風流吸引凱撒與安東尼，而安東尼正是為埃及宮廷的溫柔鄉所腐化以致為屋大維所敗。因此有史家聲稱如果克麗奧佩脫拉鼻子短了一分，那世界的歷史必將因此改寫。然而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皮特里埃及考古學博物館專家奧卡薩·艾爾·達利在多年研究中，發現了一批以前從未引起關注的中世紀阿拉伯文獻，文獻記載的許多內容都有關早期埃及的歷史，文獻中描寫的克麗奧佩特拉，竟是一個富有才華的早期數學家、化學家和哲學家！她曾寫過好幾本科學書籍，每週都要和一組科學專家開會討論科學難題。一些中世紀阿拉伯作家，像艾爾·巴克里、亞庫特等人都曾在文章中談到過克麗奧佩特拉，稱克麗奧佩特拉當年在亞歷山大城設計的建築計劃「史無前例地龐大」。艾爾·達利指出：「我們當前所有有關埃及豔后的認知，全都是來自於她當年的敵人——羅馬人。羅馬人對她相當輕視，希望將她描繪成一個性感亡國的尤物。」「古埃及錢幣上鑄刻的克麗奧佩特拉，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女人，並不是人們常識中的『美人典型』。」參考艾爾·達利，《埃及古物學：失落千年，中世紀阿拉伯文獻中的古埃及》（倫敦：倫敦大學學院出版社，2005）。

### 三、羅馬帝國的建立——奧古斯都

西元前二七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維「奧古斯都」和「大元帥」的尊榮。屋大維開始政治上的改革，將羅馬從一個共和政體的城邦政治改為較適合於廣大帝國需要的政體。他計畫的目標是保留共和政體的形式，但以「凱撒制度」的模式，加強政府的權力。所以，屋大維雖自稱為「羅馬共和國的復興」，但實際上，卻是羅馬帝國的創建者。

奧古斯都所建立之政府制度通常叫做「二元政治」(diarchy)：亦即由兩個至高無上的權威——他自己和元老院所統治。然而，這兩頭政治卻接近君主政體。他重組元老院，並允許它保留所有從前的聲望，但卻以他的朋友和擁護者加入元老院。他給予元老院任命高級官員的權力，但剝奪了元老院對兩大政治支柱之控制：軍隊和徵稅權。奧古斯都的政府可以稱之為一個皇帝與元老院的共營機構，但是皇帝是一個有支配力的股東，而元老院通常是他的溫馴的僕役。奧古斯都在軍隊方面也做了一連串的變革。他結束了共和末年那種危險的慣例，不允許招募私軍，互相攻擊。奧古斯都成為羅馬軍隊獨一無二的大元帥，任何有意效法凱撒的將領都無力抗衡。他將軍團在邊境各省永久駐紮，隨時抵抗外來的攻擊，取代過去產生變亂威脅時，才倉促調遣軍隊的舊例。在行政方面，奧古斯都讓篤實有能力的人取代了過去的貪官污吏，他明智地任命元老院所推薦人士出任公職。給予重要的商業階級應得之政治權，消除了社會摩擦的根源。奧古斯都改革還統一了稅制，使一般人的負擔不致過分沉重。總而言之，奧古斯都的政策大體上延續了自格拉古兄弟以至凱撒的方向——致力於社

會公平與改造共和，以適應新帝國，締造了「羅馬和平時代」(Pax Romana)的開端，一直延續了兩個世紀(27BC-180AD)。

#### 四、戴克里先及其繼承者的改革

奧古斯都之後，羅馬逐漸邁向盛世，尤其自尼爾瓦(Nerva)建立養子制度，以至奧里略的五位皇帝任內，<sup>26</sup>實為羅馬的治世。但自奧里略(Marcus Aurelius)之子康茂德(Marcus Aurelius Commodus Antoninus, AD180)繼位後，羅馬開始步向衰途。<sup>27</sup>自此以後，羅馬政治漸不穩定，皇帝屢為軍隊廢立，而東方的波斯與北方的日爾曼蠻族恰巧又於此時興起，羅馬的前途岌岌可危。

若非一位強有力的君主出現，則自康茂德以來的混亂狀態，很可能導致羅馬帝國的全面崩潰。這位雄主就是戴克里先(Diocletian, AD284-305)，他開始一連串的激烈改革，結果使帝國成為一東方式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其內涵包括採用東方君主的稱號和禮儀以崇敬先王；建立龐大的官僚組織以加強稅收；任命一個佐帝(Co-emperor)來分擔監督帝國行政與防禦之責任；此外，每一個皇帝都任命一個可信任的副座，或稱為「凱撒」來協助他。帝國以通過亞德里亞海之一條界線分為東西兩半。每一半各有其「奧

---

<sup>26</sup> 尼爾瓦、圖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安多民(Antonius)、奧理略五帝，統治期間，羅馬文治武功均興盛，史家稱「五賢君」。

<sup>27</sup> 康茂德即是電影「神鬼戰士」中的皇帝，據傳他酷愛競技，曾經親身下場比試。電影的結局裡康茂德在競技場為將軍所殺雖為虛構，但也頗符合康茂德的性格。

古斯都」，有其「凱撒」，有其自身的首都。西元三三〇年，東方首都便固定在希臘舊城拜占庭的位置上，即君士坦丁堡；西方的首都，由羅馬移至北義大利之米蘭。經過戴克里先的改革，羅馬的重心逐漸東移，使得帝國能仰仗東方的財富與資源。西元三九五年，羅馬帝國分裂為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的東羅馬帝國，與以羅馬城為都城的西羅馬帝國。西羅馬帝國在四七六年為日耳曼蠻族所滅。直至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為土耳其人攻陷，延續千餘年的羅馬帝國正式滅亡。<sup>28</sup>

## 五、羅馬衰微的原因

雖然戴克里先使羅馬短暫地中興，然而羅馬的沒落畢竟成為難以挽回的趨勢。如此龐大雄壯的帝國，為何會走向無可避免的衰亡？總結前人的論點，約有下列五個原因：

其一，在政治方面，西元一八〇年以後養子制度廢棄，使得羅馬皇帝的繼承發生問題，引發政治情勢的不穩定。而日趨龐大的版圖也使得人民對於政治的參與度越來越低，沒有足夠的人手加入，導致政治為少數人所操縱。

其二，在軍事方面，私軍問題一直沒有獲得解決，它

---

<sup>28</sup> 當時帝國僅存首都，其他領土盡入土耳其人之手。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的君士坦丁堡，就像是處於回教大海中的一個孤島，東羅馬基督宗教最後的堡壘。由於始自西元四世紀以來的信仰分裂，東正教與天主教（二者在一〇四五年正式分裂，史稱「東西教會大分裂」。）之間嫌隙殊深，終究不能真正地和衷共濟，宏偉美麗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最後成為敬拜阿拉的清真寺。對於土耳其攻佔君士坦丁堡一役的過程與意義，奧地利小說家史蒂芬·茨威格在其短篇小說〈拜占庭的陷落〉中有極為精采深刻的描寫。

與政治上的不穩定情勢相結合，便常造成軍人干政之局面，引發內戰的危機。

其三，在經濟與社會方面，羅馬的文明建立在城市上，城市的基礎建立在農業上，而農業的核心又在於勞動力。羅馬早期由於對外戰爭頻繁，所以可以獲得大量的奴隸，但到了後期奴隸來源日少，使得農產減少，城市因而衰敗。加上羅馬人疏於水土保持，以致羅馬本地糧產日減，不得不依賴東方，西方自然日漸衰微。

其四，道德的、精神的、心理的因素也促成了羅馬的衰微。但這些不可捉摸的因素引起許多歷史家爭辯不休。對於基督宗教之時代角色的爭辯就可作為一個例證。在十八世紀，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便認為基督宗教是羅馬悲劇的真正罪人。自從那時之後，吉朋的附從者均極力辯說，當基督宗教傳布全羅馬帝國時，摧毀了羅馬人的公民精神，使羅馬人不再具有純樸、勇敢、正直的美德。但相反的，基督宗教的護衛者認為帝國之衰亡並非由於過分基督化，而是因為不夠基督化。

最後，蠻族的入侵當然是造成羅馬滅亡的主要原因，然而，不宜過度誇張蠻族入侵所造成的破壞。因為在西元四七六年以前，早有許多蠻族進入羅馬境內，甚至擔任羅馬的士兵與官員，以致於當日爾曼人入侵時，羅馬的軍隊並沒有太多的反抗。無怪乎有人說，羅馬的衰亡，是在人們的唏噓而非猛烈打擊下，慢慢地走向盡頭。



## 六、羅馬的影響

### (一) 文化的遺產

羅馬帝國固然滅亡了，然而羅馬的政治組織在東方依舊延續下去，成為中世紀的拜占庭帝國，持續地影響著世界。在西方，羅馬文明也從未滅亡。羅馬的語言與文化，是形成拉丁國家文明最重要的元素，羅馬對於古典希臘文獻的保存更是後世重要的資產。羅馬人對西歐的經營在歷史上也至關重要。如果沒有羅馬人將希臘城市文明傳播到西方，今日的西歐可能還是一片荒蕪。可以說羅馬的歷史是西方歷史的真正開端。

### (二) 法治的概念

羅馬的法律是歐洲國家後來法律的基礎。雖然羅馬法律有它的缺點，譬如，它的法官沒有什麼特殊的訓練，羅馬法也常被用來提高國家的權威以凌駕個人。可是，兩相比較起來，羅馬法的優點遠超過它的缺點。雖然它強調國家的尊嚴，它也強調公民的權利。雖然它承認奴隸制度（幾與每一個古代文明相同），它也給予奴隸合法的補救，以防止殘酷主人過分的剝削。羅馬帝國國內其他附屬的民族並沒有被迫採用羅馬法；他們可以堅持他們自己的法律傳統。在一個羅馬公民與外省居民的案件中，法官並不必然地使用羅馬法。羅馬法終於取代其他的法律制度而普遍地適用於全帝國，主要是靠它自身的優點。

羅馬法律對後來的文明留下深刻而永久的影響，尤其是其中自然法的觀念，它多多少少已形成羅馬天主教的教

會法典和許多歐洲國家法律制度的基礎。它的影響力在拉丁國家的義大利、法國、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拉丁美洲的國家內特別深入。

### （三）科學、工程與美術

羅馬在外科手術及公共衛生方面有重要的發展。外科醫生發明了精巧的鉗子、鑷子及工具來用在特別手術上。他們在甲狀腺腫、扁桃腺與各種結石的手術工作上顯然獲得相當的成功。

羅馬人保持著高度的衛生水準，一直到十九世紀尚聞名於歐洲。他們裝置了廁所及廣大的下水道和排水溝系統，維持城市的潔淨與豐富的給水。

希臘人將他們的最高技術致力於建築神廟，羅馬人往往將他們的技術用在世俗的建築物上。希臘人是用圓柱作建築物的基礎，而羅馬人常用拱門。這對後世建築藝術也有一定的影響。

### （四）永恒的帝國之夢

如果說基督宗教的普世天國給予西方精神的一體感，那麼羅馬帝國則確確實實地給予西方人一種帝國的典範。甚至於有時候，普世天國與帝國的形象難以清楚地劃分。難以估算這種世界一體的思想對於西方究竟有多少的影響，因為它已經深植於西方人的心中。從希特勒的德意志帝國到歐盟的成立在在都可以發現這樣的痕跡。由此也可見，歷史絕不是僅僅受武力與經濟來決定，若無此一概念，歷史上長時期分裂的西方世界，便很難形成一個文明的整體。

## 七、反思

如同前述，羅馬一直被認為是城邦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的綜合體。運作良好時，能在效率與自由之間保持平衡。然而迦太基之役使羅馬人的驕奢之情掩蓋了公民情操時，羅馬走向專制便成為不可避免的道路。同樣地，在羅馬興起之初，元老院的貴族皆能公忠為國，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因此羅馬政治也能蒸蒸日上，從而建立羅馬共和盛世，然而當這種精神消失之後，過去互相參議的制度，便成為彼此攻訐的舞台。激烈的黨爭與權謀交相並起。羅馬的前途也就不言而喻。由此觀之，一個高遠的理想與情操，對於一個偉大的文明是何等重要。它有賴長年的經營，片刻之間卻可以破壞殆盡。

### § 作為轉捩點羅馬帝國：

- 思想：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與羅馬公民觀念。
- 制度：歷經共和、帝制、政教合一與大帝國的管理。
- 典籍：保存希臘古典、創作新的羅馬法與其他相關典籍。
- 城市：羅馬的城市設計、公共設施、空間規劃、建築等。公路、灌溉水道、公共浴池及凱旋門。

### § 參考文獻

1. 理查德·詹金斯編，晏紹祥、吳舒屏譯，《羅馬的遺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 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羅馬帝國衰亡史》（北京：商務，1997）。
3. 郭長剛，《古羅馬》（北京：三聯書店，2001）。

4. 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新華，1999）。
5. 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務，1998）。
6. 周樑楷，《世界文化史》（臺北：龍騰，2002）。
7. 富勒(Fuller JF)著，鈕先鍾譯，《西洋世界軍事史》（臺北：軍事譯粹社，1968）。

### § 思考問題

1. 何以自羅馬帝國滅亡(AD476)後，歐洲長期進入分裂的狀態？
2. 西元八〇〇年，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在羅馬由教皇為其加冕。他的帝國玉璽上刻著這樣的文字：「新羅馬帝國(Renovatio Imperii Romani)」。歐洲人一直視羅馬帝國為「光榮」的情結，還表現在哪些方面？
3. 今日的歐洲正走向統一。歐盟成員已擴展到二十五個國家，日益趨近統一的目標。歐洲統一的驅動力是否具有深厚的歷史根源？

### § 延伸閱讀

1. 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著，王以鑄、崔妙因譯，《編年史》（臺北：臺灣商務，1998）。
2. 邢義田，《古羅馬的榮光——羅馬史資料選譯》（臺北：遠流出版社，1988）。
3. 讓·諾埃爾·羅伯特著，王長明、田禾、李變香譯，《古羅馬人的歡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附錄：古羅馬大事年表

753BC	羅馬建立
509BC	羅馬王政時代結束，共和國建立
390BC	高盧人入侵羅馬
265BC	羅馬統一了義大利半島
264-241BC	第一次布匿戰爭（即迦太基之役）
218-201BC	第二次布匿戰爭
149-146BC	第三次布匿戰爭，迦太基徹底被摧毀
73-71BC	斯巴達克思奴隸大起義
60BC	龐培、克拉蘇、凱撒結成前三頭同盟
58-50BC	凱撒征高盧
49BC	凱撒率軍渡過盧比孔河，進入義大利，開始了與龐培的內戰
44BC	凱撒被刺殺
43BC	安東尼、屋大維、雷必達結成後三頭同盟
30BC	屋大維戰勝安東尼和克麗佩脫拉，羅馬共和國告終，帝制開始
27BC	屋大維獲「奧古斯都」稱號
AD 14	奧古斯都去世
AD 14-68	羅馬帝國朱里·亞克勞狄王朝
AD 64	羅馬城內發生大火，尼祿皇帝嫁禍基督徒，開始迫害基督徒
AD 69-96	羅馬帝國弗拉維王朝
AD 79	維蘇威火山爆發，湮沒龐貝城
AD 96-192	羅馬帝國安東尼王朝，開始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
AD 113-117	羅馬皇帝圖拉真侵入兩河流域，帝國版圖達到最大
AD 193-235	羅馬帝國塞維魯王朝

#### 第四講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的興亡 67

- AD 212 羅馬皇帝卡拉卡拉頒布敕令，把羅馬公民權授予境內所有的自由人
- AD 235-284 羅馬社會陷入危機，是為「西元三世紀危機」，蠻族開始越境入侵
- AD 284 戴克里先登位，開始正式採用君主制
- AD 313 君士坦丁皇帝頒佈「米蘭敕令」，承認基督宗教合法化
- AD 330 君士坦丁遷都拜占庭，改名「君士坦丁堡」
- AD 395 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分
- AD 410 西哥特人攻陷羅馬城
- AD 455 汪達爾人再次洗劫羅馬城
- AD 476 西羅馬帝國皇帝羅慕洛·奧古斯都被廢黜，西羅馬帝國滅亡

## 第五講

# 公元622年：伊斯蘭的征服

- 一、伊斯蘭教興起前阿拉伯半島的形勢
- 二、穆罕默德與伊斯蘭教的創立
- 三、伊斯蘭教的經典和教義
- 四、伊斯蘭教陣營的分裂
- 五、伊斯蘭的征服與擴張
- 六、擴張成功的原因
- 七、伊斯蘭文明的影響

子嗣，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優越，非阿拉伯人也不比阿拉伯人優越；白人不比黑人優越，黑人也不比白人優越；除了敬畏阿拉並作善功者外。你們要知道，所有穆斯林都是兄弟。你們不可隨意擅取他人物品，出於自願者除外。你們不要做不公義的事。

——穆罕默德，「最後宣講」。

「伊斯蘭」(Islam)一詞原意為順從，即順從真主意志的宗教。主要傳播於西亞、北非、中亞、南亞、東南亞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西歐、北美、非洲等地區迅速傳播。現約有信徒九億多，是最有活力的世界性宗教之一。信奉伊斯蘭教的人稱為穆斯林(Muslim)。

七世紀之後，隨著伊斯蘭教的創立，強盛的阿拉伯帝國<sup>29</sup>(Arab Empire, AD632~1258)驟然崛起，充滿活力的阿拉伯民族基本形成，輝煌燦爛的阿拉伯文明開始誕生。這一切不僅使在古典時代一直沉寂著的世界第一大半島——阿拉伯半島，一躍成為人類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也改變了周邊許多民族的發展進程，使得孕育過兩河流域、恆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等諸多古典文明的西亞、南亞和北非地區的面貌煥然一新，到十一世紀時，它們語言上已阿拉伯化，文化上已伊斯蘭教化。阿拉伯語成為從波斯到大西洋廣大地區的日常用語，新出現的伊斯蘭教文明是前猶太教文明、波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和希臘—羅馬文明的獨創性的綜合體。更使人類中古文明的發展呈現出新的格局，並對人類近現代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一、伊斯蘭教興起前阿拉伯半島的形勢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蘭教發源於西元七世紀時的阿拉伯半島。此地之前的歷史發展乏人關注。然而，這樣一個偉大的宗教與文明的產生，絕非偶然，必有其特殊的歷史條件與背景環境。

阿拉伯半島位於亞洲西部，幅員遼闊，面積相當於歐洲的四分之一強。但自然條件比較惡劣，土壤澆薄，終年乾旱少雨，絕大部分地區都是沙漠和草原，唯有南部的葉

---

<sup>29</sup> 中國史書稱為大食帝國，西歐則習慣將其稱作薩拉森帝國。帝國最強盛的時候，疆域東起印度河和中國邊境，西至大西洋沿岸，北達裏海，南接阿拉伯海，是繼亞歷山大帝國和羅馬帝國之後，又一個地跨三洲的大帝國。



門較適合農耕。北方的拜占庭和波斯兩大帝國為爭奪西亞霸權，展開曠日持久的戰爭。五二五年，拜占庭盟邦衣索比亞人攻佔半島南部葉門地區，滅阿拉伯的希米亞王國。後來，波斯軍隊又驅逐衣索比亞人，佔領葉門。這兩次入侵使南阿拉伯的農業文明遭到徹底毀滅，定居該地的人口大量北遷，重新返回遊牧或半遊牧狀態。此後，愈演愈烈的諸國爭霸戰爭，使傳統的國際商路由阿拉伯半島西部轉移到波斯灣和兩河流域，居住在希賈茲(Hejaz)地區、以經商為主要收入的貝杜因人(Bedouin)因而失去了賴以生存的財路，麥加商人蒙受重大經濟損失，陷入困境。在商路被阻斷的情況下，麥加商人將大量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盤剝貧苦民眾。生存環境的惡化，給已處於文明世界門檻上的阿拉伯社會猛烈的衝擊，貧富差距增大。

由於乾旱的沙漠氣候和人口增長的壓力，游牧部族幾乎時時處於飢餓狀態，為了爭奪水源、牲畜和牧場陷入相互攻伐和仇殺之中，唯一的生存之道便是組成團隊。因此，這些游牧者便以血緣和親戚關係為基礎，組成了一支高度自治的團隊，他們因為有著共同的祖先（無論是事實或神話傳說）緊密結合在一起，彼此也以某某人之子民相稱，例如「卡勒卜的子民」(Bani Kalb)或「阿薩德的子民」(Bani Asad)。這些團隊又和其他團隊組成規模較大但較為鬆散的組織。為了防止部族太過擴張無法管理，大小團隊都不斷重組。對各部族乃至所有的盟邦而言，絕對忠誠是必要的，唯有集結團隊之力，個人的生存才有保障。如此一來，就談不上所謂個體自主性與相關的權利與義務，凡事都必須以團體的利益為依歸。

為了保衛部族，領導者必須隨時對外來的傷害展開反

擊。當時半島上沒有中央集權的政體，也沒有共同的律法，維持基本安定的唯一方法就是血債血償，也就是部族間的相互報復。殺人也不是什麼不道德的事，殘殺族人或盟友才有錯。部族中若是有人遭到殺害，必須殺死兇手的族人報仇；如果未能報仇雪恨，部族就不受到尊重，他族可以任意加以殘殺，不必顧慮遭到報復。一個人要逃逸無蹤，在此地並不困難，既然不一定能抓住兇手，因此，兇手所屬的部族必須同樣損失一個成員以為懲罰。在此清楚顯示了部族共同體的觀念：行為的個人其實無關緊要，同族之人皆可能受到影響。當然這也有勢力平衡的作用；被侵犯的一方固然有所損失，但是來犯的一方也會被同等削弱。這種作法固然讓各族群維持勢均力敵，同時卻也阻礙了大一統阿拉伯帝國的形成。阿拉伯人不但未能將有限的資源集中運用，反而陷入無窮無盡的暴力循環，報復沒有一定的標準與制約，血債血償衍生更多的血債。

沙漠生活的不穩定性、冒險性和各部落的分散孤立性，使多神自然崇拜成為當時阿拉伯人的宗教觀。商業重鎮麥加(Mecca)也是宗教中心，城內有一座聖殿，即著名的卡巴(Kappa)古廟，又名「天房」，許多阿拉伯部落都以該古廟為祭祀聖地，供奉了形形色色的偶像，其中最特別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一塊被尊為神奇之石的黑色的隕石，受到不同教派門徒的崇拜。庫賴什(Kurashi)部落控制著這一古廟並支配著麥加地區的經濟生活。

## 二、穆罕默德與伊斯蘭教的創立

### （一）年輕時的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Muhammad)於西元五七〇年六月八日，降生於麥加，西元六三二年逝世，享年六十二歲。其家族屬於庫賴什部落。他在六歲時父母雙亡，由祖父及叔父阿布泰利伯(Abu Talib)相繼扶養長大。阿布泰利伯是隨著駱駝隊四處經商的生意人，穆罕默德可能就是在陪伴叔父往來各地的旅途中，聽聞不少基督宗教和猶太教的教義，將其融入日後他所創建的伊斯蘭教當中。大約在他二十四歲時，受雇於一位富孀卡蒂雅(Khadija)，協助管理駱駝商隊的事務，之後更與年長他十五歲的卡蒂雅結婚，婚後生了四子四女，但只有一個名叫法提瑪(Fatima)的女孩長大成人，其餘盡皆夭折。法提瑪後來嫁給阿布泰利伯的兒子、什葉派的重要領袖阿里(Ali)為妻。

### （二）改變一生的神祕宗教體驗

由於妻子富有，穆罕默德衣食無憂，生活與一般有錢商人無異。直到西元六一〇年，也就是他四十歲時，穆罕默德堅信他在麥加城外山區聽到了來自天上的聲音，告訴他阿拉(Allah)是至高無上的造物主，除了阿拉以外別無神祇，而他本人則是神的最後一位先知，有責任將神的訊息傳達給他的同胞。這次神祕的宗教體驗改變了他的一生，最終改變了這世界許多地區的面貌。

### （三）早期的傳教事業

穆罕默德開始於麥加地區展開傳教的事業。此時，阿拉伯人信奉多神，阿拉只是其中之一，不具特殊地位。穆罕默德公開傳布一神論的信仰，就引來他們的訕笑和攻擊，傳教的工作在起步時進行得並不順利，只有少數一些人，主要是近親投入他的門下。不順的原因，除了絕對的一神論對於阿拉伯人來說不合常理外，統治麥加地區的庫賴什部落中居主導地位的人物，則害怕接受這一新宗教可能會剝奪天房、繼而是麥加在原本阿拉伯信仰體系中所擁有的核心地位，所以對穆罕默德多所排拒和打壓。六二二年，穆罕默德及其信徒被迫遷往位於麥加北邊的麥地納（Medina，意為「先知之城」），他們控制了此地，實行以宗教領導政治的神權統治制度。這次遷移，在阿拉伯語中叫作「Hijrah」（希志來），可說是伊斯蘭教發展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此六二二年就被穆斯林視為伊斯蘭紀元的起始年。

### （四）征服麥加

到麥地那後，穆罕默德成功地調解了該城原有部落間的爭端，建立了威望。他開始將自己的主張付諸社會實踐，以穆斯林的麥加遷士和麥地那輔士為基本力量，組建起穆斯林公社烏馬，並制定憲章，作為處理內部和外部事物的準則。為了鞏固新生政權，穆罕默德指揮烏馬公社，以戰爭籌集財富和武器。他率領追隨者襲擊在麥加城外行走的庫賴什(Quraysh)商隊，庫賴什人奮起抵抗，但穆罕默德的追隨者在宗教熱情的鼓舞下，最終擊敗了頑強的庫賴什

人。六三〇年，穆罕默德以勝利者的姿態重回麥加城，他下令毀棄所有的偶像，獨獨保留卡巴神廟內那塊黑色隕石作為伊斯蘭教的主要聖物，卡巴神廟成為聖地，麥加則是聖城。此時他已聲威遠播，很多阿拉伯部族接受了他的信仰。自此，阿拉伯半島開始以伊斯蘭教為核心，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

### 三、伊斯蘭教的經典和教義

大約在七世紀中葉時，穆罕默德的弟子將其生前言行整理抄錄成冊，形成伊斯蘭教最重要的經典《古蘭經》，共三十卷，一百一十四章。據說《古蘭經》是阿拉的語言，透過天使降示給穆罕默德，再由穆罕默德傳達給世人。<sup>30</sup>他從倡行、維護獨尊阿拉真主的一神教出發，借助猶太——基督宗教的某些觀念，對當時阿拉伯半島的種種社會問題予以解答，逐步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教義體系。《古蘭經》簡述了伊斯蘭教的基本宗教原理，又解答了廣泛的社會立法和倫理問題；既展現出一個博大精深的宗教理論體系，又表現了穆罕默德除舊佈新、改造社會的宏偉構想和務實主張。《古蘭經》不僅只是一部宗教經典，也是阿拉伯社會的政治、經濟、司法、軍事體制的理論基石，其中還記述了許多流傳於阿拉伯半島的猶太教、基督宗教和島內各部落的神話、傳說、諺語等。它同時也能反映出早期阿拉伯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法律等活動，具有極重要的歷史價值。

---

<sup>30</sup> 《古蘭經》的「古蘭」兩字為阿拉伯語，原意兼有閱讀和朗誦之意。

## （一）六信

伊斯蘭教教義可簡單分為六信和五功來說明。所謂「六信」：其一，信阿拉，奉阿拉為宇宙中唯一的神，此乃伊斯蘭教信仰的基礎；其二，信天使，天使是阿拉的忠實使者和人類的的朋友，他們神通廣大，各司其職，專供阿拉差遣；其三，信先知，先知是阿拉派到人間拯救世人的代理人，阿拉曾在不同時期向每一個民族都派遣過先知。每位先知都負有傳播宗教的使命，能力非凡，穆罕默德更是集大成的最後一位先知；其四，信經典，阿拉曾給每位先知降示過一部經典，而《古蘭經》是最後一部完美無缺的經典，因為在《古蘭經》以前的其他經典，有的已遭篡改，有的已失傳；其五，信來世，今世是短暫的，來世是永恆的，當世界末日來臨時，每個人都將在阿拉面前接受審判，善者進天國，惡者下地獄；其六，信前定，這是伊斯蘭教宿命論的核心，即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都是由阿拉預先安排的，是由阿拉意志決定的。因此對於命運，個人既不能違抗，也不能選擇，只有承認和順從阿拉的安排才是唯一的出路。

## （二）五功

信徒想要在世界末日時得到神的救贖，除了必須過一種操行端正的生活，還要恪守一些固定的教規，即念功、拜功、齋功、課功和朝功等五功。念功，信徒在宗教活動和禮拜時都必須反覆誦念「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阿拉使者」，以表達和深化自己對阿拉的信仰。拜功，信徒每天五次面對聖地麥加，向阿拉禱告、敬拜，以保持

心靈純淨，祈福消災。齋功，信徒在每年齋月（伊斯蘭曆的九月）必須實行齋戒，月內每天黎明至落日這段期間內禁止飲食，病人、孕婦和旅行者可延期補齋，或以施捨來替代。課功，這是以阿拉之名向信徒徵收的宗教稅，約相當於財產的四十分之一。朝功，每個身體健康又有經濟實力的信徒，一生中至少應去麥加朝聖一次，以示對阿拉的虔誠。此外，伊斯蘭教還號召信徒在阿拉的指引下，對不信阿拉者發動Jihad（「聖戰」）。<sup>31</sup>聖戰的口號有助於阿拉伯

<sup>31</sup> Jihad，有人譯為聖戰，本為「奮鬥」之意，是傳播和捍衛伊斯蘭信仰而奮鬥的諸多行為的統稱。履行方式概括為心、口、手、劍四個層面，穆斯林履行 Jihad 義務，經常主要的途徑只能是和平的心、舌、手方式。「心」即按照真主的教導，自覺地同內心邪惡作不懈鬥爭，以抵制誘惑，淨化心靈，堅定信仰。什葉派和蘇非派教法家尤其推崇這種方式，稱之為「大 Jihad」。「舌」和「手」的方式，泛指以口、筆傳播伊斯蘭，勸誡大眾信奉伊斯蘭，駁斥教內的異端邪說和教外的歪曲攻擊。「劍」的方式即是使用武力，是面臨信仰或生命存亡危機時之防禦手段。在伊斯蘭教早期反對參加多神教徒的暴力迫害和軍事進剿的鬥爭中，「聖戰」對於穆斯林的生存和伊斯蘭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而是當時 Jihad 的主要履行方式。近現代的伊斯蘭聖戰離不開伊斯蘭復興運動和崇尚聖戰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浪潮。十九世紀末葉，蘇丹等阿拉伯國家掀起反帝反殖的鬥爭也打著聖戰的旗號。及至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伊斯蘭國家發動了新時期的「聖戰」，旨在根除外來統治和佔領，爭取國家的獨立和解放。二戰結束後至七〇年代，在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伊斯蘭聖城耶路撒冷落入「敵手」的背景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迅速蔓延，有些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聲稱要對美國和以色列進行「聖戰」。與此同時，伊朗、阿富汗、黎巴嫩、巴勒斯坦、車臣、伊拉克等地的「聖戰」之聲此起彼伏，打著獨立、自治、建國、反美等等各不相同的旗號。值得注意的是，近現代的伊斯蘭聖戰已不僅限於國際領域，埃及和阿爾及利亞的一些激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在國家內部也發動聖戰，矛頭指向「屈從」西方意志的政府。

的統一和國家的建立，但後來卻也變調為對外擴張的工具。

## 四、伊斯蘭教陣營的分裂

### (一) 哈里發制度的成立

穆罕默德沒有男嗣，生前亦沒有指定繼承人，因此在他逝世後，他所創建的合宗教、政治、軍事為一的團體，面臨能否存續的考驗。但是自他初創教以來就跟隨著他的阿布·巴克（Abu-Bakr，在位時期630~634）和奧馬（Omar，在位時期634~644）很快就採取了果斷的行動，他們先後擔任伊斯蘭教第一、二任的「哈里發」（Caliph）一職。就宗教意義上而言，哈里發意為「先知的代理人」；而在現實世界裏，哈里發就是阿拉伯帝國成立後的最高元首、軍事統帥和宗教領袖，擁有宗教和世俗大權，控制著從中央到地方的軍政、稅收和宗教三大權力系統。中央由各部大臣執掌政務，輔助哈里發。地方分為五大行政區，各區置總督，統理一方軍政，但財賦稅收一直由哈里發任命的專職稅務官司理。地方司法由總督任命的法官負責，多由精通《古蘭經》和《聖訓》的伊斯蘭教學者擔任，專司穆斯林案件，而非穆斯林則由各自宗教領袖負責。帝國高級官員多由阿拉伯貴族充任，低級官吏則由原拜占庭及波斯的官吏擔任。

### (二) 什葉派和索尼派

第二任哈里發奧馬後來被謀殺身亡，由奧斯曼

---

他們以發動恐怖襲擊和顛覆活動的方式，主張在國家社會生活中恢復並恪守古蘭經和伊斯蘭法典。



(Othman, 在位時期644~656) 繼任哈里發。奧斯曼出身於阿拉伯奧馬雅(Omayyad)家族，該家族最初並未響應穆罕默德的號召。奧斯曼本人則軟弱無力，施政不得民心。那些對奧斯曼不滿的人就聚集在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周圍，而阿里的血統、背景和好戰精神在這批人眼中似乎更適合充當伊斯蘭教的領導人。於是，為了哈里發的繼承人選問題，伊斯蘭陣營逐漸分裂成二派：一派是什葉派(Shiites)，或稱基本教義派，主張哈里發應由先知家族產生的人來繼承，並只承認《古蘭經》為伊斯蘭教的唯一經典。與他們立場不同的是素尼派(Sunni)，認為哈里發可選任何適當之人擔任，而《古蘭經》以外的先知聖訓亦可補充教義。

西元六五六年，什葉派獲得短暫勝利，阿里當選第四任哈里發，但二派間仍爭鬥不休，內戰頻頻之後，阿里在六六一年被謀殺。素尼派的領袖，同時是奧馬雅家族中的一個成員，成為新一任的阿里發，遷都至大馬士革建立起奧馬雅王朝(660~750)，以世襲的方式來建立繼承人。然而，什葉派並不因此氣餒，在七五〇年推翻奧馬雅王朝並屠殺其家族九十人，另立穆罕默德叔叔阿拔斯(Abbas)的後人阿布·阿拔斯為哈里發，把朝廷東移至巴格達（現伊拉克首都），是為阿拔斯王朝，直到一二五八年蒙古人入侵為止。什葉派和素尼派間的衝突持續至今。由於經常遭到迫害，因而什葉派發展成一個十分好鬥的團體，同時深信只有他們才是真正信奉伊斯蘭教的人。今日，他們統治著伊朗地區，在伊拉克也有眾多信徒，但人數大概只佔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的十分之一。

## 五、伊斯蘭的征服與擴張

儘管領導中心有變，但伊斯蘭勢力的擴張並未停止，且速度非常驚人。當西元六三二年穆罕默德逝世時，伊斯蘭所控制的地區不過為阿拉伯半島三分之一的土地，但百年以後已跨越三大洲，征服敘利亞、波斯、印度、埃及、北非、西班牙等地。

在阿布·巴克成為哈里發後，立即採取軍事行動，征服了各個曾追隨穆罕默德而今不願接受其繼承人領導的阿拉伯部落。這些軍事行動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在此過程，阿布·巴克的軍隊開始踏出阿拉伯半島的邊界，進一步向北擴張。第二任哈里發奧馬繼續執行向外擴張的政策。此後阿拉伯人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他們本來預期擴張必定會引來臨近波斯和拜占庭帝國強而有力的抵抗，但實際上不然，令他們大吃一驚。六三六年，阿拉伯人在敘利亞大敗拜占庭的軍隊，隨後便橫掃這一地區，佔領了大馬士革、耶路撒冷等主要城市。六三七至六五一年滅亡波斯。至於拜占庭帝國，因其心臟地帶君士坦丁堡離阿拉伯本土路途遙遠，且城池固若金湯，阿拉伯人轉而以蠶食的方式奪取拜占庭帝國的其他領土。先是在六四六年把拜占庭人從埃及趕出去，隨後揮戈西向，佔領了北非一帶。七一一年，阿拉伯人更經由北非越過直布羅陀海峽攻入西班牙，很快就控制了這一地區的絕大部分。就這樣，在短短的一百年間，穆斯林控制了波斯帝國全境以及原屬古羅馬帝國的大片地區，一個龐大的阿拉伯帝國出現在世人眼前，其力量和影響再也不容忽視。除保持伊斯蘭教神權統治原則外，阿拉伯帝國大量吸收以拜占庭帝國為主的其他文明國

度的制度，形成一種伊斯蘭世界所特有的、政教合一的君主政體。帝國存在了六百多年，主要分為神權共和（哈里法）時期(632~661)、奧馬亞王朝時期(661~750)和阿拔斯王朝時期(750~1258)。阿拔斯王朝最初的百年間，帝國的對外擴張已達極致狀態，國內政治穩固，社會安寧，農商發展，文化昌明，聲威遠播，是帝國國勢極盛的「黃金時代」。但由軍事封土造成的強大地方割據勢力，對阿拔斯王朝統治構成了嚴重威脅。各地總督和軍事統帥，因封土制的推行，逐漸獲得擁兵自雄、割地自立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九世紀初，帝國內部的離心傾向已成為不可遏制的力量，使帝國大廈千瘡百孔。大小王國旋起旋仆，忽生忽滅。到十世紀中葉，王朝實際統治區域僅限於巴格達及其周圍地區。一〇五五年，塞爾柱(Seljuq)突厥人占領巴格達，哈里發失去了一切行政權力，只保留了宗教領袖的地位。一二五八年，成吉思汗之孫旭烈兀率領蒙古軍隊攻陷巴格達，殺死哈里發，阿拉伯帝國滅亡。

## 六、擴張成功的原因

阿拉伯人向外擴張的成果為什麼如此豐碩？可從兩個方面來看，其一是觀察阿拉伯人向外擴張的動力是什麼，其二則是瞭解他們遇到了什麼樣的有利形勢。

### （一）經濟動機與宗教熱情

阿拉伯人的擴張也許宗教動機不強，但阿拉的信仰的確促使鬆散的阿拉伯人團結起來。驅使阿拉伯人走出沙漠的原因，還有尋求財富的渴望，讓阿拉伯人越走越遠，以

*image  
not  
available*

此外，波斯和拜占庭的人民對其統治者施加的重稅皆心存憤恨，而且，在拜占庭統治下的敘利亞和埃及，有許多信奉基督宗教異端的教徒遭受君士坦丁堡正統教派的迫害，深感痛苦。由於阿拉伯人不要求被征服者皈依伊斯蘭教，所征的稅額也比拜占庭人和波斯人要低，因而，往往比舊有的統治者更受歡迎。正如一位敘利亞基督宗教作家寫道：復仇之神借助阿拉伯人把我們從羅馬人（指拜占庭帝國）的手中解救出來。就是因為上述種種原因，伊斯蘭教能夠迅速傳播，發揮廣大的影響力。

## 七、伊斯蘭文明的影響

由於幅員遼闊，政權強大，經濟繁榮，境內有美索不達米亞、埃及、波斯等古代文明的豐富遺產，又同大唐帝國、拜占庭及印度等東西方文化昌盛大國相毗鄰，各種不同成分的文化匯聚，最後孕育出新興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阿拉伯語言與文字成為文化統一的載體；伊斯蘭教及其人生價值觀念成為這種文化的核心內容，從而使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體系。伊斯蘭教不只是一個宗教，它也是所有穆斯林所共同擁有的一種生活方式，這也是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基督宗教最大的不同之處。伊斯蘭教試圖建立起一個立基在日常生活規範與宗教戒律間相輔相成的社會，這樣的企圖是世界性的，而非僅在單一地區施行。雖然，各地施行的狀況和程度一定有不同，但伊斯蘭教仍舊持續朝著這個方向前進。這也是為何穆斯林間的語言、文化、種族等雖不相同，但他們卻能倚靠著一種偉大的宗教和制度團結組織起來，從而促成伊斯蘭一

體文明的出現。

宗教之外，伊斯蘭文明無論是在哲學、醫學、數學、天文、物理、化學、文學、藝術、農業、水利建設、機械製作上，也有十分輝煌的表現。歷代哈里發均獎勵學術，提倡文化，重視教育，而且不惜重金延攬人才，搜集古籍，設置國立文化翻譯機構。九世紀初，哈里發鼓勵並組織對希臘古典哲學的大規模翻譯活動。一時間王使四出，尋訪古籍抄本；國立巴格達「智慧館」更以重金招徠翻譯人才。據傳，其稿酬以與譯著重量相等的黃金來支付。幾十年中，柏拉圖(Plato)、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歐幾里德(Euclid)、托勒密(Clandius Ptolemaeus)、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等大批希臘人和印度、波斯人的哲學、科學和醫學名著的譯本經整理、注釋之後，相繼問世。這一堪稱人類翻譯史上的偉大工程，既使人類古典文明的輝煌成果在中古時代得以新生與繼承，也為阿拉伯文化的創新與昇華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古希臘科學和哲學幾乎被西方完全遺忘的時候，阿拉伯人卻保存並發展了這些知識。十世紀中葉，阿拉伯人在科爾多瓦建立了第一所大學，隨後塞維爾、馬拉加、格拉納達、開羅和巴格達等地也都出現了大學。除學校之外，遍布各地的清真寺、天文臺、圖書館和醫院等機構也都兼有教育的功能。

伊斯蘭世界的這些知識成果滋育了後來西歐的幾代人。例如，伊斯蘭數學家花拉子密(Al-khowarizmi)，醫學家格林·伊本·西那(ibn Sina，阿維森納)，化學家賈比爾·伊本·哈揚(Jabir ibn Hayyan，格貝爾)等人的科學著作在十二世紀以後漸次被譯成拉丁文或歐洲其他文字。這些書籍大都被採用為大學的專科教材，有的應用時間長達五

百年之久。甚至到了十八世紀，伊本·西那的某些作品仍然是大學生們的應用教材。伊本·魯世德（ibn-Rushd，阿維羅伊）的著作在十三世紀幾乎全部被譯成了拉丁文和歐洲其他文字。他的理論「雙重真理說」是歐洲啟蒙思想之一。當阿拉伯帝國四處擴張之際，西方正值中古黑暗時期，眼見這在東方的大半島興起的政治宗教勢力來勢洶洶，而且也入侵西班牙及威脅到歐洲的中心部位，西方人在此壓力下，受到刺激而努力促成西方文明的再起。

#### § 作為轉換點的伊斯蘭教：

- 使拜占庭削弱，從西班牙到印度的西方世界都有較近的商業關係，在思想上使中國西邊的世界都大有影響。
- 若無回教，可能轉向基督宗教，但對天主教有利，東方正教與回教競爭，使教宗成為西方教會之首領，且削減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精神地位，回天兩教並行發展，直到十字軍東征才再交鋒。
- 回教結合古今文明，保持科學學習的精神不滅，直到文藝復興。其對西方影響，可以從英文中有不少字彙，來自阿拉伯語得知，尤其是科學方面。

#### § 參考文獻

1. 王俊榮、沙秋真編著，《穆罕默德》（臺北：婦女與生活文化，2000）。
2. 尼尼安·斯馬特著，高師寧等譯，《世界宗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3. 德尼茲·加亞爾、貝爾納代特·德尚等著，蔡鴻賓、桂裕芳譯，《歐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4. 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rvrianos)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新華書店，1999）。
5. 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務，1998）。
6. 王曾才，《世界通史》（臺北：三民，1993）。

### § 思考問題

1. 為何阿拉伯世界容易接受伊斯蘭教信仰？
2. 伊斯蘭教於西元七世紀版圖擴張至歐洲，其留下的遺產為促使文藝復興原因之一，試思考其遺產為何？

### § 延伸閱讀

1. 《古蘭經》
2. Karen Armstrong著，王瓊淑譯，《穆罕默德——先知的傳記》（臺北：究竟出版社，2001）。
3. 馬吉德·法赫里著，陳中耀譯，《伊斯蘭哲學史》（上海：上海外語，1992）。
4. 許倬雲，〈試論伊斯蘭文化體系與東西方兩大文化的互動〉，《歷史月刊》169期（2002，臺北）。



## 第六講

### 公元800年：歐洲的中古時期

- 一、中古初期的背景——帝國崩潰、文明消亡
- 二、第一次農業革命
- 三、封建制度
- 四、大學的出現
- 五、政教的衝突
- 六、十字軍東征
- 七、宗教的發展
- 八、黑死病
- 九、中古與現代的關係

我注定生活在狂風暴雨之中，處在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而你們……一個更美好的時代翹首以待。一旦黑雲消散；我們的後人將再次沐浴在昔日榮光下。

——詩人佩脫拉克（十四世紀四〇年代）

生活在紀元五〇〇到一五〇〇年間的人們並不自認為是處在「中古時代」(The Middle Ages)或是「中古的」(Medieval)人。「中古時代」和「中古的」這兩個名稱是由十六世紀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後的學者及文人提出。這些早期的現代人極為讚賞希臘和羅馬的偉大成就，也以同

樣的熱情自我讚賞。他們認為在羅馬陷落後至美洲大陸發現之間的一千年左右時間，是介於「古代」(ancient)和「現代」(modern)兩段黃金時期間的不景氣時代。對他們來說，中古時代好像是一段充滿著混亂、無知、迷信和野蠻的時代。換言之，中古時代是介於古代和現代光輝燦爛的白晝間之漫長黑夜。

然而在十九世紀，世人，特別是在十九世紀早期的浪漫派(Romanticism)，對「中古時代」的成就極為敬重和欽羨。不過他們的敬重和欽羨並未能完全掃除舊日對中古時代的輕蔑心理。時至今日，大多數人，特別是一些新教徒或教外的一般人士，仍然以為中古時代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低調。有許多人仍不太清楚那些中世紀的巴黎教堂，如查特(Chartres)或坎特伯里(Canterbury)教堂，是人類的輝煌成就，稱之為偉大亦足以當之。如果說中古時代是人類發展史上的黑暗時期，試問，中古時代怎麼可能有如此偉大的成就呢？

許多在現代看來十分偉大的成就，都能從中古時代中找到根源。因此，可以從兩個方向來觀察中古時代。第一，如果把中古時代當作一個完整的文化期，就可以看到此一文化的緩慢成長，臻於成熟，達到高峰，而後衰退下來的過程。第二，觀察他們的經濟政治和思想的某些方面，可以發現中古時代是現代社會的醞釀期，是現代社會的苗圃。

## 一、中古初期的背景——帝國崩潰、文明消亡

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原本一統於羅馬人的廣大疆

土，除了尚在東羅馬人控制下的巴爾幹半島以外，其餘都淪為日耳曼各部落分食的目標，整個古典文明也隨著羅馬統治的崩潰而幾近消亡。中古時期就在這個帝國崩潰，文明消亡的背景下展開。

儘管日爾曼各蠻族原本皆有自己的文化，並在入侵歐洲之後紛紛建立起自己的國家，但在羅馬滅亡後數個世紀，也就是中古前期(AD600~1050)，無可否認，歐洲的文明水準遠遠落後於鄰近的拜占庭與伊斯蘭地區。正如十世紀一名阿拉伯地理家寫道：「他們人高馬大，行為粗俗，性格粗野，頭腦愚鈍……那些住在最北方的人，尤其愚笨、粗鄙和殘忍。」<sup>32</sup>這樣的情形一方面是因為，當蠻族進佔歐洲時，並沒有受到羅馬文明太深的影響，西歐與東北歐原本即是羅馬文明的邊陲地帶，羅馬人在該區的根基原本不深，一旦其統治崩潰，駐軍官員撤退，城市建築毀損，這些地方幾乎立刻回復過去的蠻荒時代。另一方面，東哥德人在義大利、汪達爾人在非洲所建立的王國皆未能長久，不久即被東羅馬人給消滅了；西哥德人在西班牙的勢力，也為東邊新興的阿拉伯人所取代；至於盎格魯撒克遜人於英格蘭所建立的諸小國，彼此刀兵不斷，不成氣候。這樣一來，佔據高盧（今法國和比利時一帶）地區的法蘭克人，就成為西歐殘存的一個主要的蠻族勢力。歷經兩世紀的紛亂，法蘭克酋長克洛維(Clovis, 466~511)終於創建了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統一了今日法國與比利時的大部分。但是他並沒有把這一王國完整地傳給後人，而是按

---

<sup>32</sup> 西班牙明星安東尼奧班德拉斯主演的電影《終極奇兵》，便很生動的把當時阿拉伯文明人眼中殘忍野蠻、半人半獸的歐洲人形象表現出來。

照蠻族的習俗，把王國交由幾個兒子分而治之，王國因此分裂了二百多年（從五世紀末到八世紀初），各地區間因此相爭不休。這段期間，遂成為歐洲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之一，貿易萎縮，城市衰落，文字幾乎絕跡，暴力肆虐，戰斧統治著只能勉強自給的農業。上述情形，從當時小民流行的一種說法，可以得到更清楚的印象：一頓上好的筵席通常由兩道飯菜組成：一道是粥狀的麥糊，一道是麥糊狀的粥。

就在這彷彿萬古長夜之中，一些新的因素，圍繞著教會與蠻族王國的結盟發展出來，使歐洲擺脫了地中海地區的影響，逐漸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西元五九〇年登基的教皇格列高利（Gregory I，在任590~604），開始擺脫拜占庭帝國的控制，建立起自身的權威，同時大力資助本篤會修士前往西歐各地傳教。這個政策，日後成功地促使英格蘭與法國地區皈依基督宗教，並使法蘭克統治者明確意識到教會對其統治與征服中歐的重要，而與之聯合起來。西元八〇〇年，教皇為法蘭克人加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 742~814)加冕，尊其為羅馬人的皇帝，正是這種上帝與凱撒策略結合的發展結果。也就在這樣的發展中，有了查理曼大帝時期的加洛林(Carolingian)文藝復興，這場文藝復興運動的目的兼具實用性與象徵性。一方面，查理曼大帝為了要宣揚基督宗教，急需一批受過教育的修士和神職人員；此外，要治理這一片廣大的國土，也需要培養一批知書識字的人。事實上，整個中古時期，教士作為主要的文化人，一直是統治官員的重要來源。同時，藉由抄寫、訂正一些古羅馬的經典之作，也是象徵性地宣告自己才是羅馬帝國的正統繼承人。

因此，儘管加洛林文藝復興的內容主要僅是對幾乎失落的古典文化的重拾與工具應用，但卻標示著歐洲已告別蒙昧蠻荒，走上了獨立的文明發展道路，黑暗時代其實已透露曙光。八〇〇年之前，只有東羅馬帝國的皇帝會宣稱自己是羅馬的直接繼承人。即使拜占庭已無力干涉、統治西歐，但前者仍視後者為其遙遠的領土，對任何一位自許為羅馬繼承者的西歐人都大力反對。查理曼大帝被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不僅代表一統帝國理念在西歐的復活，也等於是向世人宣告了西歐的自信和獨立。因此，儘管在西元一〇五〇年時，查理曼大帝的帝國已四分五裂，歐洲在表面上也沒有什麼更新的發展，但實際上西元六〇〇年到一〇五〇年這一段時間，取得了不少成就。首先，透過把重心轉移到瀕臨大西洋的西北歐地區，歐洲文明開始在這片不久就將創造大量農業財富的地區發展起來；再者，透過格列高利以降查理曼大帝等人建立的文化傳統，歐洲文明逐漸以西方基督宗教與拉丁遺產形成了一種文化統一的情感，只待條件更加成熟，歐洲文明就要大步向前。以下將討論是哪些條件帶領歐洲從落後中崛起。

## 二、第一次農業革命

一〇五〇年前，歐洲的農民大都連鋤頭都沒有，即使有，也以木製為主，這使農民面對西北歐沖積平原肥沃但濕黏的土壤一籌莫展，難以充分利用土力或改善排水。然而，一〇五〇年之後，較為穩定和平的局面出現，人們始有餘力運用先前發明的改良技術從事生產，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重犁的運用。重犁不同於羅馬人只能翻開輕薄沙

土的輕犁，乃是針對西北歐的土壤而設計，它可以輕易地翻開厚重濕黏的土壤，使土壤充分通風，耕出的犁溝也大大有助改善泥滂地的排水。為適應重犁的使用，又發展出三田制，這是因為農人通常共同擁有牲口與重犁，為方便工作與適應重犁不易轉彎的特性，農人於是在狹長無圍籬的地塊上集體耕作，互相支援，從而有可能使每年休耕三分之一田地用做放牧，由於重犁帶來的深耕與三田制維持了地力，糧食生產得到巨幅的增長。相應而生的還有新型的馬軛，可以使馬匹拖拉重物時不會窒息，因此使馬匹拖拉的力量提升四到五倍，這也使耕作的效率大為增加。最後，鐵的普遍使用，使一切農具都更有效率。上述變革，因而被稱為第一次農業革命。

農業的進步使糧食產量大增，不僅人口跟著增加（一〇五〇到一三〇〇人口增加了三倍），人們也不必全數投入糧食生產，有餘力從事農業以外的活動，這就為城市與商業的復興帶來條件，商業繁榮也為教育與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資金。因此一〇五〇年以後，中世紀進入了繁盛期。

### 三、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Feudalism)為中古時期歐洲，尤其是西歐政治、社會、經濟乃至軍事秩序的基石。封建制度在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權力極為分散的制度。大概是在十世紀時的西歐，封建制度開始普及，其中以法國、英格蘭施行的程度最高，也最為成功，法國尤具代表性。當時，加洛林王朝崩潰，法國成為維京人入侵劫掠的目標，軟弱無能的國王根本無力解決這樣的難題，以致人民痛苦不堪。為求自保，

人民於是將土地獻給地方上有勢力的貴族，希望獲得他們的保護。而這些地方上的領袖，也就利用附眾組織起自己的軍隊，更有效地保護了自己與人民，阻止了北歐維京人的攻勢，因此也就取代國王接管了當地的實際統治權，並在轄區內推行自己的初級法律與簡單貨幣。不過，加洛林王朝雖然崩潰，但國王與王侯公爵仍舊存在，有一定的實權與號召力，因此十到十一世紀，就出現了一種模糊的理論，試圖將割據的現實，納入舊有王國的等級秩序，亦即在理論上主張，原有的國王與王公比新興的地方領主有更高的地位，新興領主經由國王或王公的冊封，成為封臣，享有采邑，並對上承擔一定的義務，如兵役；如果封臣未盡義務，國王或其上級領主可以收回采邑。可以想見，這套理論只對弱小的領主有效，那些靠自己實力割據一方的領主，只是名義上臣服。

由於封建制度是遷就分裂現實的一種分權政治，因而以往史學家多對之抱持負面的評價。不過最近學者們的研究卻導向一個不同的結論：封建制度非但不是阻力，反而是一種進步力量。他們注意到，在德國和義大利那些封建未深的地區，政治穩定和國家統一姍姍來遲；而在法國、英國等封建制度盛行的地區，政治穩定，中央集權不久就迅速產生。學者為此設想了一些原因：其一，由於封建制度最初是自發產生的權宜之計，因而它具有極高的靈活性。地方上的宗主不用受到種種落伍過時的原則所束縛，可以自主選用符合當地風俗習慣的治理方式，並能夠有效率地處理地方上突發的狀況。再者，和古代龐大的帝國相較，由於封建制度的領主是在範圍有限的領地內直接統治其人民，因此人民較能明確感受到政權與自身的關係，而

萌生初級的認同意識；帝國統治則令人感到天高皇帝遠，有或沒有似乎並無太大差別。如果說帝國制度就好像在一盤散沙上搭起一間宏偉卻地基不穩的樓房，封建制度則好似將無數散沙凝結為可數的幾個堅固磐石，未來歐洲的君主只需再加統合，便可建造堅強的民族國家。因此，中世紀中後期時英、法二國的政治模式，稱之為「民族君主制」。在民族君主制產生之前，歐洲有兩種基本的政治類型：城邦國家和帝國。城邦國家的好處在於民眾能夠高度參與政治活動，進而提高對國家、政府的忠誠度。但在另一方面，城邦國家通常面積小，軍事力量不足，無法抵禦帝國力量的入侵；帝國雖可以贏得戰爭，可是其治理範圍太大，民眾和政府間缺乏溝通的管道，因此往往無法獲得臣民衷心擁護。新興的民族君主制可說是上述二者的折衷：施行民族君主制的國家面積不小，足以擁有適當的軍事力量；另外，它們起初是建立在封建制度的基礎上，和地方民眾的關係遠較帝國親密，故在面臨難關時，多半能取得民眾的真心幫助，從而化險為夷。或許可以說，英、法正因成功發展出民族君主制，而能擁有長期的穩定和平。此項制度不僅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先祖，同時更是中世紀留給現代的一個寶貴的遺產。不過，封建制度畢竟不是為政治統一而預備。儘管它起了化零為整的功效，但剩下那些一個個「整」，還要待火炮的威力，才會逐一聚合在民族國家的大旗之下。

封建制度的經濟型態為莊園制(Manor system)。這種制度是以土地的擁有人——領主為中心，故又稱領主制度。莊園制度約於加洛林王朝時代開始蓬勃發展，一直到十三世紀市鎮逐一在西歐各地興起前，都是西歐大部分地區居



主導地位的農村社會和經濟組織。西歐中古時期的莊園和羅馬時代的大農莊有類似之處，但二者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前者是由農奴(*serf*)來耕種，而不是奴隸。奴隸幾乎被當作主人的物品，生活、生命完全不受保障。農奴當然也遭受許多不公的待遇，如：不得離開土地、被迫定期為其主人從事無報酬的勞動、繳納各種名目的賦稅等等。不過他們的處境還是要比奴隸稍好，仍有某些人身自由，領主通常不能隨意擺佈，並且還可以在莊園內分得一塊地耕種來養活自己，雖說這塊地最終往往還是不屬於他們。

每一個莊園大小、規模不一，自數百英畝到數千英畝不等，分成二部分，一部分屬於領主，稱為「領地」，通常佔全園可耕地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其餘的部分就分配給農奴。耕作時要用的耕畜和農具，如重犁，是共有的而非私有的，因此即使是耕種分配給自己的田地時，他們幾乎總是一起工作。在三田制耕作制度下，除了耕地外，莊園內還有放牧地、林地等。前者供大家放牧成群的牲畜，後者主要是供給領主狩獵與居民撿拾柴火之用，在休耕地放牧，及在林地撿拾木柴，後來都成為莊園內農奴維持生活的重要權利。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的名畫《拾穗》所描寫婦女在收割後的空地上撿拾麥穗，亦是莊園制度下窮人得到的權利。日後所謂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侵入，莊園制即將解體時，無數農民因為失去這兩項傳統權利而痛苦抗爭。

在中古初期莊園所能提供的生活水準，一如前面所述，是相當低落的。農奴居住在幾乎一碰即倒的茅屋中，吃著粗劣的食物；貴族們也不過是在經常失火的木屋中，用唯一的餐具「刀」來切肉，用袖子抹油擦鼻涕，粗魯不

文。<sup>33</sup>但農業革命之後，人民生活水準隨之大為改善。在貴族的生活上反映最明顯，如今他們住在石造的城堡中，因為壁爐與煙囪的發明，不必擔心失火，身上也多了針織而成有鈕釦的衣服。飽暖之後，貴族們也不再專事殺戮，騎士精神伴隨文雅的比武活動逐漸成形。騎士們也將目光投向女人身上，中古盛期各類騎士英雄救美的傳奇故事和冒險傳說都訴說著這種轉變。試舉二段行吟詩人的作品為例：「我一切得體的行為，都能由她美麗的胴體推知。」「她如一棵大樹，枝條上結滿成熟的快樂果實。」貴族婦女地位在中古後期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這可由西洋棋的演變看出。十二世紀以前，西洋棋盤上沒有皇后，而是國王的宰相；十二世紀後宰相為皇后取代。大約在中古結束以前，皇后成為棋盤上直斜線間隨意移動、縱橫勇猛的王牌。

#### 四、大學的出現

中古盛期繼農業經濟復甦之後，文化上產生了一個重要的發展——大學的出現。西歐中古初期時，由於政治分裂，經濟衰落與社會動盪，幾乎無人留心古典學術的保存和發揚，只有教士為了傳教的需要才粗通文墨。但在中古中後期，西歐各地區的政治漸趨穩定，經濟隨之復甦，一些商業市鎮於是在各地興起。居住於市鎮中的居民，或許

---

<sup>33</sup> 伊利亞特在《文明的進程》一書中指出，以餐桌禮儀為代表現代儀節的發展，雖然使人不再粗魯，然而卻也開始帶來困擾現代人的緊張與疏離感；但在中古時代，由於身分不證自明，人們無需在禮儀上矜誇自己的地位，反而更為輕鬆自適。

是為了應付繁忙的商業往來，而有了讀書識字的需要；又或許純粹是有錢有閒之後，開始對古典的文化學術產生興趣。不管原因為何，這群人對於知識的渴求，使得非教會所創辦的世俗學校—主座學校—開始在西歐興起。這種新型學校不靠教會資助，而以學生繳納的學費來維持其日常開支，後來乃逐一發展為大學。大學一詞源自於拉丁文，意指「聯合」，即由學生或教師組成的聯合團體，這說明大學最初的性質比較接近職業行會，後來才發展為教育機構。除了新興的主座學校，一些原先的教會學校在後來也發展為大學。必須注意的是，無論由主座學校或教會學校轉變而成的大學，最初都以培養教士為目的，因此在大學的課程裏，神學依舊是重要的一環。但在一一〇〇年以後，因應政府職能的擴大，課程範圍增加，法律受到重視。一二〇〇年以後，更多不出身教士階級，且無意成為教士的上流階級子弟進入學校，文科七藝成為大學教育的主要內容，它包括拉丁文法、修辭、邏輯三個低級課程，以及算術、幾何、音樂、天文四個高級課程。此外，還有法學、醫學、神學三個科系。十二世紀，義大利地區最早的博洛尼亞(Bologna)大學與在阿爾卑斯山以北最早的巴黎大學紛紛脫胎成形，之後南北歐各大學以這兩所學校為模型建立起來。當時，只有男性可以進入大學，經過四年學習，通過考試，可以取得學士學位。至於攻讀碩士、博士，一如今日，要花更多時間，其中神學博士，一般要花上二十年始可取得。中世紀大學生活十分簡陋，由於一般要在十二到十五歲開始大學學業，因此很多學生只是不成熟的少年，卻又自認是與眾不同的一群，因此往往與大學所在地的居民格格不入，導致雙方衝突甚至激戰。但大學畢竟提

供了一個較為獨立的研究環境，且容納了許多勇於自由思考的知識分子。例如，當時曾傳說，任教於巴黎大學的著名法國經院哲學家阿貝拉爾 (Petrus Abaelardus, 1079~1142)，其觀點因為頗受爭議，被禁止在法國土地上執教。但歐洲各地學生依然蜂擁而至。阿貝拉爾於是在樹上講起課來。後來他又被禁止在空中講課，結果移到船上講演，學生聚在兩岸聆聽——這是多麼動人的場面。可以說，中世紀大學的出現，不只是推動了學術文化的進步，也為後來歐洲文藝復興鋪好了路。

## 五、政教的衝突

在中古時期這段歷史，教會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產生了西歐中世紀的政教衝突。政教關係在中世紀西歐錯綜複雜，曾經歷了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早期以法蘭克王國為代表，不論在克洛維時代，還是後來的矮子丕平 (Pippin the Short, 747~751年任宮相，751~768法蘭克國王)，或是查理曼大帝時代，統治者和羅馬教廷的關係較為親近，希望倚恃教皇的聲望和影響，給自己的冠冕罩上一道合法化、神聖化的光環，而此時的教廷則欲藉助國王們提供的武力來打擊敵手。表面上看來，王權和教權相互幫襯，合作愉快，但在另一方面，雙方又都力圖控制和干涉對方，因而在暗地裏也是互相角力。

隨著教會勢力的日漸膨脹，世俗的君王不能容忍權威受到挑戰，雙方衝突因而加劇，其中尤以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和教廷之間圍繞著主教授職權的鬥爭為最。繼加洛林王朝滅亡後，它的東半部領土——東法蘭克王國，到了

一〇五〇年前後，逐漸發展為歐洲最大的中央集權政治勢力——神聖羅馬帝國(The Holy Roman Empire)。長期以來，主教和修道院長一類高級神職人員的授職權一直操縱在皇帝手中，但教會亦不甘受制於君主，大概是在十到十一世紀時，產生強化教權和反對外部勢力干涉教會事務的教會改革運動。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位1073~1085）的帶領下，教會聯合神聖羅馬帝國境內久伏思動的諸侯，迫使皇帝亨利四世(Henri IV, 1056~1106)，赤腳粗服站在城外哭求教皇原諒。這一短暫勝利，導致此後雙方紛爭不斷，直到一一二五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才放棄對教皇的控制。也就在十一到十三世紀這段期間，由於加強了對自身組織的行政管理，使教皇統治成為當時超越所有世俗政權最先進的官僚政府，教會的赫赫權勢得以建立，且在幹練的教皇英諾森三世（1198~1216在位）時達到高峰，英諾森三世三十七歲登基，年富力強的他，致力於將所有基督教徒團結在教皇統治之下。儘管承認世俗君主的權力，但只要他認為君主有罪，便強力的執行懲罰。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正如所有人在耶穌面前都要卑躬屈膝，因而所有人都應服從耶穌的代理人。」然而好景不常，隨著世俗政權逐漸發展強大，建立起自己強有力的統治，教會便開始敗下陣來。一三〇三年，普尼法斯八世(Boniface VII)被法王捕獲後鬱悶而死，此後七十年間教皇都由法王任命。之後教會再也未能恢復先前的權勢。長年的爭鬥，使得德意志地區和教廷所在的義大利，政局始終動盪不安。遲至十九世紀下半葉，二國才各自艱難地完成政治統一。

世俗君王所以能在政教衝突中獲勝，得力於城市商人此一重要階層的支持。中世紀盛期農業與城市的復甦，使

遠距離陸路貿易興起，在這些貿易路線，一些據點迅速發展，逐漸形成新興市鎮，居民藉由貿易中累積的財富，換取國王給予的特許狀，可以不再受到王國或教會的支配，成為自治市。在自治市中，萌生了市民社會，透過更大程度的民間參與，與公共輿論，由自治市內的行會組織衍生出現代民主代議制度的雛形。正如當時的俗語所說：「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君主正是借重自治市的財政支持與管理技術，取代教會組織，發展出更有效率的中央集權官僚政府，自治市商人為護衛長程貿易而發展的武裝力量與兵工廠，也成為重要的軍事資源。<sup>34</sup>作為回報，君主也致力於革除統治區內不利商業貿易的苛捐雜稅與關卡，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市場因而逐漸形成。總之，在教會與君主的長年爭鬥中，城市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先是義大利北部的城市同盟幫助教會粉碎了帝國霸業；後來則與君主聯合，反對教會對各國的干涉。

## 六、十字軍東征

就在歐洲整體出現復甦與政教衝突的背景下，十字軍東征(Eastward Aggressions of Crusades)的興起，可以視為歐洲內部發洩過剩力量與壓力的表現。表面上起因於拜占庭帝國的求援；實際上，卻結合了教皇為了對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展現自身影響力的示威企圖，以及各地貴族在日益穩定的封建制度下，尋求個人出路的渴望。因此，在教

---

<sup>34</sup> 麥尼爾，《競逐富強——西方軍事現代化歷程》一書中指出，正是這種貿易武裝，演變為資本主義與軍事技術的結合，為西方日後武力上的絕對優勢奠定基礎。

皇號召之下，第一次東征頃刻聚集了十萬之眾，勢如破竹地打下耶路撒冷。然而，此後各次東征，隨著歐洲內部壓力的緩解，以及教皇因為濫發東征而導致的衰落，再也沒能達成任何實質的目標。甚至在第四次東征時，對基督徒兄弟動手，打垮了拜占庭，為日後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與兵臨維也納鋪好了路。直到一九一七年，西方人始能從穆斯林手中再度佔領耶路撒冷。但十字軍東征的意義，主要不在宗教或軍事上的成就，而是透過十字軍東征，歐洲人開始從長期對東方的守勢之中，擴展了視野，對東方的富庶產生了進取之心；在經濟上，威尼斯商人順著東征之勢，控制了地中海東部的航運，成為歐洲最富裕的人，資本主義便是在這裏萌芽。而各國為了打仗，也發展出更有效的稅收體系，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不過，十字軍東征也造成不良結果，即是因為宗教狂熱，在歐洲內部屠殺猶太人，在外面屠殺無辜的穆斯林，其在聖地耶路撒冷的暴行，不只是西方日後殖民主義的開端，也伏下今日西方與伊斯蘭文明衝突的因子。

## 七、宗教的發展

如果沒有基督宗教普遍救贖理論所帶來的宗教狂熱，很難推想十字軍東征是否還能發生。宗教的發展是中古時代一個不可忽略的部分。

一〇五〇年以前，大多數歐洲人只是形式上的基督徒，但在格列高利七世與亨利四世以來政教慘烈鬥爭的背景下，人們開始對宗教有了更深的自覺，對於教會組織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在過去很長的時間中，教會組織已淪為

各地方實力人物的工具，教士多為貴族親信，毫無修持，難以激起凡人的敬意。教皇本身亦相當腐敗，多是義大利羅馬附近的權貴子弟。自格列高利七世倡導俗人協助懲戒腐敗教士，對教會起了很大的純淨作用。這種淨化教會運動，原本帶有政治上鬥爭異己的色彩，是教皇清除皇帝所任命教士的一種手段，但也正好符合時人對教會腐敗的不滿，因此影響迅速擴大，成為一種尋求更純粹信仰的潮流。在此潮流下，著名的西多會以嚴格戒律與樸實作風，在荒山峻嶺中建立修道院，重拾不為俗世煩擾的生活，得到極大的響應。而各地宗教習俗，也由原本帶有迷信色彩的對聖徒遺物的崇拜，轉變為對耶穌基督或瑪利亞的崇拜，而更具普遍的意義。聖餐禮逐漸成為信仰核心部分，透過這種體驗耶穌降臨，分享聖血的儀式，信徒更加體會到宗教的神聖性，產生了對基督的強烈認同感，教士在人們心中的地位也隨之提昇。聖母崇拜的興起也很值得注意。之前聖母沒有什麼地位，在聖母信仰興起後，一方面，它使婦女對基督宗教有了更多的認同；另一方面，以聖母信仰為核心發展出的宗教藝術，更具有慈悲親切的氣質，影響了後來藝術的發展。經過中世紀早期對宗教的飢渴，一〇五〇年到一三〇〇年，可以說是信仰的時代。但也就因為如此，人們不可扼抑的宗教情感，開始超越不夠虔誠的教會，在十二世紀下半葉，歐洲出現大批的異端運動。異端的主要特徵，即強調個人的絕對禁欲與苦行，由於他們的生活與一些教士俗不可耐的排場形成令人難堪的對比，教會因此面對不小的壓力，也相應產生了進步的力量。例如道明會(Ordo Dominicanorum，或譯為多明我會)，他們試圖以自身的清白與豐富的學問，為教會辯護，著名學者聖托瑪斯·



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就是其中一人。托瑪斯·阿奎那在其著作《反異端大全》中，結合亞里斯多德哲學的理性精神，精密論證了各種論點的正反看法，並最終支持教會正統的看法。但無論異端或教會的改革派，他們的活動，整體上都增強了中古後期的宗教氣氛與人們對基督宗教的信仰。此時人們腦海中不存在不可知論，因為一切都在上帝的安排下。

## 八、黑死病

如果說中世紀盛期是盛宴的時代，那麼後期就是饑饉的年代。由於前一段時期農業進步帶來的人口增長，到中世紀後期已瀕臨飽和，此時歐洲的氣候卻不如中世紀盛期溫暖，許多北歐的土地不再適宜耕作，造成糧食減產與饑荒發生。但是，影響最大的災難，還是一三四七年爆發的黑死病。

黑死病分成兩種，一種是因跳蚤叮咬而感染的淋巴腺鼠疫，另一種是經由呼吸感染的肺鼠疫。前者病人腋下會出現大腫塊，四肢也會出現黑色斑點，腹瀉不止，三到五天就會喪命；罹患後者則在三天之內便會咳血而死。到一三五〇年，已有兩千五百萬人喪生，西歐人口在一三〇〇到一四五〇因為饑饉、戰爭，尤其是黑死病，竟然減少一半到三分之二。

如此嚴厲的上帝懲罰，也為歐洲帶來一些有益的深刻影響。首先，由於人口銳減，糧食需求降低，價格因此下降，於是人們不僅有更多餘力購買糧食以外的商品，也得以從事糧食以外作物的生產，促進了各地農業因地制宜的

專門化發展。再來，因為黑死病造成劇烈的物價波動，城市中的製造商在此顯現出較強的適應力，因而生存下來，得以僱用更多鄉村人口，城市的重要性因此得到進一步增加。最重要的是，因為人口大減，不得不採用省力的技術，歐洲整體的人均產值大為提升，人均收入也增加，避免了人口與糧食高度平衡的陷阱，為將來的飛躍發展做好準備，真可謂因禍得福。<sup>35</sup>

## 九、中古與現代的關係

既然中古並非真正的「黑暗時代」，中古與現代其實有多方面的聯繫，此處難以一一詳述。試舉一個衡量現代性的重要標準——科學，可以見其一斑。中世紀西歐取得的科學進步，遠超過希臘與羅馬的總和。原因之一是西歐不採用奴隸制，奴隸制往往有礙技術革新；另外，人口稀少的環境促進了減少勞動力的發明，這種情形在黑死病後更加明顯；加上基督宗教的人道主義也鼓勵相關的發明。

---

<sup>35</sup> 影響歷史發展的關鍵性轉折可以有種種推測。網路上流傳著一則歷史問答：假如，窩闊台不是在西元一二四二年駕崩，蒙古人沒有因而自歐洲撤軍，歐洲文明又會遭到什麼毀滅性的改變？美國有個學生是這樣回答的：這位蒙古領導人如果當初沒有死，那麼可怕的黑死病就不會被帶到歐洲去。如果沒有黑死病，神父跟修女就不會死亡。神父跟修女如果沒有死亡，就不會懷疑上帝的存在。如果沒有懷疑上帝的存在，就不會有義大利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如果沒有文藝復興，西班牙、南歐就不會強大，西班牙無敵艦隊就不可能建立。如果西班牙不夠強大，義大利不夠強大，盎格魯—撒克遜會提早兩百年強大，日耳曼會控制中歐，奧匈帝國就不可能存在。

修士羅傑·培根(Roger Bacon)在十三世紀已預見許多未來社會的成就，並非出於偶然：

人們可製造機器，使用這種機器，最大的船隻只需一人駕駛，比那些乘滿划手的船還要快。人們能製造運貨車，它們無需牲畜牽引，而且速度更快；人們能製造飛行器，一個人乘在飛行器上，可以用機械翅膀拍擊空氣，就像鳥一樣……；人們還能製造使人能潛入河底的機器。……<sup>36</sup>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各種技術革新，如重犁、馬輓與三田輪作制的採用，當時還有水車、風車磨坊等發明，組合起來成為用於鍛煉的風箱、大型鋸機與車床、造紙的紙漿機與碎礦的搗礦機。一〇八六年的英格蘭，平均每五十戶人家就有一座磨坊，其數量已足以大幅度的影響人們的生活水準。西方這一獨特的進步，也反映在與鄰近文明變化的關係之中。一二〇三年，當十字軍圍攻君士坦丁堡時，對這座古都的富有與豪華充滿敬畏之情；兩個半世紀後，希臘的紅衣主教卻建議拜占庭的君王派遣年輕人到義大利學習手工技藝，這說明中世紀西歐取得巨大的技術進步。

中世紀的經院哲學致力於將古希臘的科學成就與基督宗教神學思想結合，始終維持一種理性的態度，其影響不僅在於神學的發展。晚期的經院學者已在研究那些運動概念，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等人的發現其實並非首創。帕多瓦大學成為中世紀晚期的科學中心，哥白尼、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等人曾在此學習或

---

<sup>36</sup> 轉引自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新華書店，1999），頁459。

任教。由於受亞理斯多德的影響，經院哲學家開始思考在神學權威以外組織人類政治的可能性，對於義大利城市共和國制度的辯護，如馬爾西利奧(Marsilio da Padova, 1275~1343)與巴托魯斯(Baldus)承認政治生活的根本價值在於維持和平，否認維持和平與維護自由兩不相容。他們指出，人們有可能享受和平的幸福而不喪失自由，關鍵在於由人民自己發揮和平保衛者的作用。體現出他們已經認識世俗國家近代民眾主權的學說。

§ 作為轉捩點的中古封建時代：

- ◆ 查理曼：政教關係；
- ◆ 農業革命
- ◆ 羅馬理念；國家觀念雛型。
- ◆ 十字軍東征；東西接觸；
- ◆ 基回之緊張；東西羅馬分途。
- ◆ 封建制度及教會權威之起落。
- ◆ 黑死病：封建制度鬆動；人口銳減；猶太人替罪羔羊；宗教狂熱；僧侶死亡多，品質降低。

§ 參考文獻

1. Revel Guest and Andrew St George, "The Black Death", *History's Turning Points* (London : Boxtree, 1995).
2. 布林頓(Crane Brinton)、克里多夫、吳爾芙著，劉景輝譯，*《西洋文化史》*（臺北：臺灣學生，1984）。
3. 德尼茲·加亞爾、貝爾納代特·德尚等著，蔡鴻賓、桂裕芳譯，*《歐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4. Brian Tierney, Sidney Painter著，袁傳偉譯，王以雷校訂，*《西洋中古史》*（臺北：五南書局，1989）。

5. 斯塔夫里阿諾斯(L. S. Stavrianos)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上海：新華書店，1999）。

## § 思考問題

1. 神聖羅馬帝國乃封建體制之代表，其政治、社會及文化的性質為何？
2. 十字軍東征的起因及影響為何？
3. 歐洲中世紀黑死病肆虐，試問疾病對人類生活的正反面影響。

## § 延伸閱讀

1. 昆汀·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北京：商務，2002）。
2. 麥尼爾著，倪大昕、楊潤殷譯，《競逐富強——西方軍事現代化歷程》（北京：學林，1996）。
3.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王道還，廖月娟譯，《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臺北：時報，1998）。
4. 麥克尼爾著，楊玉齡譯，《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臺北：天下文化，1998）。

## 第七講

# 公元1492年：地理大發現

一、文藝復興

二、地理大「發現」〔當然此詞是以歐洲探險家的角度來認知的。〕

現在，每一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要感謝上帝挑選他們生活在這一新的時代，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時代，它為過去上千年間世上無可比擬的眾多高貴心靈而歡欣鼓舞。

——馬泰奧·帕爾米納里，《論市民生活》

不要期待我再說什麼，或給你什麼信號，你的意志自由，健全而又堅定——足以行動。若不遵從自己的意志是錯誤的，如今我便為你的自我加冕。

——但丁，《神曲·煉獄篇》第二十七章

文藝復興與地理大發現是近代文明的開端。人們由此重新發現了人與世界，一方面向內探索人的個性，一方面向外尋找新的土地。

## 一、文藝復興

### (一) 背景

文藝復興為何會發生於義大利？為何在此時此地藝術家，以及其他各種學者、專家人才輩出？對於這個問題，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知識分子多數會回答：古典文化的復興，顯然是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佔君士坦丁堡後，希臘學者逃亡到義大利及其他西歐各國所產生的結果。這樣簡單的答案如今已經不能令人滿意了。拜占庭滅亡的後續影響不應該被過度誇大。事實上，在一四五三年之前，希臘知識早已由伊斯蘭教從西班牙、西西里、拜占庭等地直接傳入西方了。而且，希臘的影響力絕非是促發文藝復興的唯一決定性因素。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義大利的文藝復興》(*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一書認為，文藝復興的發生歸功於義大利人的天賦和個人主義。除此之外，有兩個重要的背景是文藝復興不可或缺的條件：一個是義大利豐富的羅馬遺蹟，包括各種雕像、建築與石碑，使人對於希臘、羅馬的古文明自然產生孺慕之情，也無怪乎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造訪羅馬時感動得掉下淚來；另一個背景是義大利活躍的商業發展出來的城市文化，它與希臘的城邦文明有相似之處，種種世俗的活動譬如辯論、從政與經商再度為貴族所重視，因而與此相關的教育訓練也隨之興起，造成大量的世俗教育人員，進一步影響整個世俗的文化。此外，城市商業所累積的大量資金也成為文藝活動的重要支柱，如果沒有那些市儈商人的大力贊助，就決不會有那些高雅作品的誕生。所以彼得·柏克(Peter Burke)說：「沒有城市，就沒

有文藝復興。」

## （二）變化起點——人文學取代經院哲學

今日看來，文藝復興精采紛呈，轟轟烈烈，但它一開始只是在學術方法上對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反動——欲以人文學取代繁瑣的經院哲學。人文學本是一個教育的計畫，其重點是在古典學術（尤其是希臘、羅馬文學）的研究。在研究取向上，相對於中古的經院哲學為研究神而重視邏輯與辯證法的技能，人文學為探討人事而著重文法、修辭、詩學、史學、倫理學與嚴謹的治學方法。人文學者不甘如經院學派一般，只做些摘要比較的功課，他們力求文字精確，直探事物的本源與歷史真相，希冀有所發明與創見，對傳統觀點往往嚴加檢視批評，以致動搖了教會的權威。也因為古典學術（希臘、羅馬文化）是在基督教興起之前的異說（以基督教的立場而言），人本精神濃烈，因此研究人文學的結果，經常使學者批評基督教的道德觀與世界觀，而轉趨追求現世成就，品賞人生的興味與抒發個人特質，這並不妨礙大多數人文學者仍保持基督教的信仰。人文主義是一套複雜而不一致的觀點，必須在歷史的脈絡下探究其內涵。一般而言，西方思想分成三種不同的模式來看待宇宙與人生。第一種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聚焦於上帝，將人視為神創造的一部分。第二個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學的模式，集焦於自然，把人看作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機體一樣。第三種模式是人文主義的模式，集焦點於人，以人的經驗作為人對自己、對上帝、對自然了解的出發點。大致說來，西方中古時期，第一種模式佔支配的地位，而第二種模式要到十七世紀以



後才趨於成熟，人文主義便是在中古以後蓬勃興起的一種思想體系（這三種模式並不是如此簡單規律的階段性發展，在後世都仍然有代表並持續發展），以人為中心——相對於神與天地萬物，強調人的價值與尊嚴，深信人為萬物之靈，肯定人的自由意志(*free will*)與善性，並主張神許人為衡量萬事萬物的基準(*Man is made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它的世俗性與個人主義色彩，與中古時代濃厚的來世企盼與集體主義，形成強烈的對比。

### （三）演進

#### 1. 萌發期（十四世紀初至十五世紀中葉）

早期義大利文藝復興以文學成就最為突出。其中最著名的是義大利佛羅倫斯文壇上「三傑」：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跨時代的文豪、文藝復興的先驅者，代表作品為《神曲》(*The Divine Comedy*)；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義大利第一個人文主義詩人，號稱桂冠詩人。他的努力與創意賦予人文主義生命。他發現了西塞羅(*Cicero*)亡佚的書信，校勘了李維(*Titus Livius*)的著作，代表作《抒情詩集》；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義大利和西歐第一個現實主義的文學家，代表作品為《十日談》(*Decameron*)。<sup>37</sup>

---

<sup>37</sup> 一三四八年，義大利的佛羅倫薩發生了一場可怕的瘟疫。從三月到七月，病死的人達十萬以上。美麗繁華的佛羅倫薩城，變得慘不忍睹。這件事給薄伽丘深刻的影響。為了紀念這次人類災難，他以這場瘟疫為背景，寫下了《十日談》。故事內容是這樣的：在佛羅倫薩瘟疫流行期間的一個清晨，七位美麗有教養的小姐，在教堂遇到了三個英俊熱情的青年男子，這群人原本即有情人或親戚關係。他們相約到郊外的一座小山

在文學家的啟蒙下，出現了一些現實主義的藝術作品和歷史著作，喬托(Giotto di Bondone, 1266~1337)作為近代現實主義繪畫藝術的拓荒者，被譽為「歐洲繪畫之父」。他在阿累那教堂的壁畫中，透過聖母瑪麗亞一家人及耶穌的一生，表達了人生的情感與境遇。此外，像馬薩喬(Masaccio, 1401~1428)的人物畫與風景畫，多納太羅(Donatello di Betto Bordi, 約1386~1466)的人體雕刻(大衛像)等，充分顯示了現實主義的藝術魅力。在學術方面，列奧納多·布魯尼(Leonardo Bruni, 1370~1444)是十五世紀上半葉最卓越的人文主義者，他在倫理、政治、歷史、宗教等領域全面地發展了人文主義。他是第一個把歷史看成是人本身活動的歷史，在他的史學名著《佛羅倫斯史》中，我們已看不到天意的作用，人是通過履行自己的社會義務來表現自己的社會性與獨特性。

---

上的別墅躲避瘟疫，每天唱歌彈琴，跳舞散步。在暑氣逼人的夏季，商定每人每天講一個故事，以度過一天中最難熬的時光，他們合計講了一百個故事，集成《十日談》一書，一方面描寫和稱頌了現世生活，讚美愛情是才智高尚的源泉，歌詠自由愛情的可貴，肯定人們的聰明才智等；也同時揭露封建帝王的殘暴、教會的罪惡與虛偽等等。薄伽丘是在佛羅倫薩長大的，嚮往民主自由，不滿教會的黑暗統治，多次參加政治活動，反對封建專制。《十日談》就是他反封建、反教會的有力武器。《十日談》寫完後，薄伽丘受到封建勢力的迫害和打擊，時常被教會派來的人咒罵和威脅。他有一次憤怒之至，甚至想把所有的著作，包括《十日談》全部燒燬。幸好他的好朋友——義大利著名的民主詩人佩脫拉克苦苦相勸，《十日談》才得以留存至今。佩脫拉克是薄伽丘最好的知音。一三七四年佩脫拉克去世，使薄伽丘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第二年他在孤獨和貧困中，悄悄地告別了這個世界。

## 2. 成熟期（十五世紀中葉至十六世紀中葉）

這一時期的文化成就主要表現在繪畫藝術、新的文學戲劇和新的哲學思想。其主要特徵有三個方面：首先，新文化已達到了全面的成熟，並越出了義大利的國界，擴及歐洲各國，英、法、德、荷蘭、西班牙先後出現了文藝復興的高潮。義大利後期文藝復興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尤以造型藝術最為突出，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義大利「藝術三傑」：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20)和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達芬奇不僅是偉大的畫家，也是一個數學家、力學家和工程師。他在數學、生物學、光學、力學、地質學等方面都有非凡的才能，死後留下了七千餘頁的手稿。他的全才正反映了文藝復興對通人之理想。米開蘭基羅擅長畫聖母像，其繪畫特點是典雅、秀美、圓潤、和諧，被後世稱為畫聖。<sup>38</sup>拉斐爾的代表作品有〈聖禮之爭〉、〈雅典學派〉等。達芬奇的〈最後晚餐〉、米開蘭基羅的〈末日審判〉和拉斐爾的〈雅典學派〉三幅現實主義壁畫合稱為文藝復興盛期的三大傑作。其次，新興文學戲劇方面的成就也極為可觀，主要作品除了義大利偉大的詩人阿里奧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的《瘋狂的羅蘭》(*Orlands Furioso*)外，還有法國文學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3~1553)的諷刺小說《巨人傳》(*Gargantua and Pantagruel*)，西班牙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sup>38</sup> 米開蘭基羅自認長在雕刻，更以雕刻為最上乘之藝術，而輕視繪畫，其所以接受在西斯丁教堂天花板上創作《創世紀》，實為不得已之舉，並以為是有人要毀他令名。但憑藉天才，勉力而為，仍創造出曠世鉅作。

1547~1616)的長篇小說《唐·吉訶德》(*Don Quixote*)，英國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的《哈姆雷特》(*Hamlet*)、《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以及一些著名的歷史劇。拉伯雷、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被譽為後期文藝復興的「文壇三傑」。第三，新的哲學思想蓬勃發展。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家在人文主義影響下，在政治觀上開始擺脫神學的影響，提出了許多新穎的觀點。他們從人本身出發，用人的眼光觀察、解釋社會政治問題，以理性與經驗為根據，論證他們的政治要求和主張。義大利的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對國家學說的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其代表作主要有《論蒂特·李維的前十年書》(*Discourses on the First Decade of Titus Livius*)、《君王論》(*The Prince*)。馬基維利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建立民族統一國家，加強中央集權的強烈要求。他提出政治學應為了達到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外交事務必須保持實力，為此可以不講信用、不守諾言。近代主權學說創始人讓·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的國家學說也影響深遠。他在其代表作《論國家》(*Six Books concerning the State*)中，以歷史考察，在國家理論、主權理論和政體理論上都頗有建樹，使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鳩）深受啟發。

### 3. 尾聲（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

文藝復興運動不但使人文科學和學術得到發展與繁榮，而且也帶來了自然科學和哲學的復興。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體現在科學領域發生了巨大的革命。

文藝復興的獨立精神與對現世的關注對於科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而科學的發展也為新的世界觀和新的哲學提供了基礎。首先挑戰神學世界觀的是天文學。在這方面取得偉大成就的是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1543)。他在一五四三年發表的《天體運行論》(*The Revolution of Celestial Orbits*)，提出了「太陽中心」說，從而推翻了教會奉為經典的「地心說」，使自然科學從神學的籠罩下解放出來。<sup>39</sup>義大利科學家、數學家布魯諾(Giordano Bruno, 1548~1600)，繼承和發展哥白尼的學說，認為宇宙是物質的、無限的、永恆的，而太陽只是太陽系的中心而不是宇宙中心。義大利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後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一系列關於力學的巨大科學成就，使文藝復興運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宗教的影響力依舊強大。譬如哥白尼的日心說，其出發點在於證明上帝的法則是簡單而完美的，反對托勒密(Clandius Ptolemaeus, 90~168)過於複雜的星體軌道運算規則。有意思的是，最激進的宗教信仰中，如喀爾文教派(*Calvinism*)，其所以贊同地動說，並不是出於科學的理由，而是認為越是不可思議的說法，越能體現上帝之偉大。

---

<sup>39</sup> 有一點必須澄清，哥白尼並非第一個提出地動說之人，且其說法仍有許多論證上的缺陷，受到包括自己在內的人質疑；他的主張其實也未遭教會的強烈鎮壓，反倒是他自己覺得不宜發表。參見史壯伯格，《現代西方思想史》。

## （四）影響

### 1. 人的地位的提高

文藝復興是西方近代的開端，由此而衍生出來的諸多走向，皆成為當代文明重要的特徵。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提高了人的地位。就當時而言，人文主義者未必能完全脫離宗教之籠罩；長期看來，從宗教走向世俗，從神意走向個人的心靈卻是明顯的趨向。也唯有如此，在藝術上，藝術家才能不亢不卑的忠實描繪人的身體（相對於上古理想化和中古概念化的取向），在政治理論上，民權與政治自由的主張才成為可能。更重要的是，在概念演進的程序中，人文主義的提出是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發展的前提，而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正是現代文明之主流，就此意義而論，文藝復興可謂是現代化的先驅。此外，地方文學最後普及為民族文學，對於民族主義的發展也有重大的意義。

### 2. 全才的理想

人文主義者為塑造完美人格所設計的教育課程，在西方教育史上發生了長久而深遠的影響。直到十九世紀，西方學校中的人文主義教程才因科學之興起而逐漸改變，至二十世紀初幾乎完全消失。目前西方教育的功能似乎僅在造就具有專門知識與技能的人才，完全忘卻了文藝復興時代全才之理想，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然而今日尋求科技整合、建立通識的文化的理念仍然與文藝復興的通才理想息息相關。

### 3. 科學及技術發展

哥白尼和達芬奇是科學發展的代表人物。哥白尼的成

就茲不贅述。達芬奇運用精細的觀察力，設計無數的機械，包括戰爭武器。達芬奇還依照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及柏拉圖(Plato)的學說，開始從一連串自然法則中找出數學關係，產生有關質量、力及能源的近代概念。他埋首於解剖學、植物學和光學鑽研。他曾將蒸汽當作海水的運動和動力，以及研究飛行機械及潛水艇等。自然科學方面，瑞士的格斯納(Conrad Gesner)、法國隆德萊(Guillaume Rondelet)對動物頗有研究。義大利的弗拉卡斯托羅(Girolamo Fracastoro)預知微生物的功用。數學方面，德國的修弟費爾(J. Widman)使世人知道「+」和「-」的記號的用法。義大利的塔爾塔利亞(Niccolo Fontana Tartaglia)和卡爾達諾(Gerolamo Cardano)解出種種三次方程式，並且發現未知數的概念，確立代數學的可能性。

### (五) 對文藝復興史觀的修正

自布克哈特以來的史家認為，文藝復興如同一道強烈的亮光，照亮了黑暗千年之久的中世紀天空，好像一切「近代精神」皆驟起於文藝復興時期。但也有些歷史家主張文化的再生在一三〇〇年代前很久就已經發生了。例如「加洛林王朝的文藝復興」和「十二世紀的文藝復興」。因此文藝復興的突破不過是建立在中世紀諸多的基礎上。在此觀點下，過去對於文藝復興的觀念有數點需要修正。第一，過去對於文藝復興影響的範圍過於誇大，幾乎將文藝復興時代視為一個政治、經濟與社會都劇烈改變時代。但事實上，雖然文藝復興在文藝上卓有貢獻，但在社會經濟領域卻未必有相等之價值。第二，過去太過強調文藝復興對中古權威的反抗，似乎將中世紀與文藝復興視為水火不可共

存。然而就西方近代思想發展之歷程而言，比較徹底擺脫舊權威的束縛，而以個人之理性評判一切之態度，要到十八世紀理性主義盛行後始出現。理性主義者極憎惡中古時代，因此對文藝復興不無溢美，視之為近代進步之開始。布克哈特對於文藝復興之綜合性的解釋，多少受到理性主義歷史觀的暗示。

## 二、地理大「發現」

### （一）原因

十五世紀的歐洲，在回教勢力壓迫下求生，似乎已沒有任何喘息的空間；可是不久之後，基督徒主宰了世界的許多地方。一四八二年，葡萄牙人在迦納建立了一個據點，很快的控制了黃金海岸的貿易。一四九二年，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看到了西印度群島。一五一九年，西班牙人柯爾特斯(Hern'an Cort'es)控制了墨西哥帝國。這一切何以如此迅速的發生呢？對此一般有兩種解釋：一個可以稱作「文藝復興派」。持該派觀點的人指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啟航進行地理大發現之時，即為文藝復興文明向外傳播之時（哥倫布與達芬奇完全是同一時代的人）。他們認為，歐洲的海外擴張活動是所謂文藝復興的好奇與自立原則在現實領域的表現。這樣的解釋認定中世紀的人缺乏好奇心，沒有自立精神，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文藝復興派還認為，葡萄牙與西班牙出航的許多水手來自義大利，卻未細查這些水手所在的城市其實並沒有匯入文藝復興的浪潮中。更重要的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主要國家都沒有資助航海探險。另一種解釋，即海外擴張運動是



在中世紀打下的種種基礎上產生的，或許更有根據。簡而言之，中世紀說認為，促成地理大發現的動機、知識與必要的財力，主要來自中世紀。就動機而言，遠航最主要的目的是尋求亞洲的香料及其他奢侈品，譬如胡椒、肉桂、丁香，中世紀後期視為稀珍。經濟因素外，希望歸化未受洗禮的異教徒，在東方尋找想像中「失落的基督徒」，以與他們聯手對付伊斯蘭勢力，這也是一個中世紀的動機。就知識技能而言，與地理大發現相關的航海知識，幾乎都是在中世紀發展成熟的。過去的觀點認為，在哥倫布以前，歐洲人認為地球是平的並不正確。事實上，十二世紀之後，有經驗的水手幾乎都知道地球是圓的。其它如：十字軍東征帶回許多有關東方財富及豪華生活之傳言、十五世紀由中國傳入的羅盤、古騰堡印刷術之發明，使航海知識更快傳播等等因素，也都是地理大發現的重要背景。

## （二）過程

過去談到地理大發現，人們常過於凸顯了哥倫布的角色，忽略了葡萄牙人在航海事業上的貢獻。事實上，相較於西班牙意外發現美洲，葡萄牙人顯得有謀有度。David S. Landes指出，葡萄牙穩紮穩打，每一次航程都以前一次為基礎，走的更遠。每一次他們都記錄下所經過的緯度，並修改地圖，且先後在婆哈多爾角，隨後又在暴風角、好望角等建立市場。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思考與方法就戰勝了恐懼。往西一直到南美海岸的邊緣，再往東航行的決定不但大膽，而且極有創意，顯示了葡萄牙人對自己航海技術的信心。相較之下，哥倫布幾乎像是糊里糊塗地在泥地裡打滾。從亨利親王時代在西非海岸線的擴張，到一四八七

年狄亞士(Bartholomew Diaz)發現好望角，以至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 1469~1521)時達伽瑪(Vasco da Gama, 約1460~1524)航抵印度，葡萄牙人皆能表現出穩健而積極之作風。因而，從中世紀後期葡萄牙的航海和貿易史看來，地理大發現不像初看起來那樣具有驚人的革命性。然而不可否認的，哥倫布發現美洲確實更具有戲劇性。由於葡萄牙人自一四八八年之後主宰了向東通往亞洲的航道，西班牙只有支持一個冒險家向西尋找另一條通往亞洲的航道。於是哥倫布便應時而起，肩負了王室的使命。諷刺的是，哥倫布的成功卻是建立在錯誤的判斷上（他嚴重低估了地球的半徑）。假使哥倫布確知自西班牙至亞洲的距離，他不可能輕易地啟航，以免在中途沒頂。但哥倫布卻幸運地到達今天的巴哈馬群島，並帶回了小塊的黃金與數個土著。對於西班牙君王而言，這微小的紀念品已足以形成大大的希望，自此以後，在尋找黃金與補充奴隸的驅使下（教化異教徒成為基督徒，然後役使他們，當時人並不覺得矛盾）。西班牙人開始對美洲的侵略，阿茲提克與秘魯帝國的滅亡也就不令人意外了。過去的幾百年來，在西方中心的論調下，哥倫布的貢獻被誇大。在冒險犯難的光榮形象背後，還隱藏著美洲原住民斑斑的血淚。不過哥倫布「發現美洲」，在歷史上確有重大的意義，之後的歷史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 （三）影響

#### 1. 從地中海時代到大西洋時代

##### （1）西班牙的崛興與海上霸權的消長

自從發現了新世界與新航路，整個歐洲世界的中心，隨著因貿易而帶來的財富轉移，逐漸從地中海西移至大西洋沿岸。最先因為美洲豐富的金銀礦產與東方昂貴的香料而強盛起來的，正是兩個歐洲邊陲的國家，葡萄牙與西班牙。從一封寫給議員的書信，可以看到西班牙至遲在一五二四年，已經認知了這個重大的變化：「過去我們是在世界的邊陲，而今卻在其中，我們的整個命運也隨之改變。」

正因為這個世界情勢的重大轉變，使得同樣處於大西洋沿岸的國家，開始成為互相競爭的對手，這些國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荷蘭、英國，以及北美的殖民地。它們都很清楚，誰只要控制了世界貿易與新發現地區的控制權，誰就控制了通往世界財富的途徑。這就埋下了戰爭的種子。英國與西班牙的鬥爭，就是日後一系列爭奪世界貿易權的先聲。

在十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中，西班牙基本上掌握了新大陸的富源，黃金與白銀源源不絕地從殖民地輸入母國，構成了這時代西班牙霸權的基礎。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菲利普王子，由於在競爭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時失敗，菲利普從此脫離了日爾曼集團，成為名副其實的西班牙君主。其疆域包括西班牙、尼德蘭、西屬美洲，以及將近一半的義大利。菲利普二世的帝國由於各種實際情況和環境的力量，而將注意力轉移到南歐，地中海從此成為西班牙外交政策的重心。地中海世界不再連結於北歐和西歐，開始單獨形成一個緊密結合的整體。西班牙與土耳其兩大帝國在地中海的角逐也正式拉開帷幕，西班牙無敵艦隊的美號，也是在一五七一年對土耳其的勒班陀戰役(Battle of Lepanto)中建立的。在世界史的意義上，西班牙正式結束了

西方基督教世界對東方長期的守勢與自卑感。

儘管有如此輝煌的勝利，但很明顯的，這種帝國政策的轉向，剛好與大西洋沿岸勢力興起的趨勢相違，於是便給了還很弱小的英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可乘之機。

## (2) 西、英二國權力、信仰與財富的糾葛

在這個大背景之下，西班牙與英格蘭的爭鬥，一開始卻是十分溫和的。當一五五八年英格蘭的伊利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繼承其異母姊妹血腥瑪麗皇后(Mary I, 1516~1558，菲利普二世之妻)而為英格蘭女王時，英、西兩國結成同盟對抗法國。第二年，兩國的友誼仍很堅定，菲利普二世(Felipe II, 1527~1598)曾經準備代替伊利莎白收復加萊，接著又向伊利莎白求婚，不過遭到拒絕。

菲利普二世對英國的支持，完全是基於自利的考慮，目的在防堵蘇格蘭的瑪麗女王。當時依照天主教的觀點，瑪麗女王是英格蘭王位的合法繼承人，她的舅父基斯公爵正在法國當權，想要利用瑪麗的關係，將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法蘭西結合成一個偉大的基斯帝國，如果成功，對於西班牙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所以自從一五五八之後的十二年，菲利普二世不計成本扶助伊利莎白確保王位，好使英格蘭成為友善的力量，並以之制衡瑪麗。

儘管有菲利普的支持，伊利莎白的地位並不穩固，無意於對外戰爭。英格蘭因為新舊教之爭，內部政治不穩定。然而在英格蘭的喀爾文派教徒，卻一心只想援助歐陸上的同一教派——主要指的是尼德蘭地區的新教勢力。對於天主教的西班牙來說，尼德蘭是其重要財庫，自然絕對無法

容忍新教染指，境內的反西黨人因為於商業與宗教的理由，挑戰西班牙在尼德蘭地區的地位，偏偏伊利莎白又無力制止。到了一五六八年，蘇格蘭的瑪麗因為政變逃至英格蘭，遭到伊利莎白終生監禁。既然瑪麗已不構成威脅，菲利普反倒利用她作為反伊利莎白的工具。在這方面，又受到教宗庇護五世的支持，他在一五七〇年因為伊利莎白寬容新教的政策而將她逐出教會。

除了政治與宗教上的原因，經濟上的衝突也使西班牙感到惱火。作為一個航海民族，英格蘭在十六世紀後半逐漸侵入西班牙人在海上與貿易上的勢力範圍。一五七〇年前後，英格蘭海軍將領或海盜（當時兩者身分其實相通）藉口西班牙在尼德蘭地區迫害新教徒，開始劫掠西班牙船隻，英國普列茅斯的約翰·霍金斯(Johns Hopkins)開始搶劫非洲的運奴商業，這本是西班牙王室的專利買賣。因為霍金斯這種不合法的生意能獲得極高的利潤，所以英國女王居然與他合夥，把她自己的一艘船耶穌號借給霍金斯。法蘭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 1540~1596)則在一五七七至一五八〇的一次環球航行搶劫中，滿載相當女王歲入二倍的財物歸國，嚴重威脅西班牙的海上貿易命脈。但戰爭最後的導火線，還是因為尼德蘭情勢的日益複雜化。一五五九年協定結束法國與西班牙的長期交戰後，法國喀爾文派教徒開始在尼德蘭大肆傳教，不久安特衛普的教徒比日內瓦還多，菲利普無法忍受，因為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於是派遣大軍剿滅新教徒，結果逼使當地貴族反抗，整個尼德蘭北部落入新教徒手中，英國鑒於西班牙併吞葡萄牙，菲利普又逐漸恢復尼德蘭地區的勢力，遂在此時公開與尼德蘭反叛者結盟，並派兵援助。菲利普終於決心入侵

英國。

### (3) 日不落帝國的興起

當一五八六年危機爆發時，伊利莎白女王雖有一支三十四艘戰船的私人艦隊，但卻無國家性海軍的存在，戰時以商船臨時成軍；此外也沒有常備性的陸軍。政府臨時徵召的民兵，在訓練精良的西班牙步兵面前，基本上不堪一擊。反觀西班牙方面，它一共擁有一百三十艘船艦，總噸數五萬七千八百六十八噸，火炮二千四百三十一門，人員總計三萬五百人。儘管雙方實力懸殊，英國人還是大勝西班牙無敵隊，這不能不歸功優異的戰略與戰術，以及上天賜予的運氣。

首先，德雷克等英國將領很快就認清，必須把戰爭帶離英國海岸，因此打從開始，英軍就不斷擾擊在港口集結的西班牙艦隊，迫使西班牙艦隊在茫茫大海中搜索英艦，一旦交戰，由於西班牙的戰術是利用笨重堅固的戰船，以及射程不長的強力火炮破壞敵艦，再讓精良的士兵登上敵艦作戰，因此英國人充分利用他們輕快的海盜船式戰艦，以小口徑長程火炮，不斷射擊敵艦，待西班牙戰艦蜂擁而上時，又馬上利用速度逃走，如此一來，西班牙艦隊不僅疲於奔命，而且消耗了大量的彈藥。火炮在當時的精準度極差，所以雙方雖然很快就消耗了攜帶的彈藥，卻沒有什麼決定性的戰果。可是因為戰爭是向英國推進，英軍可以很快從英國補充彈藥，而西班牙則因為缺乏接近英吉利海峽的港口，隨著推進，其補給越發困難，不得不經常停下來等待整補，遂又給英國人四處活動，打擊落單的機會，最後，當戰事進入英吉利海峽，刮起了史稱「新教狂風」

的強烈西風，疲憊的西班牙艦隊被風吹成長列，沿著法國沿岸漂流，此時英軍遂能跟在彈藥耗盡的敵艦旁邊，以極近距離轟擊對手，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西班牙損失了一百二十六艘，英國則一艘都沒有損失。<sup>40</sup>

許多史家喜歡形容英國就此就進入歡樂奮進的時代，而西班牙則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事實上，戰爭一直持續到一六〇四年，雙方在筋疲力盡之後，才簽訂和約。這個和約對英格蘭來說，是既非有害也不有利，同樣的對於西班牙也無任何重大的後果。西班牙與英國的領土均無改變，王朝、政策、宗教也無任何影響。那麼，這個戰役何以會是歷史的轉捩點呢？

對於英國人而言，這一戰要算是哈斯丁戰役之後，第一個具有決定性的戰役，它不僅保存了英國，也保存了整個新教的命脈，它使西班牙的國威受到重創，它使全世界認清這個巨人的腳是黏土做的。自從一四九二年格拉那達的征服開始，西班牙人已經完成了許多驚人的偉業，他們征服了墨西哥、祕魯，在中美、南美和北美建立殖民地，使人對於他們產生了不可擊敗的神秘感；他們完成了這些近似神蹟的事業，因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無敵艦隊的毀滅，使他們的信念幻滅了，而這本是他們狂熱的基礎。三十年之後，西班牙開始衰頹了，並不是因為與英國的戰

---

<sup>40</sup> 為英國贏得勝利的水手們，在伊利莎白女王裁減費用的考慮下，許多人潦倒的死於街頭。相較於伊利莎白女王冷酷務實的作風，菲利普二世聞知戰敗的消息，他平靜地說：「我應該感謝上蒼，使我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假使我願意的話，我可以很容易地再建立一支艦隊，只要泉源不斷，則一道流水雖有時阻斷，也並無太大的重要性。」隨後，他竭力安頓敗戰的將士，表現出騎士的風範。

爭耗盡了國力，而是因為他們的信心喪失了。

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當無敵艦隊開航之前，他們並不清楚海權的真正意義；制海權對於他們非常重要，為了防止其他與新世界和印度之間的貿易，和確保其在尼德蘭的據點，他們都必須控制海洋。因為缺乏制海權，霍金斯、德雷克之流才敢到處劫掠。事後來看更為清楚：這支無敵艦隊從一開始起，就注定要被毀滅，不僅因為他們的戰術和航海技術不如敵手，而且因為他們的指揮官根本上缺乏對海權的認識。只有兩個弱小的民族，不曾為西班牙的神祕所迷惑，那就是英國人和尼德蘭的荷蘭人。這兩個民族都是海權國家，即令他們的地位十分微弱，卻至少能控制他們本土附近的海面，因為能做到這一點，所以能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並且向帝國主義的道路前進，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彼此又變成勁敵。這兩個民族學會了這樣的教訓：儘管是小國，其資源和本國的權力都極有限，但只要能控制海洋，則照樣可以贏得和控制巨大的海外領土。反而言之，即使是泱泱大國，沒有制海權，縱然擁有大片領土，也無法應付真正的挑戰。

不過要控制海洋，而關係實力問題，經濟力量又是其中的關鍵，就像同時代許多人認知的那樣，「西班牙征服了美洲，反過來又為美洲所征服」，西班牙本身既缺少豐富的農業資源，也沒有豐富的礦產，它也就迫切需要像其對手英國正在做的那樣發展工業和均衡的貿易形式。但是，由於居主導地位的西班牙貴族自中世紀從穆斯林手中勉力收復西班牙以來，一直把騎士理想看得高於實用職業，因而西班牙統治者只是把美洲的黃金白銀拿來購買歐洲其他地區的手工藝品或維持軍隊，實際上沒有發展任何



工業；而當一六〇〇年後白銀開始減少，西班牙經濟除債務增多，別無任何增長。學者認為，西班牙建立世界帝國的夢想，在當時是違逆世界經濟潮流的行動，而且也是帝國體制所力有未及的。帝國龐大的軍事官僚機器耗盡了美洲的財富，壓制了工商業的發展，到了一五五〇年代，哈布斯堡帝國與法國在鬥爭中兩敗俱傷，世界經濟的重心開始決定性地轉向以荷蘭為中心的西北歐。一方面由於西北歐的農業資本主義化與工資水準適宜，並掌握著波羅的海到英格蘭到大西洋這條運輸工、農、漁業大宗原料與產品的重要航道。另一方面，世界經濟的繁榮與擴張需要的是強大國家之間的競爭而非剝削性的政治統一體。關鍵在於國家是否能成為獲利與投資的機器。這正是英國人在十六世紀中期進行的「政府革命」和宗教改革，建立了權力較為集中並較為精簡的政府機構，保持了國內基本和平的局面，又沒有常備軍的負擔。

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在其名作《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一書中，駁斥大西洋航線的興起是地中海衰落的原因，認為主要是喪失對大西洋的控制。這是英國與西班牙戰爭的重要結果之一，其實仍反映了大西洋航線興起的背景。這種統治權的喪失，主要不是因為新的大西洋航線使有利可圖的貿易轉到北方，而是因為英國人和荷蘭人闖進了地中海，並由此導致一場「商業革命」，北方人的入侵不僅奪取了地中海的運輸業，而且奪走了地中海的市場。北方諸國利用其廉價的勞動力，有意識地排擠地中海商品，地中海的財源並沒有枯竭，只是轉到別人手中，而這些人正是英國人。

西班牙艦隊的失敗，把新時代帝國的秘密告訴了英國

人，在商業的時代，贏得海洋要比陸地更為重要，所以西班牙無敵艦隊被擊敗，其歷史的重要性是這樣的：它為大不列顛帝國奠定了基礎，促使英國人走上了帝國主義的道路，最後他們的旗幟飄揚在全世界，成為亙古未有的海洋大帝國。這個帝國從興起到衰頹，其間差不多經歷了三百年的時間。瞭解了這場戰爭的前因後果，再來看以下的敘述，當對地理大發現的影響與意義，有更深的認識。

## 2. 文化觀的擴大

隨著地理大發現，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人開始認知到其他民族的存在，因此關於人的觀念也開始有所轉變。其中開明者，遂較能以持平寬容之態度來看待世界其他文明，這不僅豐富了西方人的世界觀，也促成了若干新學術的出現，諸如人類學、比較宗教學、比較政府學與經濟學等。若由今日流行的「他者」學說觀之，地理大發現也是西方人對於自身概念的再一次確立，種種現代與落後、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的成見也由此而生。

## 3. 商業革命與物價革命

隨著地理大發現接連而來的遠洋貿易，加速了中古以來的商業革命。貿易所需的信貸機構、銀行制度，以及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與貿易行為的特性，皆深深改變了原有的商業結構。另一個重要的影響是所謂的物價革命，這主要是指自新大陸輸入歐洲的白銀所造成的種種經濟上的影響。

## 4. 抒解歐洲人口壓力與奪取資源

西方人因為參與了地理大發現行列，而成為今日世界

的霸主，地理大發現對於西方世界的影響不可不謂巨大。從一八四六到一九三二年期間，歐洲十六個國家對外移民的總數達六千三百六十六萬人。其中，僅一九〇〇到一九一〇年的十年中，平均每年就有近百萬歐洲人移民到海外。如果沒有新世界的發現吸收了歐洲如此眾多的人口，歐洲人便不可能有如此充沛的資本來發展其工業文明，而今日的世界也必定不會是如此的面貌。<sup>41</sup>

由地理大發現發展而來的殖民體系，對於近代世界有深刻而全面的影響。從新殖民地掠奪而來的貴重金屬刺激了歐洲的經濟發展，甚至於可以說，使歐洲的經濟有可能得以發展。譬如十八世紀法國資本買賣奴隸所獲的盈利，英國在英屬安德列斯群島使用奴隸勞動收入，以及五十年中從印度掠奪來的東西合計，其總數超過了到一八〇〇年為止歐洲的工業總投資額。這筆鉅額資本為歐洲投資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刺激了企業精神，並直接用來推動產業革命的工業，有利於歐洲國際上財富大規模的集中，但卻妨礙了被掠奪地區的發展，使得拉丁美洲至今還是世界上極為落後的地區。

## 5. 世界體系的形成——全球化的先聲

人類歷史上舟楫遠航屢見不鮮（鄭和下西洋在當時亦是驚天動地的大事），然而地理大發現之所成為重要的轉捩點，其原因之一，在於自此以後世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

<sup>41</sup> 過去西方學者往往認為東方的落後有極大的原因在於東方文明不懂得節育。因此迫於生存的壓力根本無力於發展其他科技文明。持這種論點的以哈佛大學教授 David S. Landes 為代表。實際上便是站在文化優越論的角度來解釋東西文明的成敗。

由這個時候起，所有歐洲內部的爭霸戰都成為全球性的，一個地方發生的事件能影響到其他地方。幾個大洲開始進入全球性的關係系統。這對於世界歷史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當代全球化的風潮就某一意義上可以溯源至此。諷刺的是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初卻也同時是一個民族主義快速發展的時代，而地理方面的學術成就卻以獨特的方式打破民族主義的枷鎖，這種矛盾的現象事實上也正是今日全球化的寫照。

#### § 作為轉捩點的地理大發現：

- 文藝復興是促成地理大發現的因素之一，因為它強調以人為本，強調人的主體性，吸收古典的資源，呈現新的世界觀，知識大量增加，為探索創造了條件及動機。
- 往後半世紀對新大陸的征服及殖民。
- 軍人、傳教士及移民大量前來，摧毀了原來繁榮的阿茲提克(Aztec)及印加(Inca)文明，輸入歐洲的封建制度，集體農場及基督宗教，使西班牙成為一大帝國。
- 若無哥倫布，則今日之美洲將不同，吾人之命運也顯然改觀。

#### § 參考文獻

1. 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著，羅漁譯，《義大利的文藝復興》（臺北：黎明文化，1979）。
2. 布勞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務，1996）。
3. 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務，1998）。
4. 德尼茲·加亞爾、貝爾納代特·德尚等著，蔡鴻賓、桂裕芳譯，《歐洲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5. 拉爾夫等著，趙豐譯，《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6. L.S. Stavrianos，王紅生等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7. 埃爾頓編，《劍橋世界近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
8.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著，郭方、劉新城、張文剛譯，《近代世界體系》（臺北：桂冠，1998）。
9. 布洛克(Alan Block)，《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臺北：究竟，2000）。
10.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市：聯經，1976）。
11. 大衛·藍迪斯(David S. Landes)，《新國富論》（臺北：時報文化，1999）。
12. 富勒(Fuller JF)著，鈕先鍾譯，《西洋世界軍事史》（臺北：軍事譯粹社，1968）。
13. 愛德華多·加萊雅諾，《拉丁美洲被割開的血管》（北京：人民文學，2001）。
14. 艾立克·沃爾夫(Eric R. Wolf)著，賈士蘅譯，《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臺北：麥田，2003）。
15. 歷史月刊編輯組，〈哥倫布與新大陸〉，《歷史月刊》49期（1992，臺北）。
16. 歷史月刊編輯組，〈新舊世界的交流〉，《歷史月刊》50期（1992，臺北）。

## § 思考問題

1. 有「現代人」思想模式，為自文藝復興開始產生，試思

考何謂「中古人」和「現代人」的特質？

2. 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社會、經濟樣貌為何？
3.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美國總統甘乃迪說：「爭奪宇宙霸權是未來十年的主要內容。哪一個國家能控制宇宙，就能控制地球。」這句話宣告了太空競賽的白熱化。西方一些戰略家也認為，對宇宙空間的開拓就像十六世紀以來對海洋的佔領（制海權）決定著國家地位一樣，二十一世紀對太空的開拓將是重新排列國家地位的決定因素之一。試問地理大發現與今日列強的太空競賽之間，有何異同？試從全球政治、經濟、科技等方面思考其影響。

## § 延伸閱讀

1. 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著，譚鍾瑜譯，《文藝復興：從黑暗中誕生的黃金年代》（臺北：左岸，2004）。
2. Giles Milton著，王國璋譯，《荳蔻的故事——香料如何改變世界歷史？》（臺北：究竟，2001）。

## 第八講

# 公元1517年：宗教改革

- 一、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分別
- 二、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的爆發
- 三、路德後續的努力及其成功的原因
- 四、新教的傳播——喀爾文派
- 五、總結宗教改革發生的原因
- 六、宗教改革的影響

宗教的真理，存在於其神秘的性質當中；雖歷經千年，依然鬥爭不已。直到精神之愛啟發了我們，呈現出最終之道，才能夠消弭流血。

——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論異端》

### 一、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分別

基督教是西元十六世紀初葉自天主教分裂出去的教派。最初的教派有三支：一是路德教派，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原是德國天主教奧斯定修會的一位神父，主張人只靠信德即可成義得救，不需善功。終於一五一七年在德國威登堡教堂發表了他的信仰主張，自天主教

分裂出去，成立路德教派；二是喀爾文教派，喀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為法國人，生活於瑞士日內瓦，與路德同時，除同意路德所講的「人只靠信德即可成義得救」的主張外，還提出他個人的主張「人的成義得救早由天主所預定」，結果也由天主教分裂出去，自成喀爾文教派；三是英國國教派，由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509~1547在位)開始，他因欲廢加達利納(Catherine of Aragon)皇后，另娶宮女寶蘭(Anne Boleyn)為后，未獲教宗允許，遂於西元一五三四年自天主教分裂出去，成立了英國國教，自立為國教教宗。<sup>42</sup>

基督教各教派在信仰上帝和基督救主這些大前提上，實與天主教並無不同。雙方主要的分別如下：

1. 在成義得救的大事上，基督教各教派除聖公會外，其他各派都主張人只靠信仰就可稱義得救，不需要行善功。天主教卻主張人的成義得救，一面要靠信德，一面要遵照天父的旨意去生活行善功。

2. 天主教遵行七件聖事，基督教除聖公會外，其他教派只奉行聖洗聖事。在婚姻上，天主教不許離婚，基督教各教派卻准許離婚。

3. 關於教義來源，天主教主張教義的來源有二，即聖經和聖傳，稱為信德寶庫；基督教各教派卻只承認聖經為

---

<sup>42</sup> 上述三個教派各自成立後，每個教派內的信徒，又因在信仰上意見分歧，遂又各自分裂，漸漸產生了許多新教派，例如從路德教派又分裂出福音堂、美以美會；從喀爾文教派又分裂出惟一神派、清教徒、公理會、長老會、浸禮會等；從英國國教又分裂出聖公會、高級教會、低級教會、自由教會、牛津公教會等。基督教之各教派，在過去四百餘年內，已分裂為一百多個大小不同的教派。



教義惟一根源，對聖傳不接受。

4. 關於聖經的卷數目錄：天主教的聖經共計七十三卷，其中舊約四十六卷，新約廿七卷。基督教的聖經卻只有六十六卷，其中新約廿七卷，舊約卻只有三十九卷，因為他們把舊約中希臘原文的巴路克、多俾亞傳、友弟德傳、智慧篇、德訓篇、瑪加伯上及瑪加伯下七卷予以刪除，不承認這七卷為聖經。

5. 關於聖經的解釋權，天主教認為聖經有客觀的正確真意，在解釋上有客觀標準；基督教各教派主張每個教徒都可自由解釋聖經。倘若兩人的解釋彼此不同時，他們認為雙方的解釋都是正確的。因此基督教內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教派，各行其是。

6. 關於敬拜天主及救主基督之禮，天主教非常注重禮儀生活，基督教各教派卻不重視，即在主日禮拜中也只有讀經、講道、唱聖詩而已。

其他如在信仰及教務行政內容細節、是否敬禮耶穌基督的母親瑪利亞、可否供奉聖像、祭祖，以及種種宗教名義上，雙方也有迥異的看法。

## 二、馬丁·路德與宗教改革的爆發

### （一）馬丁·路德的早年經歷

馬丁·路德的出身十分平凡，只是德意志中部一個農家的小孩。他的父親後來轉行經營礦業，靠著辛勤工作累積了一筆可觀的財富。他很重視孩子的教育，在路德十八歲時，將其送入著名的艾福大學法學院研習法律，期許他未來成為一個優秀的律師，或是往政界發展。但路德並未

遵照父親的心願。他在一五〇五年拿到碩士學位後，就進入修道院作見習修士，二年後他成為正式的神職人員，並於翌年奉派前往威登堡大學出任神學教授。正是在此處任教期間，他逐漸體悟出一套不同於中世紀一般認同的新教義，進而點燃了宗教改革的火把。關於路德為何會突然放棄當一名律師，而選擇作神的僕人的原因，歷來眾說紛紜。有人說，他可能是出於對父母權威的一種下意識的叛逆心理；也有人說，他是因為在一場暴風雨中遭雷電擊倒在地，此事被他視作神兆，為求平息上帝之怒，他才會在一五〇五年做出這樣的決定。不論他當初的動機是什麼，假若路德按照父母的期許當上律師，那麼他的成就和名聲很可能不會流傳至今日。

## （二）鐘樓悟道

馬丁·路德進入修道院後，全心全意遵守院內的規章，不停地祈禱和懺悔，以期獲得上帝的救贖。但這些外在的儀式和規定，只能給予他暫時的撫慰，卻不能讓他得到永久的解脫。路德感到無法得救的痛苦日復一日的加深，於是他懺悔變得更加頻繁，希望藉此緩解內心的不安。由於次數實在太多，疲憊不堪的告解神父還曾開玩笑地說：你口中的罪過實際上無足輕重，沒有必要一再懺悔；如果你真的想作一次驚人的懺悔，就去做些引人注目的事，比如與人通姦。然而，路德的種種努力仍舊未能換來精神的安寧，直到一五一三年才有了轉機。是年，路德在修道院的鐘樓裡突然領悟到，上帝要拯救誰或是詛咒誰，不是視其善行的多寡和宗教儀式的隆重程度來決定，信仰才是人能否得救的關鍵；善行僅是得救者自然會有的外在表現，儀

式則只是輔助人堅定信仰的工具，兩者皆非人獲得上帝眷顧的原因。<sup>43</sup>之後路德便根據《新約·羅馬書》中「義人必因信得生」一語，來闡發他於鐘樓中所悟之道，即「因信得救說」。有人認為馬丁·路德此說和中古前期聖奧古斯丁(Sanctus 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的學說類似，且在本質上並無不同，後世史家可能誇大馬丁·路德的重要性。但自中世紀中後期以來，羅馬教會認定的教義是「因行得救說」，一般民眾也都深信不疑，是故路德的說法對於他自己和十六世紀初期的人而言，是全新的理論。正因「因信得救說」明顯與當時正統教義—「因行得救說」—相衝突，這就意味著任何路德教義的支持者，必不見容於羅馬教會，雙方的衝突自是無法避免了。

### (三) 歷史的轉捩點——一五一七年

起初路德只是在其任教的大學內傳播新教義，無意直接挑戰羅馬教會的權威。但在一五一七年時，他被當時德意志境內發起的一場大規模出售贖罪券(Indulgences)的活動給深深激怒了，覺得自己再也無法容忍，於是勇敢地向羅馬教會發出怒吼。贖罪券的發行源於十一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是教皇為鼓勵信徒參戰的手段。其理論的根據是：耶穌和諸聖徒在世時曾積累了許多功德存貯天上，是為「功德寶庫」(Treasure of Merit)；教皇賜予有善功的人贖罪券，形同從功德寶庫中支出部分以補其功德的不足，從而有得救登天堂的希望。贖罪券發展到後來，甚至不需要有善功

---

<sup>43</sup> 傳說路德患有嚴重的便秘，而鐘樓在中古時代是廁所之所在。見艾力克森，《青年路德》。

才能取得，而是有錢就能買到；十四世紀之後，出售贖罪券所得竟已成了教會重要的收入來源。

一五一七年十月，羅馬教皇藉口要修繕聖彼得大教堂，在德意志境內大量兜售贖罪券。教皇的特使宣稱，只要購買贖罪券的錢一敲響錢櫃，罪人的靈魂就會立即從煉獄上升到天堂。馬丁·路德本就不贊同行善功能使人獲救的教義，更何況是用錢買得救的承諾呢！他不能也不願忍耐下去了。當月的三十一日中午，他把親筆寫下的〈九十五條綱領〉（*95 Thesen 31/Okt.*，又名〈關於贖罪券的功效〉）一文，張貼於威登堡教堂的大門上，文中多處表達出他對於現行教義的質疑。傳統上，史家將此舉視為宗教改革的開端。

以下是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摘錄：

23 條，倘若有人能獲得罪的全部赦免，那麼，這種人一定是最完美的人，不過，世上完美的人實寥寥無幾。

24 條，因此，如以上所說屬實，那麼大部分的民眾都被這種無差別的與寬大的免於責罰的允諾所騙。

27 條，他們宣稱說，當錢幣仍在錢櫃中叮噠作響的時候，靈魂即會應聲飛入天堂。

28 條，很顯然，當錢幣投入錢櫃中叮噠作響的時候，增加的只是利得心和貪欲心。至於代禱是否有效，完全只能以上帝的意旨為轉移。

30 條，每一個基督教徒，只要感覺到自己真誠悔罪，就是不購買贖罪券，也同樣可以贖罪或全部免罰。

43 條，基督徒應該知道，對貧窮者的施捨與對急需者的借貸勝於購買免罪的，即贖罪券的。

44 條，因為透過慈善工作，慈悲心增進了，而且人的善性也加深了；然而購買免罪，人的善性不能有絲毫增進，只能增加免於罪罰的放縱。

### 三、路德後續的努力及其成功的原因

#### （一）路德與羅馬教會決裂

路德所公布的〈九十五條綱領〉，是以艱深的拉丁文寫成的，原意是想與羅馬教會作教義上的辯論，而非號召群眾響應。但是有人將它譯成德文並散播開來，使得這位本來沒有什麼名氣的修士迅速名聲遠揚。德意志境內的騷動，引起教皇的注意。一五一九年他派遣代表和路德在萊比錫進行一場神學辯論，在辯論中路德不畏被指為異端的危險，堅持自己的理念。教皇的代表指責他不服從教皇的訓令，路德則回答，教皇和所有教士都是一些難免會出現謬誤的凡人，聖經才是唯一的權威。此言一出，使得路德與羅馬教會間的嫌隙再難修復，雙方徹底決裂了。

#### （二）三大宗教綱領的提出與散播

與羅馬教會決裂後的路德，更加積極完善其神學體系。一五二〇年是他著作最盛的一年，他寫出了三本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小冊子，提出其三大神學假說：因信得救、聖經具有至高無上地位，以及「信教者皆為牧師(pastor)」。因信得救是路德學說的核心，前已說明；第二點的意思是聖經是唯一的權威，且所有沒有明確記載於聖經中的信仰或禮儀都是多餘的，應加以拒斥。至於「信教者均為牧師」，

旨在打破僧俗之間的界線，強調神職人員並沒有擁有通往天堂的鑰匙，更無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一般信徒不必過分仰賴其幫助。

路德的小冊子迅速傳播到日爾曼許多地區，得到群眾廣泛的支持，不僅使路德堅定反對羅馬，更促使一些日爾曼王公皈依路德教派。教皇當然不會坐視不管，頒布諭令嚴厲譴責，路德的反應卻是當眾將此諭令和教會的所有法令一併燒毀。此舉看在教會眼中，只能以冥頑不化來形容，因此他被移交給其世俗的領主、薩克森的選侯來施行處罰，通常這意味著以火刑燒死。但選侯同情路德，於是他請求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給路德一次自辯的機會。

### (三) 沃姆斯會議與奧格斯堡和約

教皇和查理五世給了他最後一次機會，在一五二一年他們把路德召到沃姆斯(Worms)城，要求他於該城舉辦的會議中，承認自己的錯誤。路德還是不願退縮，他於答辯的過程中說：

陛下及爵爺們要我作一簡潔的回答。這就是我直接了當的回覆。除非由聖經證明我的錯誤（我不相信教皇或歷屆大公會議的權威，因為它們經常犯錯和自相矛盾），或者由它明示我的推理有誤，而我是聽信上帝的語言的。我不能、也不願撤消任何東西，因為違背良心行事既屬錯誤且不安全。這就是我的立場，我無法不遵守。願上帝幫助我。阿門。

很明顯的，路德面臨被嚴懲的命運。此時，薩克森選侯再

*image  
not  
available*

義反而能在德意志境內壯大？這就必須考察德意志的歷史背景和政治概況。首先，教皇已逐漸失去往昔強大的號召力，許多教皇的腐敗令人髮指，甚至傳出與親生女兒通姦。儘管威信喪失，教會在日耳曼卻和從前一樣徵收大量資金，由於該區較為落後，民眾在宗教上更為虔誠，加上政治上沒有統一強大的統治者與教會抗衡，所以對於教會的腐敗和剝削感受特別強烈。在此氣氛下，德意志地區自一四〇〇年以來，便不斷有人主張對教會做徹底的改革。一四五〇以後，隨著大學在日爾曼地區的湧現，大學便成為抗議者的重要根據地，路德最初的一批信徒，就是其任教大學的同事和學生。

但最重要的是，德意志王公支持路德的教義。有別於民眾對教會剝削本能性的反感，王公要的是政治上的主權。由於路德教義否定了羅馬教會存在的正當性，因此他們意識到不再需要將稅收貢獻給義大利，而能留為己用，且根據新教義，修道院是不必要的存在（因為「人人皆牧師」），故王公可將境內的修道院關閉，並沒收其財產。通過任命高級教士，停止向羅馬交稅，削弱宗教法庭的審判權，沒收修道院的財產。日爾曼貴族打著路德的旗幟，一步步向王權國家前進。正如路德三本小冊子中的〈致日爾曼貴族書〉所說：

所以我說，世俗權力是受上帝的委任來懲治奸邪，保護良善的。因此我們應該讓世俗政權在整個基督教世界中執行它的職務，不要加以阻礙。無論什麼人，不管他是教皇、主教、傳教士，或是修士、修女，世俗權力都有權來管他。

一旦受到王公的保護，路德便顯露出在政治與社會事



務上極度的保守主義，要求人民無條件絕對服從於神聖的統治者，並且對一五二五年部分因為受他改革啟發而爆發的農民戰爭，表現出高度的敵意。然而，路德所點的星星之火，已不是他自己吹鬍子瞪眼所能熄滅，更激烈的宗教改革，隨著新教徒在歐洲各地出現，已成燎原之勢。

#### 四、新教的傳播——喀爾文派

新教徒(Protestants)一詞原有「抗議」的意涵，在馬丁·路德成功的例子鼓舞下，新教徒在歐洲各地反抗既有的政教體制。然而這些反抗，並不都是出於宗教見解的分歧，例如英國亨利八世主要是因為婚姻問題而創英國國教。真正擴大發揮路德改革影響的是瑞土地區的新教，其中又以喀爾文派最為重要。

一五三六年，二十六歲的法國新教徒約翰·喀爾文出版了《基督教原理》(*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一書，他認為人絲毫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在出生前已決定是受到賜福或詛咒。然而這不代表基督徒可以對自己在世間的行為抱持冷漠的態度。如果他們是選民，則上帝就將在他們身上播下正直生活的願望。誠實公正是被選的徵兆，雖然不是一個絕對可靠的徵兆。喀爾文把一種虔誠、有道德的積極生活視為基督徒必須遵守的一項莊嚴義務。在他看來，好的基督徒應把自己設想為上帝選定的工具，其使命是幫助上帝完成祂在世間的目標，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自己靈魂的得救，而是為了榮耀上帝。在喀爾文的引導下，日內瓦變成了一個戒律嚴酷的專制神權國家，嚴密監控每個人的私生活與道德，幾乎所有娛樂（例

如跳舞、上劇場、打牌、在安息日工作或遊玩）都被視為惡魔的行為，犯戒者重至處死。日內瓦成為新教的燈塔。喀爾文由此鼓勵傳教團到敵對地區進行宣教，經由堅定不移、齊心協力的傳教，喀爾文教在蘇格蘭成為多數，稱為長老會，在法國雖佔少數但人數甚眾，稱為胡格諾派，在英格蘭的情況與法國類似，稱為清教徒。

新教教義經由馬丁·路德的草創和喀爾文的補強，已漸趨完備，而各地新教徒的反抗運動，也有越演越烈之勢。除了上述提及的三大新教派別外（路德教、喀爾文教、英國國教），尚有許多支派在四處活動。事情發展至此，天主教徒決心不顧一切阻止新教的發展。就在之後的數十年，原本統一的基督教世界陷入紊亂與混戰。

## 五、總結宗教改革發生的原因

宗教改革之所以發生在十六世紀初，造成各方面的深遠影響，除了一些技術性條件的配合（如進步的印刷術加速資訊的流傳），更重要的是它的主要訴求，吸引了社會上各階層的人，上至一國之君，下至一般百姓，都因其自身的需求，投入了宗教改革的洪流中。

### （一）伸張王權的各國君主

羅馬教會不僅為一宗教團體，還是國際性的政治勢力。它有君主（教皇）、議會（主教會議）、法律（教會法典）和法庭。從教皇以下至主教、修士，皆不受各國政府的管轄。它擁有龐大的田地，可以向信徒徵稅，又不受世俗政府的干預。而它的法庭管轄一切教士和與信仰、道

*image  
not  
available*

統一，為了平息各宗教派系的紛爭，他以國家為先，放棄新教信仰，而改信在法國居多數的天主教，但同時在一五九八年頒布著名的〈南特敕令〉，寬容對待境內其他宗教。這種新型態的國家，在西發里亞條約後，形成現代世界秩序的列國制度得以建立。

## （二）個人主義的發揚

宗教改革對於個人主義的發展影響甚大，乍看之下，個人主義強烈的人本立場、世俗性觀點和反集體勢力的政治態度，與宗教改革人士的教派色彩及其出世性終極關懷，似無干係。然而宗教改革的範圍甚廣，遠超過信仰領域。教會與信仰一統性的破除，當然會造成文化全面的變革。所以通常把宗教改革稱為大改革the Reformation，而不是the Religious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對個人主義精神的促進，在其教義上的個人化主張與立場，宗教改革者所重視的，其實不在於表面上教會腐化行為的革除，而在信仰觀念的矯正。新教改革者所持基本教義派觀點，強調聖經至上，認為所有信徒均應自己讀經解惑；換言之，得救的真理在於個人信仰，而非群體的認知。經過宗教改革的信仰解放，個人主義與理性主義能在十八世紀後日漸發達，誠非偶然。

## （三）資本主義精神的來源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指出，在任何一個宗教多元的國家裡，只要稍稍注意其職業分布的統計數字，幾乎毫無例外地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

本佔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及管理人才，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據此他提出一個問題：資本主義以賺錢為目的、不斷累積資本的理性精神，是否和新教教義有所聯繫？其大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就是試圖解答這個問題，而韋伯的答案顯然是肯定的。韋伯認為，新教的部分教義，尤其是喀爾文派，對於迫切進取的經濟事業，或者說資本主義特別具有促進作用。像是馬丁·路德倡導「職業神聖」(*dignity of vocation*)之論，認為每個人均肩負上帝指定的天職，而對此天職盡力便是恪遵上帝的旨意。在路德眼中，修道生活毫無價值，不能成為在上帝面前為自己辯護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棄現世的義務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責任。上述這類觀念使信徒以專心工作為榮，並減少其對於世俗生活的排斥心理。路德還強調職業上的聽天由命，喀爾文的教義（上帝是絕對的存在，所有被造物的存在目的只是為了顯出上帝的榮耀）卻造成人們「空前的內心孤獨」，喀爾文教派則更進一步提倡勤儉與刻苦的重要性，視怠惰為罪惡之源，惟有拼命工作才能讓人免於誘惑而做出上帝不喜歡的事；而事業的成功也可說是得到上帝眷顧的象徵。雖說喀爾文的本義並非是要人為謀求高利潤而工作，而是為了堅定信仰，但其教義等於間接將工商階級追求利潤的行為正義化。虔誠的信徒陷入自己能否得救的焦慮中，他們一方面以辛勤工作做為一種贖罪的形式，一方面也是藉由工作上的好表現來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於是焦慮反倒轉變為創業的強大動力。信仰上的禁慾特徵與

4. 尼尼安·斯馬特(Ninian Smart)著，高師寧等譯，《世界宗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5.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臺北：唐山，1987）。
6. 王曾才，《西洋近代史》（臺北：正中，1983）。
7. 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務，1998）。

## § 思考問題

1. 中古歐洲一直是教會至上，政教合一的時期，試問馬丁·路德隨後的宗教改革，是否與形成現今現代世界的局面，即效忠國家第一，教會其次有關？其關鍵為何？
2. 西元二〇〇〇年天主教教宗向曾經被教會迫害的人道歉，試問所言之教會迫害為何種事件？宗教改革者視宗教為個人信仰，在確立新權威的過程中，是否能寬容對待不同主張的基督徒？
3. 新教推翻了羅馬天主教會對《聖經》的壟斷解釋權，自身後來也分裂為許許多多的宗派，其內、外因素為何？

## § 延伸閱讀

1. Ernst Troeltsch，《基督教社會思想史》（香港：文藝，1960）。
2. 鈕康博著，黃煜文譯，《亨利八世與英國宗教改革》（臺北：麥田，1999）。
3. 斯蒂芬·茨威格(S. Zweig)著，張曉輝譯，《異端的權利——卡斯特利奧對抗加爾文》（長春：吉林人民，2000）。

殖民地人民所擁有、製造或行駛的船隻可以裝運英國殖民地的貨物，其他船隻不准參與殖民地貿易；2. 若干經政府指定的殖民地產品只准運銷到英國本土或其他英屬殖民地，這些產品包括煙草、糖、棉花、靛青、生薑、染料木、海運造船原料、銅與毛皮等；3. 禁止從英國以外的歐洲國家將製造品直接運銷殖民地；4. 控制殖民地製造事業，即限制殖民地生產與母國有競爭性的產品，如紡織品與鐵器，而鼓勵殖民地生產母國需要的產品如造船用的松脂、瀝青、船桅，船桁與生鐵等。這些規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使殖民地為母國的經濟利益服務，使英國政府、商人與人民都可直接或間接的從殖民地獲利。航海法對殖民地甚為不利，但由於三千英里海路所造成的交通困難、十七世紀英國政治的動盪不安、光榮革命後英王與國會對殖民地統治權的混淆不清、英王與國會對殖民地缺乏興趣，以及英國政府缺乏一個管理殖民地的有效專責機構等因素，都使航海法案實際上無法嚴格地執行。因此，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前，除了偶一關注之外，英國政府對殖民地大致上是置而不問的。

一七五六到一七六三年，英、法兩國因爭奪殖民地而發生七年戰爭。這次戰爭在北美殖民地上稱為「法國與印第安戰爭」(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由於戰敗，法國在一七六三年締訂的「巴黎和約」中正式將北美殖民地全部讓給英國，使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幾乎增加了一倍。但是英國為贏得這片廣大的土地，卻欠下了巨額的國債。同時，新獲得的土地也需駐軍戍守，以防止法人與紅人死灰復燃。駐軍需要補給，國債也要償還，英國政府必須設法增加收入才可應付。為了解決這個財政上的困難，英王的大

臣們想到了殖民地。國債既是為殖民地利益而欠，駐軍既是為殖民地安全而設，要求殖民地負擔一部分費用自是名正言順之事。因此，開始在殖民地加強徵稅。但是這一個解決財政的方法，最後卻斷送了北美大陸。

## （二）衝突情勢的升高——三法案

「法國與印第安戰爭」之後，英王喬治二世任命擅長理財的格林威爾(George Grenville)為財政大臣，負責解決英國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困難。他就職後採取一連串相關措施，命令殖民地海關加強徵稅，派遣海軍巡邏殖民地沿岸取締走私。自一七六三年四月到次年五月，他促請國會先後通過三個法案加強在殖民地的收稅。首先，「蔗糖法案」(The Sugar Act)作了四項重要的規定：1. 將糖蜜的關稅從一加侖六便士降為三便士（他以為六便士確實太高，殖民地人民只好走私或行賄。將之降為三便士，要比行賄所需為低，商人就會規規矩矩的繳稅）；2. 凡輸入殖民地的糖、靛青、咖啡、酒、甘椒與紡織品都須繳納關稅；3. 為防止走私，採用一套非常複雜的報關手續；4. 凡是違反關稅規定的人都須在沒有陪審團的海事法庭(Admiralty Courts)中受審。其次，「印花稅法案」(The Stamp Act)規定殖民地人民必須在一切法律文件、報紙、紙牌、曆書與骰子上貼印花稅票。最後是「駐軍法案」(The Quartering Act)，要求各殖民地須為駐紮其境內的英軍提供營房及一些日用品。這三個法案立即引起殖民地人民的不滿。糖蜜稅雖降為一加侖三便士，但比行賄要高，商人仍難接受。新報關手續過分複雜，商人一不小心就會犯錯受罰，船貨兩失。但是最使殖民地人民難以忍受的是，他們認為英國政府顯然已不



仇恨。

#### （四）茶葉法案

與此同時，英國的工商人士正致力於撤銷湯森法案。最後，一七七〇年正月剛就任財政大臣的諾斯(Lord North)建議除了茶稅之外，湯森法案的其他稅目一律廢除。這樣既可保持國會徵稅之權，也可使嗜茶的殖民地人民為滿足口腹之欲而不得不繳稅，國會通過了他的建議。湯森稅的撤銷恢復了殖民地對母國的好感。商人再度輸入英貨，貿易也再度繁榮。事實上，只要關稅委員會繼續留在波士頓，只要英國海軍繼續巡邏沿海，只要海事法繼續沒收殖民地人民的船貨，殖民地對母國的懷疑反感就不會完全消滅。所以，即使在此和樂融洽時期，一些激進分子如維吉尼亞的亨利(Patrick Henry)與麻薩諸塞的亞當斯(Samuel Adams)等人，仍能以殖民地權利或國會專制的問題繼續煽動人民的視聽。就在亞當斯的推動之下，麻薩諸塞各個村鎮紛紛組織委員會起草各種伸張殖民地權利的文件，以及彼此互通消息。一七七三年，由於維琴吉尼亞議會的建議，這種「通訊委員會」的組織也推廣到其他殖民地。其後，這些民間組織就成為協調各殖民觀點與行動的主要工具，在美國革命與建國的過程中發生重大的作用。

當亨利、亞當斯與其他激進分子為殖民地的團結一致奠立基礎時，諾斯則正在為解決東印度公司的財務困難傷腦筋。他最後想出的辦法是利用北美殖民地的嗜茶習慣。一七七三年五月，他促請國會通過「茶葉法案」。此一法案准許東印度公司將其庫存的茶葉直運北美殖民地，經由公司的銷售網直接賣給消費者，因為免除了中間商人的利

益及部分關稅（輸入英國的部分），東印度公司的茶價大為降低，即使加上輸入殖民地的入口稅，茶價還仍比非公司茶為低。依諾斯的預計，殖民地人民必定會爭飲公司茶。如此一來，不但東印度公司的財務困難可以解決，而且也可迫使殖民地默認茶稅與國會的徵稅權。但是諾斯顯然過分高估了殖民地人民飲茶的嗜好，而過分低估了他們保持其既有權利的決心。殖民地堅決地反對東印度公司的茶在當地銷售。當第一批公司茶到達時，暴民們不是迫使原船駛回，就是只准將茶葉存放在倉庫裏，不得運出。但在波士頓，亞當斯與他的同伴們卻在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乘夜登船，將茶葉全部倒進海裏去了。

### （五）懲罰波士頓

在此次「波士頓茶黨」事件之後，諾斯決定懲罰桀驁不馴的波士頓。他促使國會通過幾個法案：關閉波士頓港直到該港賠償茶價、限制麻薩諸塞的自治權、任何政府或海關官員如被控謀殺，可移回英國受審，以擺脫當地陪審團的左右，以及授權軍事指揮官可視情況需要，駐軍於任何村鎮。為了有效地執行這些被殖民地人民稱之為「不可忍受的法案」，英政府任命蓋奇將軍(General Thomas Gage)為麻薩諸塞的總督，並率軍進駐波士頓。這些法案與軍事行動雖只針對麻薩諸塞一地而發，但諾斯顯有殺雞儆猴之意，企圖以屈服麻薩諸塞來教訓其他殖民地承認國會對殖民地的最高統治權，包括徵稅權在內。

各殖民地的通訊委員會立刻發動聲援，同時也安排召開殖民地代表會議，商討應付之道。一七七四年九月來自十二個殖民地（喬治亞未派人參加）的五十五位代表齊聚

*image  
not  
available*

隊，號稱「大陸陸軍」，以華盛頓為總司令。直到此時，殖民地人民還只是反對英國國會的專制統治，並不想別建新國。因此，七月中，大陸會議向英王提出一分請願書，要求撤銷各種迫害的法案。他們保證只要英國承認殖民地的權利，他們就立即放下武器。但英國已下定決心以武力屈服殖民地，英王不但拒絕殖民地的請願，並且增派軍隊馳援已在殖民地的英軍。八月，英國政府正式宣布殖民地處於叛亂的狀態中，並關閉了殖民地對外的貿易和交通。

### （一）獨立宣言

英國堅不讓步，殖民地也日趨極端。如南卡洛萊那早在三月就已制訂一部共和政體的憲法，這無異獨立；羅德島則撤銷須效忠英王的法律；在四月與五月，北卡洛萊那與維吉尼亞即訓令其代表正式向大陸會議建議獨立。七月二日大陸會議即通過獨立的決議。但為向全世界昭告此一決定，代表們推派五人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起草一份獨立宣言。實際起草工作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擔任。七月四日大陸會議予以通過，並向全世界宣布。

美國的「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是人類爭取自由民主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獻。全文大致可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說明發布宣言的理由。第二部分說明宣布採取的理論基礎。它開宗明義說，人生而有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組成政府，其統治權是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故當政府不能達成其組成的目標時，人民就有權加以改組或推翻，建立一個更能保障其權利的新政府。這雖然是洛克(John Locke)自然權利論的翻版，但是卻沒有其他的文字將民主的真諦像「獨立

宣言」這樣簡潔有力的陳述清楚。所以這短短一百多字竟成為美國，甚至全人類嚮往民主自由的啟示源泉。第三部分則是列舉了英王的罪行，以證明英國政府不但未能善盡其保障人民權利之責，反加迫害，已不配為政府。第四部分是向全世界正式宣布十三個殖民地斷絕與英國的一切關係，並組成美利堅合眾國。

獨立既經正式宣布，戰爭的意義則為之改變。在此之前，殖民地只是為了反抗英國的專制而戰；此後則是為了建國而戰。這一轉變大大振奮了美國的民心士氣，有更大的決心堅持到底。

## （二）華盛頓的危機

大陸軍組成後，在維吉尼亞由華盛頓統領。此時的大陸軍未經訓練，缺乏領導，也無組織。華盛頓吃驚地發現很多幹部是無賴，既無能又膽小。要將這群新英格蘭人磨練成軍人，對華盛頓而言是嚴厲的挑戰。直到後來有一些歐洲軍官自願到美洲加入大陸軍服役，才使大陸軍的訓練與軍紀上軌道。但華盛頓更大的困擾是要不斷應付永遠缺乏彈藥、糧食、兵源、金錢的問題和根深蒂固的地域觀念。大陸議會印的紙幣不值錢，幾乎等於廢紙，也不敢徵稅，因為怕人民反對。而兵源的問題是：役期只一年。役期一結束，不管華盛頓訴諸愛國心或配給更多的甜酒，很少人願意延長役期。譬如一七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圍攻波士頓的士兵役期已滿，結果當天士兵不顧戰況立刻收拾行李回家，整個軍營如同搬家，好像戰爭已經結束。華盛頓沒想到，他所期待領導的「為自由而戰」的「自由人」如此欠缺克己為公的精神和美德。他們愛好自由，也討厭當兵

的不自由。幸好有新英格蘭的民兵和義勇軍填補，戰力才得以維繫。整體而言，獨立革命戰爭初期，美軍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為自由而戰」的理想和「自由人必定戰勝自由的敵人」的信念。圍攻波士頓時，許多士兵只有既短且輕的矛和斧頭。一七七五年寒冬，華盛頓退守近郊福吉谷，士兵吃不飽也領不到薪水，衣不蔽體也無鞋穿，活像一群稻草人，據估計餓死凍死的達二千五百人，馬也餓死超過一千五百匹。問題並不是殖民地窮，而在於人民的冷漠和運輸補給出問題，此時社會各階層都狂熱於做生意謀取暴利。賓州則有許多親英忠王保皇黨很多的地方，例如費城的上流社會，仍然歌舞昇平。不過這惡劣的環境卻造就了堅忍不拔的美軍，福吉谷成為逆境中美國勇氣的象徵。

經濟上也好不到那裏去。硬幣消失，紙幣不值其票面所值。州政府無效率，在絕望中以增稅解決問題；但是人民太窮而且無組織，所以徵不出稅。一七八〇年，在六十幾個縣中，繳稅的縣不到半數。軍需官和募兵官幾乎全靠搶劫維生。傑弗遜愛好和平，設法折衷和解與維持憲政秩序。面對戰爭暴力的事實，他心理上毫無準備。他好像對情況的嚴重性一無認知，當立法機關建議大幅降低州的建軍經費時，他也默許通過。傑弗遜必須提供給華盛頓在北方及蓋茲在南方的軍需。他最需要錢，而且他最短缺的也正是錢。華盛頓的軍隊既缺兵源也缺物資，他每月至少寫兩封信向傑弗遜抱怨並懇求幫助。

就產業而言，美國獨立革命戰爭時，美方人口約二百五十萬，九成是農業人口。英方約九百萬人口，其製造業的資源、備戰、應戰和支持戰爭的能力，都遠遠超過美方。英方有強大的艦隊和陸軍，美方卻連火藥都要由法國走私

進口。在此情勢下，戰爭的頭三年，沒有任何國家公開支持「美獨」，只有看不清事實和熱愛自由的人才敢和英國打仗。

### （三）英國的失敗

相較於美國困窘的形勢，英國人本來可說是穩操勝券，但因為種種因素，情勢終於逆轉。一般而言，派去美洲的英軍將領都年輕優秀。英軍是高度訓練有素的職業正規軍，他們在歐洲戰場具有優勢，不過在廣闊的美洲森林裏卻未必能發揮戰力。與中規中矩的英軍相比，美軍像印地安人，善用地形地物，拔槍快而且射擊較準確，加上英軍的紅色制服鮮明醒目，容易瞄準，其指揮官更成為顯著的射擊標靶。遙遠的運輸補給也是英軍的大問題，三千哩的長途遠航造成兵疲馬困，大批家眷隨行也非常耗費軍需。英將威廉·豪(William Howe)用兵之所以延誤時機，其原因之一便是運輸補給的問題造成英軍無法乘勝追擊，這是英方敗戰的重要原因。<sup>45</sup>

### （四）撒拉托加的勝利

英軍的另一個問題是過於自信。訓練有素的英軍視美軍為一群叛亂的無賴，再加上初期戰役的順利，更增添了英軍的信心。美軍攻打魁北克失敗後，英將伯戈因(John Burgoyne)帶著精銳的兩棲部隊追逐潰散的美軍。他的路線在報上登了出來，就是出於自信與輕敵，他未走水路而入

---

<sup>45</sup> 有關獨立戰爭時美軍的作戰方式，可以看梅爾吉勃遜的電影《決戰時刻》，他所飾演的摩根上校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摩根上校和格林將軍所率領的民兵在南方戰線拖垮了英軍。

森林沼澤地帶，結果美軍毀橋、斷木擋路，迫使他造了四十多座便橋，結果二十哩路走了二十天。隨行的大批家眷與運輸補給問題，加上預定在紐約州會合三面夾攻的計畫未實現，導致一七七七年伯戈因在紐約州的撒拉托加(Saratoga)慘敗，六千人被俘投降。這是美國獨立戰爭的轉機。福蘭克林終於能使法國國王相信英國有被打敗的可能，一七七八年二月法美結盟，後來西班牙和荷蘭也提供海軍支持，法國的金錢與物資源源而來，更重要的是僅次於英國的法國艦隊投入戰爭，這是戰勝的重要關鍵。從一七八一年的春天到夏天，戰爭的決定性局面已經來臨。獲得海軍上將格拉斯(Grasse)率領法國強大艦隊的支援，華盛頓與法軍將領羅尚博(Rochambeau)的軍隊於九月三十日攻占約克頓。十月十九日，英軍投降，獨立戰爭終於結束。

### 三、美國獲勝的原因

美國獲勝的原因除了堅定的決心與法軍的支援之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在開戰之初，除了革命分子外，大概很少有人預期美國會贏，因為英國太強大了。它有訓練精良的軍隊，有經驗豐富的軍官，有舉世無匹的海軍。相反的，美國卻只有缺乏訓練的民兵，缺乏經驗的軍官，裝備補給不良，更沒有海軍。兩國作戰的能力幾乎完全不成比例。但實際上，英軍所面臨的一些困難，卻完全抵消了它具有的優勢。三千英里的海上距離使補給、支援、指揮的效能都大打折扣。英軍在殖民地最多時也不過四萬二千人。這樣少的兵力在一千英里長的疆域上作戰，兵力分散。這些困難已使英軍由優轉劣。何況美國的特殊環境與美軍的



統一國家的工作才算完成。

### （一）新的統治原理

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美國革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依據新的統治原理而建立的國家。宣告一個政治體制無效，另設一個新體制取代，乃是根據啟蒙運動一個典型的主題：「政府存在的目的何在？」「政府是不是做到了應該做的事？」但在美國獨立之前，啟蒙運動的諸多假設，從來只是理論上的探討，而無人（包括提倡者在內）認真思考建立依據理論而生的新國家。然而美國獨立卻必須面對這個課題。獨立宣言列舉民怨，就是要彰示英國在北美的作為，連一個好政府的起碼標準也達不到，從而為建立新的統治原理提供依據。宣言肯定人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就是以一般人的幸福為政府的當務之急。這意思不是說，政府因此應該巨細靡遺地管理人民所有活動，而是說政府有責任提供條件，使有理性的人可以追求幸福，同時不受政府或他人不必要的干涉。這是統治原理上一個重大的改變。自《聖經》以來，大多數政府並不宣稱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在於是否能創造幸福，不直接以增進幸福的能力作為統治正當性的基礎，因為若這樣做，等於給人民評判政府是否勝任的標準。柏拉圖以來的政治理論，可以說大都特意將幸福與正當性問題一分為二。這其中不免有兩面取巧之嫌：倘若某理論提倡的統治型態的確增進了人民的幸福，理論家就自以為是；倘若情形不如人意，就又強調所謂正當性並不以幸福為基礎。然而人權宣言卻明白將正當性與幸福的追求直接掛勾，提出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三大權利，而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障這

些權利。這種觀念的提出，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它使日後所有統治型態，都不能宣稱本身即具有正當性，而至少必須費盡苦心證明自己是為人民福祉而存在。因為上述革命統治原理的提出，人們就有了反抗暴政絕對而無限制的權力，與獨立宣言同樣重要，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Common Sense*)發揮了這點，由於目睹獨立戰爭期間，英國政府統治雖然瓦解，但北美社會依然運作的事實，使他擺脫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來假定的自然狀態人將相食的说法。他指出，社會自有其積極追求幸福的能力，政府只是用來消極地遏制人類少數的惡行，即使在最佳狀態下，政府也只是必要之惡，所以如果當政府不但不能遏制惡行，本身還成為罪惡的來源，就應該堅決推翻它。他這種觀點，對於最初猶豫不決，不知應否獨立的北美人民，具有很大的影響。華盛頓就是讀了潘恩的《常識》，才決心投入獨立戰爭。

美國人的獨立，為世界各地的改革者帶來鼓舞，其所捍衛的諸多權利，如宗教信仰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不受任意扣押的自由，都成為後來歐洲革命立憲，打倒專制君王的重要依據。譬如後來法國〈人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的起草委員會便承認：「這一崇高的思想產生於美洲，在美洲確立起自由的那些事件中，我們攜手合作。北美洲啟示了我們究竟要基於什麼樣的原則來捍衛自己。」更重要的是美國已成為自由和機會的一個象徵，它作為一個沒有數千年包袱卻擁有廣大土地的國家而受人欽羨。德國音樂家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便宣稱：「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門向不容異說和專制政治的受害者敞開著。」

## （二）天賦人權的理想

進而言之，這個國家的創新之處正在於它背後有種自覺的精神。美國人深信自己揚棄了人類史上存在過的種種政治形式，人類史將自此展開新頁。自開天闢地以來，人們受制於國王和祭司的統治，文明社會的政治地位都是世襲而得，個人的存在乃是為了社群與國家統治者的利益。但是自切斷與英王喬治三世乃至大不列顛的臍帶之際，美國人不僅向暴虐的君王統治說「不」，更是向創世以來一切的政治體制挑戰。當然，它們也向史上熟知的少數共和國借鏡；儘管如此，它們的體系仍有獨特之處，因為完全奠基於「天賦人權」的理念之上。基於這種精神，美國人理直氣壯地宣揚「個人至上」的觀點，這種想法雖然有時略顯幼稚，但與法國大革命為廣大人民的共同願望而戰，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要讓勞動階級出頭天，納粹德國為保護優等民族的「理念」相較，美國革命的精神確實有其獨特的價值，象徵著對個人價值的肯定，也進一步形成了人道與人權等普世價值。中國的辛亥革命也頗受美國獨立精神的啟發。

## （三）美國獨立進步意義的侷限性

在讚揚美國獨立對世界歷史的貢獻時，有三點是經常容易被誤解而須特別注意的。一是美國的獨立在一開始並沒有明確的民族認同，甚至於在建國之後也沒有萬眾一心的氣象。與其說美國人生來愛好自由民主，不甘被壓迫因而獨立建國；不如說美國在建國之初，因為根本沒有強固的民族意識，因此不得不訴求高遠的民主、自由理想以作

### § 作為轉捩點的美國革命：

- 殖民地對母國要求公平對待。
- 沒有發言權就不納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 革命的一種重要型式（史上三種政治革命之一）。
- 美國核心價值的普世化：天賦人權，生活、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

### § 參考文獻

1.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社會科學，1988）。
2. 麥克里蘭(JS McClelland)，彭懷棟譯，《西洋政治思想史》（臺北：商周，2000）。
3. 大衛·弗羅姆金，《世界之道：從文明的曙光到二十一世紀》（臺北：究竟，2000）。
4. 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臺北：桂冠，1991）。
5. 富勒(Fuller JF)著，鈕先鍾譯，《西洋世界軍事史》（臺北：軍事譯粹社，1968）。
6. 楊泰順，〈美國人認同的形成〉《美歐季刊》14卷2期（2000，臺北）。
7. 林茗顯，〈美國的獨立革命〉，《共和國雜誌》8、9期（1999，臺北）。
8. 孫同勛，〈美國的獨立革命〉，《歷史月刊》18期（1989，臺北）。

### § 思考問題

1. 歐洲各國為何要協助美國的獨立戰爭？

的運行規律，也能運用在一切人類事務的研究上。於是他們熱切地向大眾宣傳科學革命的成果，並希望藉由科學方法解決現實人生各方面的問題，如：政治、經濟、教育等。但啟蒙運動不僅是科學革命的延續，而是十八世紀的特殊現象，持續了近一個世紀之久，直到一七九〇年前後，才由於法國大革命和浪漫主義運動的興起而聲勢下滑。它對後世的影響極為深遠。

## 2. 啟蒙運動的同質與異質性

並非所有十八世紀的思想家都贊同啟蒙運動的理念。有些幾乎完全反對啟蒙運動所倡導的一切，比如義大利歷史哲學家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另外有些思想家，接受啟蒙運動的某些價值觀，但強烈反對其他的價值觀，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以科學方法研究政治學，但不認為理性可以解決世間的一切問題。此外，啟蒙運動是一場跨國性的文化運動，它興起於法國巴黎，然後擴及於西歐大部分地區（尤其是英國）和美國。各國的啟蒙運動者的思想模式趨向因國家而異，即使同一個國家，不同時期也不一樣。不過，儘管存在這些異質性，至少十八世紀的多數思想家明確地感到生活在一個激動人心的新知識氛圍中，且都相信人人皆有理性。

## 3. 世俗化的運動

啟蒙運動是較文藝復興更進一步的世俗化運動，啟蒙運動者的世界觀較前人更富世俗性，其現世的關懷更為濃厚，反教會與貴族的立場甚為明顯。正如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在《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中說：「宗教不再是人類的主要興趣所在，而

縮小為一個可以忽視的生活領域。」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亦在《歷史的觀念》(*The Idea of History*)中，將啟蒙運動定義為「人類生活和思想各個方面的世俗化」。正是在這個啟蒙時代，許多人之所以不全然否定宗教，是因為宗教還具有維繫社會道德和支持世俗科學合法性的價值。

## (二) 啟蒙運動的主要思潮

### 1. 理性主義

崇尚理性可說是啟蒙運動思想家的主要信念，因此啟蒙運動時代又被稱為「理性的時代」，認為憑藉理性的推理就可理解自然和人生的奧秘，而人類理性的發揚和完美，能夠將世界導向永久和平。因此，理性是人類的最佳嚮導。理性思想的昂揚，儒家思想有一定的角色。十六世紀末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將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向歐洲報導，其中中國的儒家思想、道德觀念及政治制度等都令當時的歐洲思想家們十分驚訝，以為中國沒有像西方基督宗教在社會上發揮如此重要的影響力，卻能維持如此高度的安定與秩序，其中所呈現的理性正好是西方當時最需要的價值。當時，傳教士所傳達的中國形象不免有些主觀，西方人士後來對中國的正面印象也有改變，但不可否認的，中華文化在啟蒙運動中成為一批當時先進思想家用來攻擊現有制度及觀念的重要利器。

### 2. 自然神論

科學革命在牛頓(Isaac Newton)發現萬有引力定律後達到高潮，該定律使天地間一切運動都可以理解和預見，進

呢？在這一點上他們主要受到洛克學說的影響。洛克(John Locke)將人的大腦視作一塊白板，利用感官感知外部世界來獲取知識。基於這一看法，啟蒙運動思想家得出了環境決定一切的結論。比如，他們覺得貴族高於普通百姓，不是因為他們承襲了某些特殊知識或品質，而只是由於貴族受到良好的訓練和身處於一個較佳的環境，也因此特別重視教育。他們想像若人人都可接受好的教育，則人的理性便得以發揚。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在《論法的精神》(*Del'Esprit des lois*)中，<sup>46</sup>便以氣候解釋了民族性的差異。反映一種對文化多樣性的積極好奇心，也預示了日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孔德(Auguste Comte)、馬克思(karl Marx)，乃至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歷史體系。

#### 4. 進步觀

進步觀就是相信人類社會和生活與時俱進，一代比一代趨於完滿。十八世紀後成為一般西方人共同的信念。啟蒙運動思想家推論的方式是：由於人皆有理性，理性可因教育啟發，從而能了解自身的問題並解決之，於是人的長進與社會的改善是可預期的。

---

<sup>46</sup> 《論法的精神》被視為第一部對政府和政治做科學探討的著作，作者自稱是基於經驗與各民族習俗法律的研究，因此也可被視為社會學的開拓之作。

### (三) 啟蒙運動思想家於各領域的具體成就

#### 1. 經濟學

十八世紀經濟學的特點是大理論的提出，其目標即是在呈現人類事務的通則。像是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其大著《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反對十六世紀以來流行於西歐的重商主義，因它是人為而不自然的措施。他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因他相信自然法則將合理引導經濟走向。馬爾薩斯(T. R. Malthus)的《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也相信人口的增減有其定律。

#### 2. 法學

法學方面最重要的表現，是國際法的提出與教化立場的刑法觀點。國際法是要建立一套國際社會中國家的行為準則，其所以成立的概念即是理性的普遍性，相信在此一基礎上可以制定一個跨國法律系統。刑法中的教化觀點也是建立在人皆有理性和環境決定論的信念上；據此，則為惡絕非是罪犯的本性，消滅罪惡的辦法不是消滅罪犯，而是啟發人的理性。

#### 3. 政治學

啟蒙運動思想家提出的政治學理論，最具改革社會的意義和影響力。啟蒙運動思想家亟思以理性主義重建政治秩序，他們相信傳統政治是因本身人為、不合理的政治結構而腐化。在此領域內重要的思想家有洛克、孟德斯鳩和盧梭。洛克攻擊任何形式的專制政體，講求人的自然權利（人的自然權利是根據自然法則所得，包括生命、財產、



自由諸權)；孟德斯鳩最重要的主張就是三權分立的權力分割與制衡原則，自信這些觀點是建立在對人性的理解和掌握上，是以科學方法從歷史經驗中獲取的法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 theory)，強調政府的權力是公眾協定的結果，故政府乃是「公意」的體現，這樣的觀點似在合理化直接民主的政治體制，其改革要求遠較當代其他學者激進。之前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人頗有契約論的主張，然而盧梭批駁霍布斯的看法，認為在自然狀態下人絕非互相殘殺的暴徒，也不會自願將自由權利交給一個利維坦式的暴君。國家確實應該起於契約，但是一直未曾實現，以致一些強大而較少顧忌的人，完全以欺騙和暴力來推行他們的意志。為了確保人們的自由，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契約，確立人民為自己的統治者，他們的主權就是公意。<sup>47</sup>綜而言之，三人具體的政治主張或有不一，但皆努力尋求政治運作的通則，以解決現實政治的種種問題。並且，他們也都認為自己的政治學說是符合自然法則的。

#### 4. 歷史學

代表人物為撰寫《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的吉朋(Edward Gibbon)。他以科學眼光來探討史事，積極蒐集史料證據，

---

<sup>47</sup> 在盧梭的批評者看來，這種說法等於把人民從一個奴役中解放出來，隨即置於另一個奴役之下，因為盧梭的公意不是個人意志的總合，而是一種「正確的」，人民「應該有」的意志。與洛克主張的社會契約論不同，盧梭的國家要求人們交出所有權利。他沒有預料到，就在身後(1778)不久，爆發了法國革命，革命期間狂熱的獨裁者將會運用他的理論。

## 二、法國大革命

發抖吧！暴君，賣國奸人，無恥的狗黨狐群！

發抖吧！賣國的陰謀，終究要得到報應！終究要得到報應！

全國都是上陣的戰士，前仆後繼有少年兵，法蘭西不斷出新人，隨時準備殺敵效命！

武裝起來，同胞，把隊伍組織好！

前進！前進！用骯髒的血做肥田的糞料！

——法國國歌《馬賽進行曲》

### （一）革命為何發生在法國

#### 1. 貴族特權的重申

自中古後期以來，歐洲政治已逐漸脫離封建體制，朝向君主專制邁進。君主擴權引發貴族的危機感，竭力維護原有的特權。十八世紀的法國，自精明能幹的君主路易十四(Louis XIV, 1661-1715)過世後，繼承者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皆屬無能之輩，予虎視眈眈的貴族以可趁之機。先是於路易十五統治初期，透過高等法院（實際上院內的成員多屬貴族階級）重申其特權；之後，當路易十六的財政大臣試圖通過一系列有損於貴族權利的改革計畫，如削減宮廷費用、廢除強迫農民維修公路的規定、減少某些行會的限制以鼓勵製造業生產等，這些改革同樣遭到高等法院的堅決抵制。貴族特權成為改革的一大阻力，既然由上而下的改革不成功，由下而上的革命也就不遠了。

## 2. 階級間的衝突

十八世紀的歐洲社會階級嚴明，每個人都有其法定歸屬的階級。教士為第一階級，貴族為第二階級，而所謂第三階級則包括一切不屬於前兩個階級的人，頂端的是大金融家、大商人、政府官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底層的則是農民。三個階級間內部和外部的衝突，鬆動原本穩定的社會結構，有如潛藏的一顆不定時炸彈。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就是衝突表面化的結果。

第一階級的教會擁有豐厚的教產，不僅可享有國家給予的免稅權，還可以對所有耕種的土地徵收什一稅，即年收成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之間。教會所有的收入是在教會各級人士間不平等地分配著，以致所得少的教士心生不滿，就連要交納什一稅的農民也深感憤恨，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辛苦錢是放進一群傲慢的教會高層的口袋裏，而不是平日他們所尊敬的教士。

至於在第二階級中，穿袍貴族與佩劍貴族之間的關係也很緊張。穿袍貴族是指用購買或聯姻的方式取得貴族頭銜，而佩劍貴族則是世襲的，故後者常把前者視做暴發戶。一般而言，他們居住在凡爾賽皇宮中，出任宮中要職，但多半績效不佳，其地產則由管家代為管理。一七八一年，他們成功地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把軍職出售給擁有貴族頭銜不足四代的人，以確保他們對軍隊的控制力。兩者間的矛盾，削弱了貴族的力量及其對抗新興中產階級的實力。

佩劍貴族對於城市中產階級的怨恨更深，後者囂張的態度和日益累積的財富，都讓前者備感威脅。富裕、有野心的中產階級成員的心願是由第三階級上升為貴族。但佩劍貴族正逐漸壓縮其上升的管道，此舉令中產階級忿忿不

平。此外，中產階級雖擁有萬貫家財和一定的社會地位，卻缺乏參與國政的機會。除了沒有投票權，即便能夠擔任公職，也多半是些職位卑下的地方官。

位於第三階級下層的農民，對於貴族、政府、教會諸多的剝削，也日感不滿。他們不但要負擔各種名目的稅收和徭役，還面臨公共土地一塊塊被圈圍的危機。公共土地的存在，是中世紀莊園習慣的殘餘，農民可於其上放牧，或是撿拾零星木柴或落穗來貼補家計。然而十八世紀時隨著工商業的活絡與城市貿易的發達，地主和君王均希望藉由提高土地的生產力和生產量來增加收入，便圈圍這些農民十分依賴的公共土地，也因此引發他們更為憤怒的情緒。

### 3. 思想的根源

法國革命有其思想的背景，法國為啟蒙運動的中心，哲士們著書立說，使思想革命的果實普遍化，同時也顯示出了目前的制度和社會的不合理處。洛克和孟德斯鳩的自由政治理論和盧梭的民主政治思想，使自然權利、有限政府、人民有抵抗虐政之權、契約政府和主權在民等觀念為人民所醉心。重農學派的自由放任理論亦有重大的影響。阿克頓(Lord Acton)認為法國革命在實際行動前已在大眾腦海中形成。事實上，當法國大革命爆發時，許多人都已清楚的認識到，這不是普通的騷亂，而就是那個預期中的革命了，法國民諺有謂：「都是伏爾泰的錯；都是盧梭的錯」可謂傳神。

### 4. 統治者的無能

法國大革命的爆發，與當時的統治者路易十六的無能不無關係。面對第三階級的蠢蠢欲動和貴族精英對中央集

## (二) 大革命的爆發

法國大革命開始時是溫和的，逐漸變得越來越激烈。法國大革命雖說是符合中產階級的利益，但卻是由貴族首先發動的，目的是向國王奪取權力。之後革命轉而由中產階級所主導，而下層民眾也感受到革命的風潮，紛紛起而響應。法國大革命是全民投入的活動，正可以說明為何一國之內的革命，其影響竟是如此深遠。

### 1. 第三階級展示實力

由於法國的財政十分困難，路易十六遂於一七八七年提出向所有地產徵收一種統一稅的要求，此舉引起貴族階級很大的反彈，宣稱國王唯有召開三級會議才能制定新稅制。法國自十七世紀初以來，沒有舉行過任何一次三級會議。但此時的路易十六別無選擇，只好讓步，允諾在一七八九年春天召開三級會議。貴族本以為他們可以控制會議的進行，從而重新獲得統治地位。但是，他們的估計證明完全是錯誤的。三級會議的召開所導致的不是貴族的勝利，而是一場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掀起。

當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三級會議於凡爾賽召開時，第三階級不論在人數上還是活力上都明顯超過前兩個階級。第三階級參加的成員，以中產階級居多，他們迫使國王將會議名稱改為國民會議，表示會議的結果是代表全國國民，而非特權階級。

下層民眾感受到革命的氣氛，群起由店家、作坊、農村、家庭中走出，一面散播新消息，一面組織示威遊行。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他們攻破了巴黎巴士底監獄，摧毀了壓迫的象徵。此外，巴士底監獄的陷落也標誌著民眾

有效的國家稅收機構，以及理性的官僚組織。這些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所發展的諸多事例皆成為後世民族國家的重要特徵。其他如國旗、國歌，或是國語的推行，也都可以追溯自法國大革命。自此以後，民族國家成為世界歷史進展的基本格局，人類許多的光明與醜惡皆要從其中追尋。

## 2. 社會問題的重視

法國大革命是普遍性的，與社會的關係十分明顯。相較於過往宮廷內的政治鬥爭，改朝換代，法國大革命更重視與群眾的連結，也因此與群眾相關的社會問題，也逐漸為人所注意。而之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發展，都不能脫離這個脈絡。同樣地，現代民主政治、大眾文化的發展也與此息息相關。

可以說，法國大革命開創了政治與社會結合的新世紀，自此人民的聲音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不管它是否正確。

## 3. 對革命的反省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59)目睹法國大革命的發生與演變，在《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一書中準確地指出，革命的成功，其實有賴於舊制度建立起的統治能力，革命只是進一步恢復了舊制度全部的政府機器，並建立起這樣一種局面，人民再次被投到專制之中，這個新的專制比舊的更合邏輯，更加公平，卻也更加全面。他說道：

法國革命不僅是要變革舊政府，而且要廢除舊社會結構，因此它必須攻擊一切現存權利，摧毀一切公認的勢力，除去各種傳統，更新風俗習慣；並且可以說，

從人們的頭腦中蕩滌所有一貫培育尊敬服從的思想。這就產生了法國革命如此獨特的無政府主義特點。但是搬開這些殘渣碎片，你就會發現一個龐大的中央政權，它將從前分散在大量從屬權力機構、等級、階級、職業、家庭、個人，以及散布於整個社會中的一切零散權力和影響，全部吸引過來，吞沒在它的統一體中。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一個與此相似的政權。

將近兩百年後，斯科克波(Theoda Skocpol)在《國家與社會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對法國大革命研究所得到的結論也顯示，法國大革命真正落實的成果，並非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價值，也不是民主，而是一個控制力更強大、更嚴密的「法國現代國家大廈」。著名歷史社會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說得更是清楚：

法國革命者所做的事情，就是掃除阻礙單一的全國指揮中心調動人力與資源的各種障礙。全面禁除特殊的地方習俗和豁免權，……在革命立法被法典化和應用於全國以後，每個公民都面對著民族的莊嚴化身，似乎是面對面的，不再有自治團體的身分和角色的保護層……實際上，公民所面對的是中央集權政府的官員——無論是特派代表、縣長、收稅官，還是徵兵軍官——他們都是以人民的名義，要求提供遠比國王代理人所要求的數量更大的物資和服務。

在工程學上，革命(revolution)指的是一個單位的循環運動。十五世紀時，在義大利政治上首次作為一個占星術用語，指行星忽然改變軌道的運動，導致突然的政局變動。意義原本中性，經過啟蒙時代直到法國大革命的爆發，「革

命」這個概念，才具有如此深遠、狂熱和世界歷史的意涵，有了政治上全面革新、推翻舊制的價值意義。伴隨著啟蒙時代樂觀的進步主義思想，在之後兩百年，被視為一種值得追求的壯舉或理想。無數青年爭先恐後投入帶有革命意味的事業中，追求從民主自由、獨立建國到全人類解放等等偉大動人的目標。然而，正如法國大革命的結局，革命帶來的，往往不是人民渴望的幸福生活，而以更具壓迫性、更集權的統治告終。這樣的現象不能單純地歸咎於領導人背叛了革命理想或壞人竊取了權柄。應該思考的是，為什麼大多數參加革命、有理想的人，卻無法阻止壞人，最後還一起造成了殘暴的結局。以撒·柏林(Isaian Berlin)在《通往奴役之路》書中，對此便有深刻的解釋。他說明革命理想背後所預設的，是一種相信普遍理性選擇下共同目標的存在，而據以實行全面改革的思想；然而，人們只有在一些最普遍的需求上可能達到共識，且越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越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任何革命，無論其初衷如何，都必須人為地塑造全體在統一的價值體系下達成共識，否則就只有失敗，而這麼做不可能不訴諸強制力與動員容易控制的群眾，那些幻想自由理想與革命共存的人，最後只有選擇離開，讓位給不擇手段的強人，或採取妥協，屈服於「人民的力量」。他說道：

只有存在著、或者有可能建立各個人的統一目標的地方，集體主義的社會才能擴展……

在歌頌法國大革命的正面價值時，也不能不注意它的其負面意涵，這或許也是每個自由但過度政治動員的社會所應警惕的。



§ 作為轉捩點的啟蒙與法國大革命：

- ◆ 理性、科學、進步觀、反教會及神職主義。
- ◆ 世俗化、人文主義及個人主義之加強。
- ◆ 自由、平等、友愛思潮之傳播世界各地。
- ◆ 舊秩序(*ancien regime*)之結束；專制王權之式微。
- ◆ 法蘭西國家銀行。
- ◆ 拿破崙法典整理。
- ◆ 歐洲之重組與整合。

§ 參考文獻

1. 康德，〈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運動？〉，《歷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務，1997）。
2. 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66年）。
3. Norman Hampson，李豐斌譯，《啟蒙運動》（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
4. 以撒·柏林著，孫尚揚譯，《啟蒙的時代》（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
5.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香港：牛津，1994）。
6. 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從盧梭到羅伯斯比爾》（上海：三聯，1994）。
7. 霍布斯邦，《革命的年代》（臺北：麥田，1997）。
8. 卡爾·貝克著，《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城》（臺北：左岸文化，2002）。
9. 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務，1998）。
10.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上海：社會科學，1988）。
11. 王曾才，《西洋近代史》（臺北：正中，1983）。

12. 麥克尼爾(McNeill, William Hardy)著，倪大昕、楊潤殷譯，《競逐富強》（上海：學林，1996）。
13. 以撒·柏林，《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14. 史壯伯格，《近代西方思想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15. 斯科克波，《國家與社會革命》（臺北：桂冠，1998）。
16. 黃仁宇，〈法國大革命〉，《歷史月刊》18期（1989，臺北）。

### §思考問題：

1. 啟蒙運動的政治哲學與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及其過程之間有怎樣的關聯？
2. 啟蒙運動家何以一方面相信普世理性，又對啟迪民智感到悲觀？試分析啟蒙運動思潮中的菁英主義取向。
3. 為什麼許多重要史家對法國大革命的評價有兩極化的情形，他們主要的觀點如何？

### §延伸閱讀

1. 福柯著，李康譯，〈什麼是啟蒙？〉，《國外社會學》1997年6期（北京）。
2. 凱西爾著，顧偉銘等譯，《啟蒙哲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
3. 伏爾泰著，王燕生譯，《哲學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4. 盧梭著，勒賽克爾評注，李常山譯，《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5. 愛德蒙·柏克著，何兆武等譯，《法國革命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6. 阿克頓著，JH菲吉斯、RV羅倫斯編輯，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
7. 狄更斯，《雙城記》（臺北：遠景，1985）。
8. 史蒂芬·茨威格著，黃敬甫等譯，《瑪麗·安托內特傳》（廣州：長城出版社，2003）。

## 第十一講

# 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

- 一、世界局勢與鴉片戰爭的關係
- 二、廣州貿易體系及其問題
- 三、鴉片戰爭爆發
- 四、鴉片戰後的影響
- 五、鴉片戰後對臺灣的影響
- 六、鴉片戰敗的原因與進一步的解釋
- 七、現代化的反省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線；今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廣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砲彈所到無所不摧，水路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李鴻章，〈籌議海防摺〉

中國自鴉片戰爭(1840)開始，遭逢千古未有之變局，種種的殘酷血腥與屈辱紛至沓來。在慨嘆之餘，必須認知中國的苦難並非偶然的悲劇，既牽涉中國長遠的歷史演進，

也反映了近代世界的發展。也因此，近代中國作為歷史的一個轉捩點，其意義也是雙重的，它同時反映了中西歷史的巨變，具有深遠的啟示性。

## 一、世界局勢與鴉片戰爭的關係

道光年間，中西都有劇烈的變動，自十六世紀中西接觸以來的和緩關係不復存在。進而言之，此時的變動之所以能產生全球性的影響，還必須回溯到地理大發現以來全球體系的形成。

過去受到哥倫布史觀的影響，過度重視地中海與西北歐的航線（如布勞岱爾）。事實上，世界最大的航線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貿易航線。在世界體系形成的過程中，西方便企圖掌握這條航線以求取最高的利益。<sup>50</sup>鴉片戰爭便是在這個背景下形成。英國為了這條東亞貿易航線的利益侵略印度，進而動員印度的資源侵略東亞的霸主中國。英國向東發展的趨勢還有別的因素。由於荷蘭人的介紹，英人自一六六四年開始喜好飲茶，購買茶葉都必須由白銀支付，使得美洲的白銀如同慢性出血一般流向了中國，中國對英國商品的需求卻很小，這就使英國對華貿易產生嚴重的逆差。英國由於工業革命，資金的需求日益強烈，偏偏對中國的貿易又大量逆差，亟欲尋求能扳回頹勢的有利商

---

<sup>50</sup> 傳統印象中，西方在地理大發現後就雄霸海上。美國學者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 的研究則指出，直到十八世紀，中國人都是東亞航線的主人，也就是世界財富的主要掌握者，西方只是世界經濟中的配角；這種情形一直要到十九世紀西方普遍工業發達之後，才發生逆轉。見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與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

品，而鴉片成功地扮演此一角色。再者，英國由於美洲的獨立而喪失美洲殖民地資源，迫切地轉向中國尋求貿易。凡此種種，皆可見世界局勢變化與鴉片戰爭之關係。其他如十九世紀自由貿易學說的流行，使得英人更難忍受中國訂下的貿易限制和障礙；又如外國傳教士的使命感，對於廣州各種有礙行動居留的相關慣例深惡痛絕。這些也都是造成鴉片戰爭的背景原因之一。

## 二、廣州貿易體系及其問題

世界歷史的變化是鴉片戰爭的重要背景，廣州貿易體系的諸多問題則是鴉片戰爭的直接原因。廣州貿易本是中國朝貢貿易體系下的產物——中國人並不以商業利益看待貿易，而視通商為對外人的一種恩惠；反之，洋人有過失，則取消通商以示薄懲。這點在憑藉貿易生存壯大的英國看來，是絕對難以理解消受的（英國人稱鴉片戰爭為商業戰爭）。雙方也是由廣州鴉片貿易的問題而爆發衝突。

### （一）洋商與公行的壟斷

清朝的廣州貿易體系下有兩類組織，即公行和洋行，既是當時壟斷中外貿易的團體，也是中外關係的居間者。洋行又稱牙行，是朝廷特許辦理外洋貿易的商業組織，而從事貿易者便是行商。公行則為全體洋行公辦夷船買賣的共同結合。洋行數目時有改變，但通稱為「廣州十三洋行」。公行的主要任務在劃一價格，承銷一切進出口貨物，代辦內地出口貨物，並代中國政府徵收進出口貨物關稅，以及管理外商事務。外國商人一到廣州之後，所有行動，包括

商務與生活，便由行商代理，不得與行商之外的商人交易，也不能與中國官員接觸，造成外國人對行商壟斷貿易與限制生活的不滿。除此之外，外商最不滿的是，關稅名目繁多，正稅之外的「陋規」，多至六十餘種。如上所述，中國在體制上，始終不把對外貿易視為正常的商業活動來管理運作；官方徵派獲得特許之利的行商，在朝廷有需要時回饋報效，認為理所當然，而行商自然將成本反映在對外商的貿易上。加之中國傳統將商業活動視為官箴腐敗之源，嚴禁官員涉入，因此對於外商的抗議與交涉的要求，官方採取迴避態度，概由行商轉達，並不積極處理，且常斥責外商不知感恩。外商自然開始尋求體制外的管道，賄賂、貪污與走私也就應運而生，造成更多的不滿與糾紛。

## （二）民、刑事糾紛日益嚴重

除了體制上所造成的諸多不便之外，鴉片戰爭前，中英糾紛最為頻繁的是商欠和凶案。所謂商欠，通常為廣州行商負欠英商的債務糾紛。這種債務通常是因為買賣、借貸、洋行倒閉或挪用貨銀而來。道光以前，行商拖欠夷帳，常常不待債主催討，中國官府即勒令清償；但道光以後，往往因債務過於龐大，即使官府干預亦無法解決。兇殺案件的發生，則多半牽涉犯罪洋人的法律管轄權問題。例如外籍水手誤殺了中國人，中國法律認為殺人償命，應予處決，而西人卻認為該名水手應接受本國法律審判，而非「野蠻」的中國法律。司法觀念的落差，也是衝突的重要原因，且往往被後世學者擴大為東西文化的衝突。

### （三）外交管道缺乏

鑑於上述的諸多障礙，英國人有意由外交途徑來改變狀況，於是有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和阿美士德(Lord Amherst)分別在一七九三與一八一六出使中國。但由於中西對於貿易與外交的觀念差異過大，兩次出使皆未能達成具體成果。<sup>51</sup>由於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兩次旨在建立正式貿易與外交管道的努力都告失敗，英王面臨著三種行動的選擇：一是放棄中國貿易；二是服從中國的天下秩序；三是用軍事手段改變現狀。對英國這樣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及海上霸主來說，前兩種選擇自是不必考慮，只剩下第三條途徑——武力解決。與此同時，隨著英國結束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私人貿易快速增長，鴉片走私也隨之飆升，廣州貿易的性質發生急劇的變化。到一八二〇年，廣州貿易的局面已經全然改觀，私商貿易已超過了東印度公司貿易，走私鴉片已超過了合法貨物，成為主要的進口貨項。這兩種情勢的發展，導致陳舊的廣州貿易體系崩潰，加速中英之間衝突的來臨。

---

<sup>51</sup> 中國皇帝對於馬戛爾尼的態度，究竟是一個開明的表現，還是專制君主的傲慢，近人屢有爭論。何偉亞(James L. Hevia)認為，馬戛爾尼使華反映的是兩個帝國不同世界觀的交鋒，西方不過是以主權平等的觀念，否定各地域傳統的權力秩序，為霸權擴張尋求合理的藉口。中國以賓禮、多主制為基礎的天下秩序，本有切合實際、靈通應變的實踐經驗，實無理由接受西方的所謂「合理的要求」。參見何偉亞，《懷柔遠人》。



### 三、鴉片戰爭爆發

#### (一) 點燃導火線——林則徐禁煙

道光十三年(1833)，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通商專利取消，保護商業的責任改由英國政府負責。相較於公司，政府更有動武的本錢，卻更少商業的計算。中英大規模的衝突似已勢不可免。林則徐的禁煙行動，更為這緊繃的局面投下爆炸性的因素。

對當時的中國而言，繁榮的鴉片貿易已成為國族生死攸關、亟需處理的課題。在社會方面，當時全國估計有兩百萬到一千萬人，因為吸食鴉片而成為體質孱弱、精神萎靡的廢物；經濟上，到了一八三八年，中國每年需消耗白銀三千萬兩購買鴉片，形成嚴重的貿易赤字，再不採取行動，本國的資金與戰力將迅速流失。因此，林則徐在禁令無效後，以強硬的手段沒收鴉片，逼迫英人保證不再販賣與走私。許多學者因此只探討禁煙的過程與手段是否恰當合宜；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中國官方採取現代的法律程序禁止鴉片貿易，當時的英國也不可能同意就此停止販賣。無論如何，中國禁煙的正當性無可非議。即使在英方，國會亦僅是以五票之差通過出兵中國的決議。日後的英國首相，當時年輕的托利黨議員格拉史東(Gladstone)也深以為恥，他表示：

我根本不知道，也從未聽說過，有任何一個戰爭在起源時就比這個戰爭更為不公平的，更故意使這個國家蒙上永恆恥辱的。正當而光榮的紳士反對談起英國國旗得意地飄揚於廣州。蓋那面國旗的升起，是為了保

護一項不名譽的走私貿易；假如現在它必須升起於中國海岸，則我們將懷著顫慄的心情，無顏直視。

悲哀的是，在現代世界秩序中，正義公理很少有決定性的作用，中國人自救的意志不敵英國人貪婪的欲望。英國人短暫的讓步後，決心要透過軍事手段改變這個局面。

## （二）戰爭三階段

整個鴉片戰爭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一八四〇年六月懿律(George Elliott)抵達中國，持續到一八四一年一月「穿鼻草約」的締結。這段期間中英之間的衝突規模不大，只是臨時徵調的英國商船與廣州中方軍隊之間的交戰。英國人的目的在獲得鴉片的賠款與大幅修改通商制度，認為無論交涉或是戰爭都應當以北方為目標，如此才能收得全面而快速的成效，根本無意進攻廣州。因此英國的艦隊在封鎖口岸後便向北開去。

直到此時，道光帝仍然支持林則徐，他曾鼓勵林則徐「朕不慮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蒞」。但在舟山失陷，英艦隊進逼北京後，皇帝對林則徐的信心開始動搖。又由於西人對皇帝抱怨林則徐在廣州的作為，使得道光誤信只要懲處林則徐，整個事件便會平息，於是委任琦善全權處理北京的談判。琦善把與英人的談判當成一場官司：英人既說林則徐有錯，那就查辦林則徐。以中國皇帝的命令去查辦本國的疆吏，既無損國體，也表示中國的寬大。接替懿律的首席全權代表義律(Charles Elliott)以琦善的態度開明，於是答應回廣州再議。在英國軍力的威逼下，琦善簽訂了穿鼻草約，內容包括了割讓香港、賠款與國交平行。

但是這個條約並沒未獲得雙方接受。英國認為賠款太

## 2. 善後章程

- 一、英船進口，關稅值百抽五，廢除所有雜項費用。
- 二、中英人民間如有交涉訴訟，由英國領事處理，英人犯罪按英國法律科罰。
- 三、通商口岸准英國停泊兵艦，約束水手，保護商民。
- 四、英國商船卸貨，任由英商自僱小艇駁運。

## 3. 虎門條約

虎門條約中有關最惠國待遇的條款，嚴重破壞中國的主權，對日後中外關係影響深遠。首先，條約內容是片面的而非互惠行為；其次，它反映出各國利益均霑的野心，自此以後，幾乎所有國家在和中國訂立的條約中，都要求中國能給予片面最惠國待遇，從中國獲取政府特權和經濟利益。另在第十條規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國官船一隻停泊，以資約束各貨船水手」，約中所謂「官船」即指軍艦，英國藉約束水手及商人為名，輕易取得海軍長期駐紮中國條約口岸的特權，這代表中國領海主權被剝奪，構成外國武力對於中國的長期威脅。諷刺的是，在戰後，鴉片買賣並未落實在條約中，英國人迴避了這個難以啟齒的真正原因。但鴉片仍然持續流入中國，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為止。

## 四、鴉片戰後的影響

### （一）政治方面

鴉片戰敗，中國國際地位驟降，清廷弱點暴露，引起

列強環伺搶食。中國喪失了許多主權，如關稅自主、領事裁判權、內河航行權，還有片面最惠國待遇，使中國淪為半獨立國，破壞了主權國的地位。中國被迫開放五口通商，打破了清室閉關自守攻策，從此門戶洞開，必須面對列強的砲艦外交。

## （二）經濟方面

國內較大的城市開放為商埠，外商自由銷售貨品，競爭激烈，使中國的工商業受到嚴重的傷害，導致經濟破產。大量賠款、外國貨物輸入，加上鴉片無法禁絕，使銀元大量外流，國家經濟凋敝。

## （三）社會方面

自鴉片戰敗及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國人仇外、排外之心日重。鴉片戰後沒有禁絕鴉片，自此鴉片大量輸入，流毒中國社會；且外人依據條約成立租界，更不受中國法律統治。租界成為罪惡的溫床，對社會風氣有極不良的影響。

## （四）宗教方面

基督宗教自明末再傳入中國以來，經過短暫的蜜月期後，康熙末年開始由於敬天祭祖祀孔的禮儀之爭而關係緊張，清廷政策時緊時鬆，直到嘉慶十六年(1811)年才正式全面禁教，將天主教視同白蓮教，提倡者及信從者皆處罰，地方官隱匿不報也不行，罰則寫入大清刑律中。

鴉片戰爭後，西方國家亟欲使基督宗教在華的傳佈合

法化，在戰後對法國的黃埔條約中，法國使臣要求清廷談判大臣耆英向道光皇帝請求信仰天主教徒免罪而得到許可，故一般而言學者認為正式合法化是在1844年。但由於地方上執行時有地方官認知的差異，加上大清刑律及會典上信教有罪的條文遲遲未刪，是故直到一八九零年代，仍有西方人士抗議的情形，而教案的發生，1860年後增加，而以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為高峰，此後則漸減，但仍未根絕。

## 五、鴉片戰後對臺灣的影響

鴉片戰爭中，英人曾派艦進攻臺灣，但被擊退。英人並未因此放棄對臺灣的野心。由於輪船日漸普及，西方國家對煤需要日益迫切。道光二十九年五月，美兵艦前往雞籠勘察煤礦。次年三月，英國輪船亦駛進雞籠，聲稱前來購買煤炭，其實另有在臺灣設港口以代福州、廈門之意，但為中國所拒絕。直到英法聯軍之役後，臺灣才開港通商。

臺灣乃是以一個貿易據點的地位出現在世界歷史上，鴉片戰爭後臺灣的遭遇，更充分說明了臺灣與貿易、海權的關係。正因為這種聯繫，鴉片戰後，清朝許多次對外戰事，臺灣都被捲入，包括英法聯軍之役、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臺灣的重要性，才漸漸受到正視。

對清朝來說，除了明鄭割據期間，長久以來，國防的重心皆在西北，臺灣只是大陸邊陲一個無關緊要的小島。清朝對於臺灣的治理，也是採取消極的態度，禁止人民攜眷前來，在此情形下，許多福建居民都是季節性地來臺工作，然後再回到大陸，臺灣社會也因為充斥隻身來臺的羅

## （一）王朝循環

王朝循環理論認為，一個朝代在興起之初，由於飽經戰亂，人口必然減少，土地資源較為充裕，但是經過休養生息後，人口滋生，土地漸漸不足，動亂由是產生。這個理論放在清末確實有若干切合之處。據學者研究，十六世紀晚期到十八世紀末葉白蓮教倡亂(1796)以前的長期和平，使中國人口自一億五千萬倍增。一七七九到一八五〇年，又增加百分之五十六，以至於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叛亂前夕，人口已達四億三千萬。在人口急速成長之下，生產技術未能相應的提昇，以農業為主的社會，馬上面臨壓力。就土地面積而言，乾隆中葉已經接近極大化，除東北之外，其他各省增加的可能性極小。在此情勢下，中國的動亂必不可免，只有西方力量的介入，才使中國擺脫傳統的治亂循環，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個理論的代表人物如韋伯(Max Weber)等，皆認為中國歷史長期停滯不前。較為修正的看法則稱，中國文明只有量的增加而無質的發展，這種看法忽略了中國文明內在改變的動力，而將一切變革視為外力的影響，不免有西方人為殖民侵略合理化的意味。在此理論上，又發展出挑戰與回應理論、現代化理論，都是將西方看做推動改革的主要力量。平心而論，這種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以農業為基礎的文明，很難擺脫人口與糧食高度平衡的陷阱，資本累積很不容易，難以走上資本集中、技術發達的道路。然而，這種說法卻也忽略了西方對中國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諸如政治的分裂與經濟上的剝削。披尋史策，中國近百年來所以走得如此艱難，列強的干涉恐怕要負首要責任。

## （二）文化主義論

文化主義也是在上述理論基礎上，對中國何以落後的一種理解。他們基於相信中國長期停滯的假設，將中國一切的落後與特色皆歸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譬如早在一八二五年，黑格爾(Hegel)就認為中國文化導致蒙昧服從、無知無能，而斷言中國必然為英國征服。另外儒家反商的傳統，也被認為阻礙了貿易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重視內在個人修為而輕視外在物質條件的思維，被指為科學技術的殺手。這些傳統的陰影，是所有改革難以克服的難題。基於上述的觀念，很容易將鴉片戰爭的失敗進一步推演為中國人整個文明的失敗。事實上，中國文化有其積極進取的一面，儒家的仁政思想，幫助中國長時間養育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並提供相對安定富足的生活。<sup>54</sup>晚清以來，今文經學與經世之學復興，人們力矯晚明空談心性之弊，著名學者如龔自珍，已開始思考如何透過建省，將西北邊疆融入中華版圖。近二十年來，臺灣與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也使學者從新認識儒家學說對現代商業的助益。這些都說明文化主義論的不足之處。

## （三）地主官僚的共生結構

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代表的學者，從社會經濟的角度來分析近代中國的挫敗，認為中國的社會是一種

---

<sup>54</sup> 即使到十九世紀，西方社會中大多數人也仍未得到工業進步的好處。今日學界已有修正的看法，認為中國人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都享有比西方人良好的生活水準，即使在十九世紀以後，西方平民的生活水準，與中國也並非天差地遠。見《劍橋中國史——晚清篇上》。

一個主要特徵就是，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可以拒絕進入世界貿易的體系。所有非西方文明之所以遭受侵略，其主要原因，從來不是因為文化誤會，而是現實的利益。今日，以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為首的西方學者，重提文明衝突論，其背景仍然是全球霸權的對峙格局。

## 七、現代化的反省

上述理論，固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從西方殖民體系來重新理解近代中國的問題，一個最為人所忽略的事實是，中國在西方的全面而密集地侵略下，並未獲得如西方所擁有的優裕時間來慢慢發展各種政體與主義。無論是資產階級的形成、主權國家的概念、強而有力中央政府，實際上都需要上百年的穩定發展，與許多條件的配合。徐中約對於中國為何不能遏止鴉片貿易，便有如下的評論：「儘管鴉片貿易產生了上述這些（負面）的經濟影響，但由於缺乏一套完善的海關系統，一支有效的緝私水師和公共行政中的道德責任感，致使鴉片貿易無法被禁絕。」上述任一項，都牽涉複雜的財政組織、預算管理、軍事工業、航海技術，乃至現代的公共行政觀念與公務員制度。又如清朝在戰後對關稅的談判中，輕易的允諾值百抽五的稅率，被視為中國人缺乏國家主權觀念的明證。但問題是，主權國家本來是西方特殊的歷史產物，關稅壁壘等觀念，對當時中國是完全陌生的，與戰前相比，清朝官員自然會以較前提高的稅率為滿足。我們必須了解，西方在憑藉取自殖民地如此龐大的物力與人力支持下，其現代化的過程尚且有所波折。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中國的現代化從一



開始便帶有很嚴重的急迫性。各種在西方慢慢演進成熟的理論與制度，在中國卻一瞬間蜂擁而出。在此情勢下，中國如何可能不跌跌撞撞地步向現代之路。今日對中國不能順利走向現代化的諸多指控未必貼切，它們多是西方人強加於世界的生存法則，並非純是中國可悲的缺憾。

我們更應該明白，現代化不僅是物質的進步，還牽涉各種思想道德觀念的調整取捨。一個簡單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為了更富裕，更有權力，就放棄長久以來的信仰與理想？相信不是任何人都會得出肯定的答案。現代化也是同樣的道理，任何一個悠久文明培養出的精英，都不會僅只因為外來技術可以改善生產效率，可以無堅不摧，可以迅速致富，可以控制更多資源，就投向外來文明的懷抱。現代化常常是迫於生存的需要，不得不然的改變，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一方面被迫去做自己不以為然的事，另一方面又要重新解釋自己的傳統，以確信自身行為的正當，中國現代化的痛苦即產生於此，衝突亦爆發於此，而所以不得不艱難，亦在於此。今天，大多數人都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外來的強勢文化，因此可以很輕易指出前人種種「錯誤」的作為，這正是百年現代化的成果，卻也是最深的悲哀。這是我們回頭檢視這段歷史時，所應深刻思考的。

聯，2004）。

9. 蔣廷黻，〈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中國通史論文選集下》（臺北：南天書局，1999）。
10. 千家駒，〈英國的產業革命與鴉片戰爭〉，《歷史月刊》29期（1990，臺北）。
11. 王遠義，〈對中國現代性的一種觀察〉，《臺大歷史學報》28期（2001，臺北）。
12. 林滿紅，〈世界史中的社會恐懼——從獵巫、叫魂，到臺灣的「認同」危機〉，《歷史月刊》207期（2005，臺北）。

## § 思考問題

1. 二十世紀末，美國傾力打擊國內外的販毒集團，推動各種國際禁毒與反毒品行動；反觀有些西方學者，將英國因為清廷官方強力禁止鴉片販賣而出兵開戰，定性為「商務戰爭」，你對此有何看法？
2. 清末由於救亡圖存，追求富強，各方或者主張西學為用，或者主張全盤西化；根據當時的討論，你認為文化因素與國家強弱有何種關聯？
3. 韋伯認為儒家倫理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七〇年代以來，以儒家倫理為傳統文化的東亞地區在經濟上都有長足發展，因此有人甚至提出是儒家倫理促進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對此你有何看法？

## 第十二講

# 公元1914年：兩次世界大戰

- 一、大戰爆發的原因
- 二、戰爭的發展
- 三、戰後的新世界格局
- 四、集權主義與集體屠殺的淵源與反省

我曾親眼目睹各種群眾性思潮——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產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不可救藥的瘟疫——毒害了我們歐洲文化之花的民族主義。……目擊人類不可想像地倒退到以為早已被人忘卻了的野蠻之中，這是一種有它自己綱領性的自覺信條的反人性野蠻，使我們在經過了若干世紀之後，重又見到了不宣而戰的戰爭，見到了集中營、嚴刑拷打、大肆搶劫和對不設防城市的轟炸。……不過，與此自相矛盾的是，在這個使我們的世界在道德方面倒退了將近一千年的同一時代裏，我也看到了同樣的人類，由於在技術和智力方面取得未曾預料到的成就，而使自己大大進步，一躍超越了以往幾百萬年所取得的業績。且看：用飛機征服了太空；地面上的話可以在同一秒鐘之內傳遍全球，從而克服了世界的空間距離；原子的裂變戰勝了最險惡的潛伏疾病。……總之，作為整體的人類，未

曾露出過像我們所見到的那種惡魔般的猙獰面目，也未曾建樹過那種好像是神明創造的業績。

——史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序》

## 一、大戰爆發的原因

### (一) 歐洲協調瓦解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遭到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激進分子暗殺。這件刺殺案，很快演變為國際危機，八月四日，歐洲主要國家，德、奧、英、法、俄都已捲入戰爭，世界大戰就此爆發。當時各國都以為不過是一場短暫的戰爭，對於解決原有矛盾不無好處。沒有人料到，在接下來四年的時間裏，將有三千七百萬人死亡，而且再隔二十年，各國的矛盾也無法解決，還要再一次世界大戰，賠上數以千萬計的生命，才能獲得一個悲慘的結束。

造成這般不可收拾的後果，實有其長期的因素。自從拿破崙戰爭結束，在奧國偉大外交家梅特涅(Prince Von Metternich)的主導下，歐洲列強建立了「歐洲協調」的集體安全機制，透過共同協調彼此的利益以防止衝突與革命，因此維持了近五十年的和平。然而，隨著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發展，這種保守冷靜的態度，開始受到嚴重的挑戰。其中最重大的改變，莫過於德國的統一。

兩百年來，日爾曼地區一直是歐洲戰爭的受害者，其中尤以法國對它荼毒最甚，從紅衣主教利希留開始(Cardinal de Richelieu, 1624到1642年執政)，法國就刻意

維持日爾曼地區的分裂。它的軍隊幾次入侵，至拿破崙戰爭達到頂點，日爾曼地區大約損失了百分之三十的人口。維也納會議後，梅特涅雖然依舊維持日爾曼地區的分裂，扼止普魯士繼續強大，卻已將原本三百多個小邦，合為三十多個。在他的考慮中，日爾曼地區應該既不強大，也不弱小，剛好可以作為大國之間的緩衝與屏障。然而乘著民族主義不可阻擋的浪潮，以及俾斯麥(Otto Von Bismark)精明的操作，普魯士終於還是突破梅特涅苦心建立的安全體系，逐步統一了日爾曼地區。

隨著一八七一年德國統一的完成，歐洲協調機制也告結束，那種集體安全互相妥協的精神，如今被現實政治所取代，正如俾斯麥所說「弱國將被強國吞噬」。新的局勢是建立在強權互相角力的不穩定基礎上。

## （二）敵對聯盟形成

然而這並不是說，俾斯麥與德國必須為戰爭負責，德國統一是民族主義的產物，原本並不具有侵略性，而俾斯麥更是老謀深算，宣稱統一後的德國是一個「心滿意足」的國家，他並沒有順從民族主義的邏輯，試圖兼併所有日爾曼人居住的地區，而是盡力做到「持盈保泰」，維持德國的和平與安全。在此構想下，他首要防止的就是法國的報復。普法戰爭後，俾斯麥並未對法痛下辣手，提出過於苛刻的條件，（兼併洛林是一個例外，該地與亞爾薩斯不同，居民主要是法國人），他只是透過一連串的外交手腕，使法國在國際上受到孤立。

然而，新皇威廉二世（Willem II, 1888~1918在位）並不喜歡這種不求進取的政策，迫使俾斯麥下臺。威廉二世

追求更大幅度展現德國充盈的國力，主要反映在對外擴張殖民地與建立大海艦隊。這使原本保持中立的英國，感到大為不安，因為英國引以為傲的即是其殖民地與世界第一的海軍。德國甚至也鼓勵奧地利對巴爾幹半島發展，過去俾斯麥曾努力節制奧國，因為此舉會造成將巴爾幹視為禁臠的俄國不滿。結果就是，一心報仇的法國人，藉機拉攏了俄國，並一步步與世仇英國和解。德國因為自身國策的模糊，使其他國家感到不安，反過來也使自己惶惶不可終日，於是越發拉攏友邦，並建立多面作戰的軍力。若擁有可能同時對抗多國的武力，即意味能輕易擊敗一國，於是各國也跟著結盟增兵，再加上本來在一個自由主義的全盛時代，以往貴族那種出於姻親情誼與教養的克制作風（尤其在外交部門中，此種貴族氣息特別強烈），已漸漸被平民的民粹主義風格所取代，各國遂把外交視為一種追求無限制民族光榮的手段。日後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就是建立在這樣的背景中。

由於之前發生過眾多危機，一次大戰最後由一件單純的槍擊案觸發，也不會令人太過驚異。延遲至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從一八七〇到一九〇〇年之間，歐洲列強的殖民活動，無形中把各國的衝突緊張轉移到歐洲以外，甚至，英俄、英法等國結成同盟，除了因為德國的威脅，多少也奠基於他們在殖民地爭執中的妥協。一九〇〇以後，列強將海外土地瓜分殆盡，各國爭執焦點遂無可避免的回到歐洲本土，巴爾幹半島正是歐洲本土帝國主義角力之處，因此，這場戰爭的爆發，不能歸罪於單一國家或個人，實在是歐洲歷史長時間發展的結果，是在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等條件的配合下，一場難

## 二、戰爭的發展

### (一) 德國人的戰略

長久以來，歷史學界輕視軍事技術發展的研究，認為戰爭只是長期根本因素的結果，然而僅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宏觀因素，並無法完全說明歷史何以如此進展。事實上，軍事技術本身的變化，往往足以決定歷史，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極佳的例證。

由於國力的根本差距，德國面對東西兩面作戰的困局，勢必不能同時兼顧，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先集中力量擊敗一方。一八九〇年代，德國參謀總長希里芬(Afred Graf von Schlieffen)，根據這個原則，判斷俄國雖然兵力龐大，然而受限於工業落後與交通惡劣，動員軍隊必定曠日費時，所以不會立刻對德國東線造成威脅。因此，他大膽地只留下十個師防守俄國，而將六十一個師投入西線，以期一舉擊敗英法。除此之外，鑒於德、法邊境很短，法軍又經營已久，防禦堅固，所以希里芬在德法邊境只留下八個師，而將其他五十三個師放在荷蘭、比利時邊境，計畫引誘法國為收復亞爾薩斯與洛林而攻擊德、法邊境的德軍；趁法軍主力進入德國時，德軍大軍一舉越過荷蘭、比利時，以壓倒性的兵力掃過英吉利海峽沿岸。如同旋轉門效應，當敵人推動一邊時，另一邊同時重重打回背上。這個計畫，由於繼任者的錯誤部署，使誘敵的軍力太強，而進攻的部分又嫌不足，所以儘管取得最初的成功，最後還是在馬恩河被英、法擋了下來，未能奪下巴黎。

然而二十年後，德國人在物質條件更惡劣的情形下，古德林(Heinz Guderian)首創將戰車集中編組為裝甲師，利

用戰車的機動性，出奇不意地由盧森堡的森林進入法國，直趨英吉利海峽，英法聯軍以為德軍會再次執行希里芬的計畫，開入比利時布防，於是他們與法國的聯繫遂被切斷。德軍以六星期的時間與六萬人的代價，便逼使法國在損失一百五十萬人後投降，英國則狼狽的從敦克爾克撤退，損失了所有的重裝備。西方盟軍其實也有戰車，而且數量與技術明顯領先，但他們完全不了解戰車的機動性，只分散拿來當步兵的支援武器。反觀德國，則完全是靠著傑出的作戰計畫，以及對裝備創新的運作，締造了單恃經濟與國力毫無可能的重大戰果。<sup>55</sup>

## （二）全新的戰爭型態

就軍事史的觀點，兩次大戰中還包含了眾多轉捩點。機關槍出現之時，英國人斥之為玩具；德軍觀察員霍夫曼(Captain Hoffmann)在日俄戰爭中，目睹俄軍使用機關槍對日軍造成的驚人殺傷力，便建議德軍銳意發展該項裝備，然而並未得到當局的全力支持，各國軍隊都還訓練大批騎兵，預備戰爭爆發後馳騁沙場。然而一戰打響後，人們才驚覺機關槍防守的威力，幾乎使任何進攻的行為形同自殺，從而造成戰壕對峙的局面，<sup>56</sup>騎兵也從此退出戰場，成為歷史。

---

<sup>55</sup> 學者研究指出，二戰期間，德軍儘管經常處於裝備與兵力的劣勢之中，但無論攻守，都比敵軍展現最佳的作戰能力。史家有理由相信，若非希特勒在征俄時堅持錯誤的戰略，放棄對莫斯科的集中攻擊，德國人很可能建立連蒙古人都辦不到的歐亞帝國。

<sup>56</sup> 電影《未婚妻的漫長等待》與小說《西線無戰事》，鮮明地呈現了戰壕的慘況與機槍的威力。



戰車的運用標示著機械化作戰時代全面來臨。戰車最初的設計目的，便在突破戰壕僵局，因此著重防護和火力，但經過德國人大膽的運用與創新，成為現代陸戰中的王牌兵器，扮演突破防線、擴張戰果的要角。

此外，兩次大戰期間，德軍運用新武器潛艇，運用狼群戰術執行封鎖（即以多艘潛艇跟蹤、奇襲敵方船隊），逼使英國幾乎斷糧。太平洋上，山本五十六憑藉賭徒才有的大膽與巧思（他曾說：讓我在蒙地卡羅待一個月，我可以替日本贏一艘巡洋艦），以航空母艦偷襲珍珠港，最先改變了海戰的面貌。反而讓美國人充分認識了航空母艦的價值，在中途島之役，以劣勢兵力，一舉消滅日軍四艘航空母艦，奪回戰爭的主動權。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的超級戰艦大和、武藏未曾擊沉一艘敵艦，只能充作艦隊司令的交通工具。

空權的重要性，是兩次大戰期間，最重要的軍事變革。一次大戰時，德國空戰英雄李希多芬 (Manfred von Richthofen)，以其無人能及的八十架擊落數，<sup>57</sup>首次證明制空權對軍隊作戰的重要。一次戰後，義大利人杜黑 (Giulio Douhet) 出版《制空權》，首次系統闡述空軍的重要，他構想以長程轟炸機深入敵國的腹地，顛覆傳統的前線與後方之分，摧毀敵人的工業與士氣。到了二次大戰，德國空軍便以杜黑的理論為指導，配合地上戰車的攻勢，以俯衝轟炸機與傘兵，首次執行了今日美軍在伊拉克的作戰模式。

美國人利用其龐大的工業力量，更是把空權發揮地淋

---

<sup>57</sup> 史上空戰紀錄保持人是二次大戰德國飛行員埃里希·哈特曼，一共擊落三百五十二架敵機。

國平均負擔德國百分之九十四的軍力，其犧牲也最大，可以說，沒有俄國，盟軍恐怕難以贏得戰爭，因此以雅爾達密約建立起來的戰後世界格局，並非皆是共產黨陰謀的產物，大致也反映東西世界力量的消長。

然而，美國成為二戰最大的贏家。在兩次大戰，它都占了後發制人的好處，等到局勢明朗之後，在關鍵時刻才適時投入全力，不僅避免了錯誤的消耗，也收到最大的利益，由於兩次大戰其本土都未受到破壞，<sup>59</sup>因此當別國在斷垣殘壁中重建家園時，美國卻挾其龐大資金，投入世界各地的重建，從而掌握了世界經濟的大權，連帶地，美國價值也在經濟的基礎上，儼然成為世界的普世價值。但另一方面，美國高踞全球霸主之位，也付出了昂貴的代價。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者曾說：「當貧窮侵襲我們的社區，別忘了每年數百億美元花在核子潛艇的支出。」近來的九一一事件，也是這種過度擴張的代價之一。

## （二）第三世界邁向自立

在兩強對立的大格局下，業已精疲力盡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大都放棄了其對殖民地的控制，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形成了戰後最鮮明的世界政治現象。然而正如美國外交家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所強調的，任何出現權力真空的地方，便會有其他的權力填補。因此殖民地獨立的過程，往往便是另一場血腥的開始。各地興起的本地勢力，必然與世界霸權產生關係，戰後廣泛發生在第三世界地區

---

<sup>59</sup> 日本在二次大戰時利用高空西風施放熱氣球炸彈，炸死了一家野餐的美國人，是美國本土唯一死於敵人的案例。

力，建立一種以生活圈為根本的新統治原理，這是世界歷史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變革。人類是否能就此避免戰爭，還需繼續的努力。

#### 四、集權主義與集體屠殺的淵源與反省

兩次大戰期間，最令人怵目驚心卻又遺害深遠的現象，便是集權主義與大規模集體暴力。其中最惡名昭彰的，莫過於納粹統治與屠殺猶太人的暴行。同時，一次大戰的慘烈廝殺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9~1953)的殘酷統治，都同樣使人困惑，何以會出現這些狂熱的暴行？

##### (一) 傳統的因素

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回顧戰前整個歐洲的歷史狀況：無論是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具有集權主義的性格。在此，集權主義可以被定義為——現代技術專家治理的國家對人民公私行為的完全掌控。德國和其他一些國家轉向集權的主要原因在於，它們的社會在沒有完全擺脫傳統時，工業化就已經有了很大的進展，傳統的體制和現代工業文明的要求未能充分整合，工業腐蝕了傳統體制的穩定，社會衝突與混亂也就因之而生。

十八世紀雙重革命——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造成巨大的人口與政治變化。受過教育的歐洲人自問：飛速增長與永不安寧的社會要如何才能得到控制，並重新步入歐洲文化的軌道上？一七七六到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帶來一個線索：人民至上論，也就是民主。然而民主存在兩種變體，一個是自由主義，另一個則是集體主義。前者體現了洛克

(John Locke)的清教徒意識與個人主義；後者則表現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雅各賓(Jacobin)公共強制的觀點。自由主義後來發展為西歐的思想主流，強調代議政府、自由、平等和人權。集體主義產生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它們要求廢除私人財產，物品的公共所有權和「真正的」平等。兩者都是啟蒙運動的產物，相信人可以通過經濟的富裕和對幸福的追求實現自我。好的生活被視為擁有物品的生活，只是在可能獲得好的生活的具體方法上，自由主義與集體主義有所區別。

然而民主的途徑，在德國等東歐、南歐國家，卻沒有導致自由主義的發展，這些國家的專制—君主傳統太過強大，民主的自由主義路線備受阻撓，集體主義則被接受，因為它強調普遍意志；並且，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可以和傳統觀點相調和，也就在此潛藏著集權主義：認為政治是救贖性的，有政治的共同模式，個人必須服從公共利益。

## （二）新的意識形態背景

在此同時，也就是十九世紀後半葉，所有的政治運動都受到三大潮流的影響。它們是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這三者彼此之間又有關聯。民族主義原本帶有文化色彩，然而到了一八七〇年代，因為德、義兩個新興民族國家的形成，民族主義成為一種近乎宗教的、末世的運動，並以瘋狂的興奮和沸騰的衝動控制了民眾。在民族自決的旗幟下，政客激發了民族主義，成為帝國主義征服本質的煙幕。事實上，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都是中產階級主導經濟秩序的產物，這種秩序為政治經濟的擴張調動整個民族。當國內市場在十九世紀末飽和乃至萎縮，資本家開

始向海外擴張，但控制殖民地需要調動大量資源，有賴國家介入支持。經濟控制，必然加劇對國內政治的控制。帝國主義富於集權主義的特徵，可以歸結為以下方面：1. 帝國主義加強了日常生活的軍事化，刺激了國內和國外民族和種族的衝突；2. 鼓動救世主的思想，將來自迫害「賤民」的殘酷及冷漠的心態注入到歐洲的社會結構中，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鋪平道路。

十九世紀晚期，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也引起歐洲種族集團之間的仇恨。這些衝突表現在種族運動的激增，諸如泛德意志主義、泛斯拉夫主義。然而，因為歐洲大陸是一個極為分散的種族集團大雜燴，雖然不可能將所有的德國人合併到一個更大的德國中，或把所有斯拉夫人合併到一個類似的國家，但民族主義的發展作為一個強大的力量瓦解了跨民族的帝國，鼓勵了種族主義。

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十九世紀的種族主義演變為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藉助達爾文的發現，公眾要求知道誰是最適合生存的，為什麼是適合生存的。人們輕率地認為，遺傳重於環境。亞利安至上論的先驅者豪斯頓·斯特沃德·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認為西方文化中所有偉大的東西都來自條頓民族，所有墮落的東西都是猶太人的影響。他的書在一次大戰爆發時銷售了十萬冊。在十九世紀晚期，種族主義與其他幾種不穩定的思潮相互激盪發揚。理性至上曾是啟蒙運動時代和十九世紀大部分時間的標誌，但卻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新思潮強調意志、非理性、主觀、直覺或者無意識在人類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對理性的反叛主要指向工業文明的精神，涉及到對城市狀態、技術理性，以及小資產階級生活普遍的馴服、冷漠、

乏味規則的深刻不滿。許多知識分子強烈地反對技術的非人性化，資本主義的貪婪、低級政治的危險，以及審美趣味的墮落，他們採取了深遠的反民主、反精英主義姿態。所謂的「文化絕望的政治」高度強化了歐洲社會集權主義的模式。在社會經濟面臨重大壓力的時代，人們對民主的方式極不耐煩，加上反理性思潮，而傾向回到集權的「美好傳統」。

對自由主義政治的厭倦是普遍的，人們越來越相信，議會民主促進了社會衝突和黨派紛爭。當十九世紀接近尾聲時，敏銳的觀察者注意到，對資產階級文明和價值觀的反彈正暗潮洶湧。然而這些文明和價值觀，正是議會民主、科學理性和資本主義的基石。如今，正如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作中所表現的那樣，理性只是虛弱的外表，完全受到本能力量的驅使。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堅持，所有生活形式的「真正的」決定性因素是無意識的意志，是一種「專橫欲求」的意志。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則使這一意志神聖化，讚美古希臘酒神的救世觀與對「墮落沒有憐憫」的超人統治。<sup>60</sup>然而這種對現狀不滿所產生的懷古之思，並不能醫治人類心理的分裂，卻極可能轉變為攻擊負有責任的社會，促成了古代殘酷行為和各種的偏見。「權力意志」可能會被輕易的滲入雜質，從尼采對「精神的超越」或戰勝自我的信仰，轉變為野蠻的統治和侵略。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返古野蠻的大爆發。<sup>61</sup>

<sup>60</sup> 見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奇的名著，《理性的毀滅》，該書詳述德國哲學中非理性精神發展的過程。

<sup>61</sup> 《魔戒》的作者身歷一次大戰之慘酷，在小說中，這種返古的野蠻，形象化的表現為魔君索倫與半獸人大軍。

的經濟。集權主義都依賴大眾的支持，在歷史必然性的煙幕下掩蓋其真實目的。這也是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駁斥一般將法西斯和社會主義對立的看法。如他身歷其境的觀察，正是那些有良好願望的社會主義者，以集體主義的共同目標摧毀了自由主義的個人選擇，為納粹同樣邏輯的號召，打開了通路。回顧這段歷史，再看看今天社會的類似狀況，有必要特別注意，珍惜自由的成果，反對任何以民主之名而推行集權的主張。

### (三) 歷史記憶與反省

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慘酷的集體屠殺，莫過於納粹殺害六百萬猶太人與日軍的南京大屠殺。這些屠殺都是在集權政府的統治下進行的。納粹著名的法學者梅茲格(Edmund Mezger)，竟以其聰明才智，在法理上證明猶太人不是人，因此可以迫害。而日軍在南京亦視中國人如草芥，任意凌辱殘害，軍官以砍人頭數打賭比賽，而日本報紙竟大為讚揚報導。

大戰之後，德國人對於戰時犯下的罪行，深自反省，不僅著於史書，政府首長也公開道歉，更以實際行動告誡後代，最近在柏林落成的納粹屠殺紀念館，可為明證。反觀日本，不僅竄改教科書，隻字不提南京大屠殺，即連侵略亦說成是「進出」，在戰後更以各種手段，否認戰爭罪行，祭拜戰犯，一味宣稱自己因遭原子彈轟炸，也是受害者。日本細菌戰調查團團長森正孝即指出：「日本許多人總認為自己是二戰的受害者，對青年進行教育時只講長崎和廣島。他們就是這種思考方法，原因在於日本從來沒有認真反省過，日本為什麼戰敗？而對發動戰爭的國家制

度，美國佔領軍都把它保留下來了。」又如著名的東史郎案。東史郎為侵華日軍士兵，戰後經商致富，反省自己在南京參與屠殺，乃出版當年日記，如實公布真相，卻在數年後遭日本右翼分子指控毀謗，而日本司法竟不顧事實歷程，判決東史郎敗訴，企圖以此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尚有多位日本歷史學家，秉持良心控告文部省竄改史實，亦是纏訟多年，未得到正式回應，在在可見日本缺乏反省能力。也正因為如此，儘管日本想要恢復軍隊，爭取進入聯合國安理會，本屬合理，卻引發亞洲各國的疑慮與譴責，深恐日本恢復軍國主義。這也提醒我們，要深切面對歷史的教訓，妄圖以一時的政治操作，抹煞歷史的影響，只會引來更激烈的反撲。



§ 作為轉捩點的兩次世界大戰：

- 戰爭結果，使世界格局產生重大的改變，過去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如今變成以美國與蘇聯兩強對峙的局面。
- 重建家園時，美國卻挾其龐大資金，投入世界各地的重建，從而掌握了世界經濟的大權，連帶的，美國價值也在經濟的基礎上，儼然成為世界的普世價值。
- 殖民地紛紛獨立，形成了鮮明的世界政治現象。反映出來美蘇兩國的對抗。
- 亞洲地圖重劃，中國抗日牽制日本大軍，為盟國在太平洋的進攻作出了難以取代的貢獻，從而自1840年以來，大致上恢復了主權的完整，完成了黃仁宇所說長時間革命的第一階段，為日後現代化提供了起碼的條件。但戰後中國陷入內戰，中共建國，中國開始以第三世界國家之首自居，台灣脫離日本，但與日本共同成為冷戰時代美國的重要夥伴，直到今日。
- 歐洲人開始思考一種有別於民族國家偏狹主權觀的新世界體系，歐洲聯盟的成立，歐洲各國放棄部分主權，思考避免國家之間無謂的暴力，建立一種以生活圈為根本的新統治原理，是世界歷史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變革。

§ 參考文獻

1. 李德哈特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臺北：麥田，2000）。
2. 李德哈特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臺北：麥田，1995）。
3. 季辛吉，《大外交》（臺北：智庫文化，1998）。
4. 拉爾夫等著，趙豐譯，《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5.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6. Klaus. P. Fischer, 《納粹德國》(南京:江蘇人民,2005)。
7. 海耶克著,張尚德譯,《通往奴役之路》(臺北:桂冠,1982)。
8. 埃爾頓編,《劍橋世界近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3)。
9. 張亞中,《歐洲統合:超國家主義與政府間主義的互動》(臺北:揚智,1998)。
10. 吳圳義,〈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歷史月刊》144期(2000,臺北)。

### § 思考問題

1. 一次大戰前,歐洲各國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大肆擴軍,建立保證摧毀敵國的超強大軍力,軍備競賽的結果是釀成了史上最慘烈的世界大戰。這齣歷史悲劇對於今日世人帶來何種啟示?
2. 集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具有哪些特徵?具有理想性、理性的知識分子,應如何自覺地避免淪為鼓吹集權、摧毀自由的幫凶?

### § 延伸閱讀

1. 邱吉爾(Winston. S. Churhill)著,吳萬沈等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臺北:左岸文化,2002)。
2.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臺北:世界書局,2000)。
3. 史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譯,《昨日的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4)。

## 第十三講

# 公元1917年：俄國大革命

- 一、列寧與十月革命
- 二、共產理論的發展
- 三、解放帝國主義殖民地——俄國革命與中國
- 四、本世紀最大的一場誤會？

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

——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

### 一、列寧與十月革命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深夜，歷經了十二年的流亡生涯，列寧(Vladimir Ilich Lenin)從瑞士取道德國來到瑞典，再滑雪進入芬蘭，最後搭乘由芬蘭駛入俄國的一列火車，停靠在彼得格勒一個不起眼的灰泥色小車站。他不慌不忙地進入過去沙皇的休息室，對迎接他的群眾發表演說：<sup>62</sup>

……也許不是今天，但必定是明天，或是不久的將來，歐洲的資本主義必將全面崩潰。你們正在從事的俄國

---

<sup>62</sup> 愛德蒙·威爾森，《到芬蘭車站——馬克思主義的起源與發展》。

一方面互相傾軋，同時又想彌補彼此之間的分歧。從政黨而言，立憲民主黨與軍官團一心要消滅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則旨在消滅資產階級，唯有溫和但不團結的的社會主義政黨（共產黨稱之為孟什維克派，Menshevik）努力湊合兩者。因此也注定兩者不可能合作。

列寧回國之意義在於，他說服並帶領布爾什維克與一部分社會主義者，確立消滅臨時政府的目標（他們日後宣稱自己是多數派（布爾什維克的俄文原意），但事實上，當時他們才是激進的少數派（孟什維克））。在著名的〈四月提綱〉與許多演說中，他聲稱革命很快就將從資產階級民主階段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最終將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圓滿結束，採取由蘇維埃執政的形式最適合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型國家」。

列寧說：「管理國家的不應當是警察，不應當是對人民毫不負責任的，站在人民頭上的官吏，不應當是脫離人民的常備軍，而應該是蘇維埃所聯合起來普遍武裝的人民自己。」這樣一個沒有恐怖統治的國家，自然有著無比的號召力，列寧信徒愈來愈能影響原本參加孟什維克派的工人。但列寧並不立刻舉事，只攻擊政府中的資產階級代表，爭取溫和社會主義者的支持，一直等到十一月六日（俄曆十月二十五日），才正式推翻了臨時政府，當天情形幾乎與推翻沙皇如出一轍。

儘管布爾什維克成功的推翻了臨時政府，並控制了聖彼得堡與莫斯科，但他們在一億六千萬的總人口中只佔不到七萬人，甚至在廣泛的社會主義黨派中，也有一半的選民。因此必須對德簽定屈辱的布列斯特合約，割讓芬蘭、波蘭與烏克蘭，還要再花兩年半的時間，擊敗俄國各地的

的差額——剩餘價值，被資本家所佔有，以此，他得出工人被剝削的論斷。資產階級因為擁有生產資料，佔有本該屬於工人的收入，是故他們希望維持現狀，以政治、法律、社會制度將無產階級固定在受剝削的位置。但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終將自取滅亡。這是因為市場競爭將淘汰小資本家，而使資本集中在少數幾個巨大的工業金融聯合體。這就使小資產階級破產，成為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數量因而越來越多。一方面，這使得工資更形降低；另一方面，這也使無產者的力量日益壯大，終於為了捍衛自己的生存而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主義社會。在此社會中，無產階級專政，按勞動分配，國家控制一切生產、分配過程。當社會財富因此而極度充裕時，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屆時，國家無需存在，階級之分也將消失，社會中每個人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然而，儘管號稱科學，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西歐，卻沒有如馬克思所預言那樣，發生無可避免的革命。蓋十九世紀後期工業正蓬勃發展，各國下層大眾的生活普遍有所改善，革命情緒也就減少；再加上各國政府改善警力，使得十九世紀初期那種佔據街壘的暴動更無可能。

因此，晚年的馬克思感到十分失望，也就在這時候，他開始注意到一個過去認為根本沒資格革命的國家——俄國。

《資本論》(*Das Kapital*)的俄文本於一八六八年（原著出版的次年）在聖彼得堡出版，是該書的第一個外語譯本，馬克思大吃一驚，因為他始終以為會先出現英譯本（終馬克思一生，英譯本都未出現）。在給友人的信中，他有感而發：「俄國人總是不斷在追求我們西方所提供的激勵思

想，他們真是一群『識貨』的行家。」由於這個緣故，馬克思開始真正注意俄國的動向，並學習俄文，雖然他似乎從未真正了解俄國。

一八八一年，一位年輕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寫信給馬克思，問他是否暗示以農業為主的俄國，也必須經過資本主義剝削的所有階段之後，才能期待革命。這問題把馬克思給難倒了。馬克思在回函中說，他的《資本論》主要是根據西歐的現象而發的。在回信的草稿中，馬克思本來還想好好研究此問題，然而最後他只是簡單地回答，認為農人社區組織在俄國將是發展新社會的最有利方式，「但是這種方式如要順利發展，首先必須排除所有阻礙這種發展的不利因素。」

這個含混的回答使日後無數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者費盡心力去理解。而列寧也是其中之一。

列寧首先必須解決的（也是李大釗、毛澤東所需解決的），便是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觀點，因為如果遵守這種決定論，他們便只有枯等資本主義的出現。因此，他認為俄國的革命將作為「火花」，點燃西歐長期延誤的社會主義革命，俄國革命本身並不是通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非資本主義道路，而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事件，他的社會主義前途最終必須依賴於發達工業化國家無產階級的即時介入。與馬克思不同，列寧認為超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很快會成為一個具體的情勢。

這種解釋，隨著西歐沒有因為「火花」爆發革命，變得棘手起來。共產國際在這種原因下成立，以促進早該來到，並且在理論上非來不可的西歐革命。而在此之前，俄國必須依靠布爾什維克政權本身去實現資產階級的社會經

濟革命，在社會主義的政治領導下，以最快速度完成資本主義發展未完成的任務。此時，世界革命開始成為重要的問題。

### 三、解放帝國主義殖民地—— 俄國革命與中國

由於西歐革命的發生與否，關乎整個俄國共產革命的正當性，眼見西歐革命在短期難以實現，列寧於是寫了《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論》(*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在書中，他解釋西歐所以一直不發生革命，是因為西方的資本家，利用剝削殖民地，賄賂了本國受壓迫的無產階級，因此，唯有解放殖民地，使殖民地率先革命，才能斷了資本主義的命脈。這也就是「通往巴黎最近的捷徑，是經過北京」的意思。

在此意義上，中國等亞洲國家成了俄國革命輸出的重要對象。然而中國的共產黨人一樣必須解決在資本主義出現以前，中國有無革命可能的問題。從世界的格局來看，李大釗認定中國是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無產階級，因而先天具有革命的本質，從而在俄國顧問的協助下，與陳獨秀創立了中國共產黨。俄國革命因此對中國產生深遠的影響。列寧死後，托洛斯基(Leon Trotsky)與史達林(Joseph Stalin)之間的鬥爭，也牽涉世界革命這個問題，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可以說是對列寧的一種補充。托洛斯基反對史達林主張的「一國社會主義」的務實論調，但也不贊成列寧「由工人和農民聯合起來革命」。他的看法是，蘇聯的

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因為農民的政治目標太過狹隘；同時要發展世界革命，革命目標不僅是民族獨立與民主，還要實現社會主義，否則革命無法完全成功，而唯有革命成功，才能解放全世界的經濟資源。

總之，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狂潮，實有其理論上的需要，但這並不意味各地接受共產主義都是因為外來的影響。共產主義所以對各落後國家的革命者具有吸引力，主要是因為自始它即具有反抗西方資本與帝國主義的色彩，而對於這些國家來說，革命的原因往往都是尋求民族的獨立，共產主義這一同樣來自西方的理論，既有西方進步的光環，又為反抗西方帶來正當性，所以很容易被接受。在實踐上，各國的革命者卻時常適應自身的情勢，對共產主義進行修正或補充，這些修正在正統共產理論中，往往是錯誤的。例如中國共產革命者，在很長的時間，都遵守俄國革命與馬克思理論，發展城市中的工人，並以城市暴動為奪權的手段。即使因為中國的工業落後，沒有足夠的現代產業工人，而遭遇很大的挫敗，但史達林還是支持與命令中共執行這種路線。然而，毛澤東卻提出農民在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修正共產主義理論中視農民為保守反革命的成見，甚至放棄在城市暴動的路線，公開主張在鄉村建立革命根據地。<sup>64</sup>事實證明，毛澤東的策略，儘管就正統理論來看是不

---

<sup>64</sup> 中共在鄉村中發起土地革命，同樣不是基於正統理論，而是根據建立政權的需要，隨時改變標準，因此再窮的地方，也能找到地主與富農，有了地主與富農，便動員群眾鬥爭。為了使群眾放下顏面人情，中共往往先鼓動鄉村中的地痞流氓帶頭鬥爭，使鄉村充滿赤色恐怖，形成兩極分化，中共也就趁機建立政權。至此，土地革命不是為了解決經濟上生產力不足的問題，而成了政治上動員的手段。



通的，在實際上卻是正確有用的：中共正是靠著發動農民，以鄉村包圍城市，而擊敗了國民黨。中共的模式，反而成為日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共產黨的策略，如越共，亦是以類似的方法，贏得越戰的勝利。這些事實都說明，馬克思創發的共產主義，從來不是基於事實的觀察，而是基於一套意識形態的想像，這種想像給予革命者的啟發，要遠遠大於對社會問題的解決。

## 四、本世紀最大的一場誤會？

### （一）史達林模式

正如上述，俄國革命在沒有外來革命的幫助下，必須依靠自身政權去實現資本主義未完成的任務。

首先，這意味快速實現城市工業化，也就是列寧所說：「電氣化加蘇維埃等於社會主義」，這又要求建立一個專制主義國家，<sup>65</sup>以剝削農業剩餘充當工業現代化的資金。於是，一度因為將一億六千萬俄畝土地分給農民而奪得政權、贏得內戰的布爾什維克黨人，開始極殘酷地推行農業集體化的剝削手段，數百萬人為此死亡，俄國農業產量為之大挫。直到一九三九年，才勉強恢復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然而，俄國犧牲了一整代人的幸福，也並非一無所獲，依靠這筆從農業部門中剝削的資金，俄國在基本上不對外侵

---

<sup>65</sup> 於是在馬克思看來只是暫時性手段的無產階級專政，在列寧這裡被曖昧地延長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經過列寧的發揮，成為以菁英分子指導無產階級革命的共產黨，而這些菁英分子卻不來自無產階級，而是知識分子的職業革命家，這種觀念對日後各國的革命深具影響。

變成怎樣有效的壓制機構。他們設想的都是自由主義國家的社會，無產階級是其人口的最大宗，因此其國難以久長。但他們也都忘了自己說過，資產階級社會與自由主義國家將很有效率地確保統治。此外，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雖不是資產階級國家，但其國家機器向西方學會了相當可觀的效率，根據古典馬克思理論，資產階級將透過國家代理人從事階級戰爭，列寧由此認為，至少在無產階級尚未充分發展的國家，必須透過黨這個革命代理人從事階級戰爭，為了勝任，黨必須像現代國家那樣有效率、有組織且專業。

## （二）共產主義為何走向專制？

共產運動是否只是本世紀最大的一場誤會？至少那些曾經為它奉獻生命與熱情的人不會同意。社會主義的確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威脅，扼抑了資本主義的殘暴，正如恩格斯在馬克思的喪禮上說：

他人生的真正使命乃是致力於推翻資本社會及其帶來的統治型態，乃是致力於解放當前的無產階級，他是第一個促使無產者意識到自己立場和需求的人，意識到能在某種情形下贏得自由。戰鬥是馬克思的本質，而其戰鬥所具有的熱情、毅力與成功，幾乎無人能及。也因此成為他那個時代最被仇視和毀謗的人，政府無分專制或共和，都將他驅逐出境，中產階級無分保守或極端民主，競相對他施以毀謗，然而他對這一切視若蛛網，不屑之，忽略之，惟有迫於必要才予以回應。如今他走了—受到百萬革命同志勞工的敬愛、尊敬與哀悼—從西伯利亞到加里福尼亞的礦場，遍及歐洲與美國的每一部分。他的名字與功業將與時代長存。

共產主義追求的理想，原本是最人道的社會，為何到了後來，卻往往變質為專制暴政？對於這個問題，僅只訴諸個人道德操守問題，是沒有太大意義的，許多人認為史達林主義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只有托洛斯基才能代表真正的共產主義理想（托洛斯基所以無法阻止史達林得權，其中部分原因是，當時人認為他比史達林更專橫）。這種說法不過是說共產主義理想所以無法實現，是因為它未曾實現過。對此，我們必須審視共產主義做為一種政治哲學的內涵。

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在其名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在他看來，正義並非與自由、民主等政治價值並列的一種政治價值。相反的，正義就是我們衡量這些價值的重要依據。如果某政策是不正義的，就不能因為該政策捍衛其他價值一如自由一而為之辯護。然而，恰恰在正義的觀念上，共產主義者，與自由主義大相逕庭。

沒有人懷疑共產主義的基礎具有某些正義原則。事實上，做為正義觀念基礎的平等理念，亦為馬克思的思想基礎。但是從馬克斯開始，即視正義原則只是對社會不公不義的差勁補救，他甚至批評「平等權利」、「公平分配」的理念為「陳腐的語言垃圾」。他不是真正反對正義，而是他相信僅僅訴求權利並無法達到正義。在馬克思看來，正義僅是試圖協調個人之間的衝突，而共產主義卻能消除這些衝突，因此也就消除了對正義的需要。進一步分析，所有對正義的需求，取決於以下兩個前提：1. 人們的目標衝突，對於什麼是善的觀念不相一致；2. 物質資源的有限性。當人們面對目標不一致又物質匱乏的環境，才有必要

Платонович)的小說《切文古爾鎮》對農業集體化的感想：

我們這裏所有的不僅僅是機械裝置，還有生活在這裏的人民。除非他們自己安排自己，否則你不能將他們隨意調整。過去我將革命想成是蒸汽機，現在我發現它不是。

如今，當代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幾乎都放棄了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說，自然更不相信共產世界必然是物質豐裕的社會。他們重新認同自由主義正義原則的重要，只是在手段上有所不同，反對將私人所得重分配做為社會公平的機制，而應該以重新分配生產資料為主（簡單的說，也就是反對將捕來的魚平分，而要求平分漁網。）期望人們能因此在更公平的條件下競爭，也就是承認了市場與競爭的作用。然而，這並非意味共產主義只是一場誤會，它的理想，仍永遠值得我們追求。正如尼·奧斯特洛夫斯基(Nikolay Ostrovsky)在感動許多共產世界青年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所說：

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首往事，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卑鄙庸俗而羞愧；臨終之際，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而鬥爭。」

### § 作為歷史轉捩點的俄國革命：

- ◆ 第一是國際共產運動的開展，共產黨人相信他們必將戰勝資本主義，而且認為「世界革命」為期不遠。1919年組織了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The Third International)。
- ◆ 迄1989年共產主義運動受到顯著的頓挫以前，共產主義勢力仍在大體上是不斷地擴張。此一方而係因共產主義一直以「科學的社會主義」姿態顛倒眾生，而且又有宗教性和道德意識。
- ◆ 在經濟發展方面，俄共所實施的計畫提供了另一可行的模式。在西方勢力的威脅下，世界各國均有求「富」和求「強」的努力，但是西方式的富強，有其漫長的歷程，不是任何國家可以做到的。俄國的經濟發展，顯示出一個農業國家可以在不依賴外資的情況下能夠迅速成長。於是世人認為，蘇聯的計畫經濟是一種可以與資本主義相競爭的體制。這對落後貧窮而又衰弱的國家，產生很大的吸引力。

### § 參考文獻

1. 列寧，《列寧全集》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 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臺北：時報，1993）。
3. C. L. 莫瓦特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1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1999）。
4. 王曾才，《世界現代史》（臺北：三民，1998）。
5. 愛德蒙·威爾森，《到芬蘭車站——馬克思主義的起源與發展》（臺北：麥田，2000）。
6.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1998）。
7. 莫理斯·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

8. 麥克里蘭(JS McClelland)，彭懷棟譯，《西洋政治思想史》（臺北：商周，2000）。
9. 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何懷宏、何包剛、廖申白譯，《正義論》（北京：社會科學，1988）。
10. 威爾·金里卡，《當代政治哲學導論》（臺北：聯經，2003）。
11. 海耶克著，張尚德譯，《通往奴役之路》（臺北：桂冠，1982）。
12. 詹姆斯·斯科特，《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4）。
13. 賀允宜，〈俄國共產革命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歷史月刊》144期（2000，臺北）。
14.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3卷4期（2001，臺北）。

## § 思考問題

1. 共產主義原本是具有偉大人道精神的政治學說，最後卻發展出滅絕人性的極權政體；號稱世紀社會改造，卻導致五百萬人死於對外戰爭，上千萬人死於內戰，近五百萬人飢餓而死。試思其原因為何？面對種種看似美好的政治主張，我們應如何避免理想逆轉的悲劇重演？
2. 蘇聯解體的原因與對世局的影響？
3. 俄羅斯總統普京曾表示：「我深信，蘇聯的解體是個巨大的國家悲劇。前蘇聯和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普通公民並沒有從蘇聯的解體得到任何好處。相反，這些人民在蘇

聯解體後遇到了很多問題。」這句話反映了前蘇聯各國遭遇怎樣的情況與隱憂？

### § 延伸閱讀

1. 戈·瓦·普列漢諾夫著，孫靜工譯，《俄國社會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2. 喬治·歐威爾著，孔繁雲譯，《動物農莊》（臺北：志文，1998）。
3. 喬治·歐威爾著，林淑華譯，《一九八四》（臺北：小知堂，2001）。
4. 赫胥黎著，黎陽譯，《美麗新世界》（臺北：志文，1974）。
5.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6. 巴斯特納克著，黃燕德譯，《齊瓦哥醫生》（臺北：遠景，1985）。
7. 弗洛姆著，莫迺溟譯，《逃離自由》（臺北：志文，1970）。

## 第十四講

# 公元1958年：電腦科技的創新

- 一、電腦的發明與演進
- 二、個人電腦王國的繼起
- 三、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
- 四、人工智慧
- 五、新型的經濟與社會型態
- 六、解開生命奧秘的生物晶片
- 七、對人文學的衝擊
- 八、文化工業
- 九、美國的資訊優勢國力
- 十、科技的反省——俱分進化

電腦可以處理各式各樣的問題，出人意表的事除外。

——James Magary

美國社會思想家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於一九八〇年出版未來學三部曲之二：《第三波》(*The Third Wave*)。他在書中預言未來世界，勾勒出未來人類的文明、政治、經濟、社會、工業等不同面貌。所謂的第三波革命是指：人類生產力經過三個重要階段的解放，分別是農業革命、



工業革命、資訊革命。人類是少數會製作工具的動物，而且工具越造越複雜，可是沒有任何工具像電腦一樣，對人類文明產生如此重大衝擊，如此廣泛改變人們的生活。沒有電腦，恐怕沒有網際網路，也不會有今天的資訊革命。

電腦於一九五〇年左右發明問世，讓人類在「資訊儲存」、「資訊傳遞」、「資訊處理」各方面有了劃時代的進步。早期電腦多半是用於科學計算、軍事用途，或者做為大型企業的資料處理。但隨著電腦製造技術的長足進步，使電腦的功能日漸提升而價格卻日漸下降。電腦已由政府機關、企業單位普及至家庭及個人，包含運用電腦製作文件，整理資料，利用電子郵件交換訊息，使用電腦多媒體功能提供教育娛樂等，使得電腦儼然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但如此，從每個人家中的電器用品（如電視機、冷氣機等）、汽車、鐵公路、航空等交通控制系統，到各類精密的科學儀器等，都內含小型的微處理器來控制。電腦幾乎是無所不在了。到了最近幾年，全球資訊網路(WWW)使得全世界構成一個無疆界的資訊空間，將人類結合成資訊網路的社會。本文將藉由回顧過去電腦的發展歷史，來了解這個二十世紀最要的發明所帶給人類的影響。

## 一、電腦的發明與演進

### （一）早期的計算工具

「數學為科學之母」。在人類歷史中，算盤應該算是最早使用的計算器具。隨著時代演進，產生持續不斷大量計算的需求。一六四二年，法國的巴斯卡(Blaise Pascal)以

齒輪轉動的方式，發明了一部可進行加減法的計算機。一六九四年，德國人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在巴斯卡的基礎上做了改進，發明能夠加減乘除的機械計算機。這兩部計算機，在機械的基礎上，完成了人類在計算工具史上的第一個夢想：計算機器。一八二二年，英國的查理士·巴貝奇(Charles Babbage)製成一部專用的差分機。一九三七年，英國的塗林(A. Turing)率先提出了塗林機的構想，進而奠定計算機的理論基礎。而他也提出了有關人工智慧的理論，引領計算機未來五十年的發展，他被世人尊為「計算機之父」。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工程師康雷得·路斯(Konrad Zuse)發展了一個計算器來計算飛機設計參數及飛彈彈道。而英國也在此時發展了一部電腦(Colossus)來破解德軍軍事密語。一九三九年，美國的艾肯(H. Aiken)在萬國商業機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ry, 簡稱IBM)的資助下，製造出以繼電器為基本元件的第一台數字式計算機，稱為馬克一號。這部機器於一九四四年完成，其架構仍與百年前巴貝奇的設想相同。只不過，原來巴貝奇設想的基本元件是機械齒輪，現在改成電機元件繼電器而已。當電子技術逐漸成熟，計算機有了長足的發展。一九四六年，美國軍方彈道研究實驗室與賓州大學摩爾學院合作開發了一套叫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的電腦，是世界上第一台電子計算機。最初是為了解決彈道計算問題而開發。剛結束的二次世界大戰，因為有了空中戰機，目標移動速度越來越快，炮兵必須有更快的計算工具。ENIAC還是採用巴貝奇所提出的架構，只是將元件更換成電子真空管而已。也就是說，原本的機械動作，現改用真空管；透過電流進行傳導，以求取

更快的速度。自採用電子零件做為基本元件以後，計算機正式進入了電子時代，成為真正的電子計算機。

## （二）電子技術的革新

電腦的世代劃分，一般是以其製造元件為標準。第一代電腦，是真空管電腦。第二代則是電晶體，第三代是積體電路，第四代則是以大型積體電路，也就是晶片製成的電腦。一九八一年，日本傾全國之力，挾機械工業、資訊製造的雄厚實力，擬在十年內，以超大型積體電路為基礎，設計出具備人工智慧及自然語言的電腦。由於基本元件有別於第四代電腦，且具備人工智慧，故被稱為「第五代電腦」。

一九四七年，美國的貝爾實驗室發表電晶體這個重要發明。它是電子元件，但卻比真空管更小、更快，也更省電。因此，迅速取代真空管。一九五三年時，全世界只有一百台電腦左右。

第三代電腦大約出現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七一年之間，主要是由於一九五八年德州儀器公司發展出積體電路(IC)技術。積體電路可以將許多元件結合在同一個晶片裏，大大縮小了電腦所占的空間。所以此時除了大型主機（如IBM 360）外，迷你電腦也開始生產並在小型企業中使用。此後，電子計算機便朝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超級化，並朝科學化、軍事化發展。另一個則是迷你化、小型化，朝商用化發展。

大約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到現今的第四代電腦，則是用大型積體電路(LSI)來製造電腦。在一九七一年，英代爾公司進一步利用積體電路技術將大量的電腦元件放在同一個

FORTRAN、LISP。這些高階程式語言進一步地使用符號、數學運算式來取代低階的機器語言。於是，程式設計這種新興的行業就此誕生，整個軟體工業也於此時開始萌芽。而造成一股風潮的JAVA語言，則是於一九九〇年由葛斯林(Gosling)所創造的。它原先是用來控制小型電子儀器或家電，不過隨著網際網路及全球資訊網(WWW, World Wide Web)的盛行，再加上語言特性的良好，使得JAVA成為網際網路上的主流程式語言。

此外，作業系統的觀念也慢慢地建立起來，並廣泛地使用在之後所發展成功的電腦系統中。蘋果公司於一九八四年推出了麥金塔電腦，圖形化使用者介面漸漸地運用在電腦當中。隨後微軟公司於一九八五年發行了第一個視窗版本，一九九〇年發行了視窗3.0作業系統，廣泛地普及於個人電腦中。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九八〇年代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就已發展了X windows系統，在圖形工作站中使用。由於它的開放原始碼，使它成為大部分以UNIX為基礎的系統中的標準圖形，甚至目前當紅的Linux也是。

## 二、個人電腦王國的繼起

微電腦由於價格低廉體積小，漸漸地普及起來。一直到了蘋果二號的出現，它以硬體架構公開，吸引了全球軟體設計公司投入。這也就是後來的個人電腦，本來只是工程師的玩具，沒想到，卻受到非專業人士的歡迎，最後更掀起了全球學習電腦的熱潮。蘋果電腦稍後關閉了開放架構的大門。全球的軟體開發商，必須付費取得蘋果電腦的授權，才能開發屬於蘋果電腦的軟體。IBM趁勢宣布個人

電腦將採開放架構，歡迎全球廠商加入個人電腦聯盟。一九八一年，IBM選了兩家規模難以與其比擬的廠商，將其產品組合成個人電腦向全球發售，使個人電腦普及到學校、小型企業，甚至個人。據估計，一九八一年個人電腦大約有兩百萬台。十年之後，全世界已有六億五千萬台個人電腦在使用。個人電腦的權杖由蘋果電腦轉到IBM手上。

由於個人電腦強調架構公開，軟體自由發展。初期肥了硬體廠商英特爾，後來則是操作平臺的微軟。之後，兩家公司聯手壟斷了個人電腦市場迄今。微軟將原來硬體設備的功能，改用軟體來實現。將文書處理、試算表、資料庫、簡報軟體整合成辦公室的套裝軟體。挾著系統平臺的優勢，加上定位清楚，用法一致，資料互通，果然大受歡迎，成為繼微軟視窗系統之後，另一個大賣的軟體。後來，網際網路盛行，瀏覽器、電郵收發、即時通訊等軟體大行其道，微軟也將之整合進入視窗作業系統。而幫助人們殺時間的影片、廣播、音樂播放、圖片、電玩引擎，微軟或自製，或外購，將這些各式各樣的軟體，全數整合進入視窗作業系統。微軟憑著系統平臺的優勢，假藉保障使用者權益的不正當競爭方式，有效地打擊了許多強而有力的競爭對手。比爾·蓋茨(Bill Gates)也隨著微軟痛擊對手及股票價格上揚，成為全球首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美國地方法院法官湯瑪斯·傑克遜(Thomas Jackson)公布關於微軟公司壟斷事實的調查報告，稱微軟公司對「視窗」作業系統的壟斷性銷售行為損害了消費者、電腦生產商和其他相關公司的利益。二〇〇〇年四月三日，傑克遜法官在華盛頓宣布，微軟違反美國的反壟斷法。根據美國法庭的裁決，微軟必須：1. 對外

公布一些編程密碼和資料，以供其他軟體發展廠商編寫可以與視窗系統相容的軟體；2. 不得對那些選擇使用非微軟產品的電腦廠商進行報復；3. 其所銷售軟體必須有一致性銷售執照條件；4. 必須允許電腦廠商與軟體用戶去除微軟視窗固定圖像及一些運作職能。美國司法部說裁決對廣大消費者有利，業界關注的焦點則是任何軟體只要被壟斷，對國家社會及產業發展會有負面影響。

### 三、網際網路與電子商務

九〇年代，全球資訊網的發明與普及，則是結合印刷、排版等平面、立體媒體，以及有線、無線通訊的傳輸技術，所發現的媒體新大陸。新媒體的到來，當然也帶來新的時代。在這個資訊新時代，人們有如當年的哥倫布，透過瀏覽器，在網海中進行探索。

資訊革命意外地始於一九五〇年代，當時少數實驗室機型專用於數學運算。六十年代分時電腦上市，每台電腦由十個人輪流使用，以分攤昂貴的電腦成本。各所大學和其他組織馬上就發現，這樣作法的最大好處不是省下來的金錢，而是共用機器的每個小組內部，透過電子郵件和文件傳送而分享資訊。七〇年代先進研究計畫署網路(Arpanet)問世，把十組分時機器連線；這些機器多置於大學。同樣地，這麼做的目的是分攤運算成本，實質的好處也是分享資訊的社群擴增。這一次，社群擴張到數千人。八〇年代個人電腦推出，千百萬人買得起電腦，放在辦公室工作和家裏玩樂。同一時間出現的乙太網路(Ethernet)，能把數百台個人電腦連結成區域網路，主要置於組織中。網際網路

連結電腦網路，滿足了連結數千個區域網路日增的需求。這些變化使得透過電子郵件和檔案傳送而分享資訊的社群增加到幾百萬人。到了九〇年代，網路化的進展似乎遲滯不前，但最大的變化卻於此刻降臨——全球資訊網(WWW)以連線電腦軟體應用的形式到來。不論在數量或品質上，它都對穩定成長的連線使用者社群造成衝擊。創造和瀏覽網頁的風潮席捲全球，二十世紀結束時，連線使用者的人數因此激增到三億人。人們開始體驗資訊市集令人既敬且畏的社經潛力。

在後個人電腦時代，美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擊建資訊高速公路。國防部轄下的高等研究計畫署資助一個網路研究計畫，目的是讓不同廠牌的電腦系統也可進行信息傳遞。方式是透過制定統一的協定，不論是有線或無線，不同的電腦系統均需透過這個協定來收發信息。一九八〇年開始，美國國防部將其電腦系統開始轉換，全數採用傳輸控制協定／網際網路協定來交換信息。在這個轉換計畫中，將網絡分成兩個部分，供軍事專用的網路，改稱為軍事網；另一個則供學術單位研究的網路，則沿用高等研究計畫署網路之名。雖然，兩個網路傳遞路徑並不相同，卻可相互連結，達成美國國防部的要求。這個計畫一如郵遞服務、電話服務、廣播服務、電視服務，強調不分城鄉國邦，不分男女老幼，都可透過簡易、方便的方式上網。更重要的是，這是個沒有時間限制、與全球接駁的虛擬世界。

高等研究計畫署網路用戶的功能變數名稱，是軍方的mil、非政府組織的org、政府機關的gov、教育單位的edu、網路技術的net等五大類。不過，一直要到達康大軍.com進入，我們熟知的全球資訊網方才成形。電腦網路化、電子

郵件、新聞資訊成為商業行為的一個重要的部分。早先由美國國防部支援的網際網路，後來改由美國商務部接手。在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於一九九三年全面推動國家資訊基建計畫，極力拓展數位頻寬，發展網際網路技術。並將之定位為新媒體，又將文字、聲音、影像大量數位化，置於網絡供人傳載，稱之為多媒體平臺，舉凡書、音樂、影片都成為電子商務的第一波功臣。美國亦藉著網路技術的蓬勃發展，從日本人手中再次奪回經濟霸主的世界地位，進入少見的經濟擴張時期。網際網路所殘餘的軍系色彩便徹底被商業取代。透過網際網路做生意的電子商務相當活躍。經過網路交易買賣，不但迅速、方便，而且買賣雙方都有現成的電子記錄，會計部門、收發部門、存貨控管、市場分析都全部聯成一體。有了電子商務，商店的顧客對象大大地擴充，消費者的習慣跟著改變，作廣告的方法也跟著改變。網際網路受到全球人們熱情的擁抱，美國股市的那斯達克指數，與網際網路相關的公司，股價大幅飆升。科技泡沫在不久後崩盤，但網際網路並沒有離我們而去，日常生活愈趨電子化、虛擬化。雅虎、亞馬遜、電子海灣、孤狗，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網路創業神話。

## 全球資訊網

名為「全球資訊網」的全球超文件系統，是由牛津大學物理學家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在一九八九年於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工作期間提出。他的目標是要讓散居各地的人能共同研究大型問題。到了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他把這個能創造、搜尋、擷取超文件資料的軟體，開放給一群歐洲物理研究中心的科學家使用。在伯納斯李的系統



裏，他設計出超文化標記語言(HTML)，這是用來組織及呈現超文件的文字圖片等元件之用。他也同時界定了超文件傳輸協定(HTTP)。這個HTTP協定是一種讓所有電腦經由網路都能查詢超文件的標準格式。為了查詢文件，他又創造了超文件的位址系統——通用資源位標(URL)。一九九一年夏天，伯納斯李將他這三件一套的程式送上網際網路，也創造出一個全球通用的資訊空間。當人們看到全球資訊網所蘊藏的龐大利益時，大多都想據為己有。柏納斯李關注的則是，如何才能令全球資訊網成為公有共用的資源。他像個專業的使用者，定義明確的資訊規格，並確保這份規格書不會變成個人私產，且能主動、公開地分享給全世界需要的人。而這份規格書，就是全球資訊網不可或缺的超文本標記語言的雛型。

## 瀏覽器

一九九五年，七大工業國在布魯塞爾召開的會議，正式將網際網路這個科技議題列入討論，網際網路更為人所知。爾後，網際網路的各項通訊協定，便交由瀏覽器來整合。人們必須使用瀏覽器才能閱讀全球資訊網上的所有文件，並且輕易地從某一個網頁跳到另一個網頁。伯納斯李把瀏覽器的創造留給任何有興趣的程式設計師，只要這些瀏覽器與他設定的標準相容。在位於香檳城的伊利諾大學超級電腦中心工作安卓森(Marc Andressen)完成一個設計優美、實用好玩的瀏覽器程式魔賽克(Mosaic)，能讓使用者用滑鼠指指點點，叫出全球資訊網上的文件。這個程式在一九九三年一月免費推出之後，立刻帶來一群狂熱的信徒。安卓森和他的一群同事成立網景公司(Netscape)，並加速趕

工，以便製造更好的瀏覽器。而全世界最大的軟體公司——微軟，設定最優先目標準備分食網景的一杯羹，一九九五年開始，開始接二連三迅速推出新版網際探險家(Explorer)瀏覽器。

從此以後，網路使用者和網站就像雨後春筍開始繁衍增生。魔賽克軟體剛出現的時候，全世界只有五十台電腦成為提供網路文件的主機。該年八月，安卓森為麥金塔和微軟視窗系統推出了免費魔賽克軟體。到了十月，已經出現了五百多個全球資訊網伺服器。到了一九九四年六月，網路伺服器的數目增加到一千五百個。一年以後，公司、報紙、雜誌、大學，以及政府機構，在成百上千台類似的電腦上提供更多個別的網站。然後，在一眨眼之間，成千上萬個網站就此冒出來。

#### 四、人工智慧

電腦的發明目標之一就是媲美人腦，希望電腦有朝一日能夠像人一樣，具備思考、學習的能力。自電腦問世以來，人類希望電腦能夠代替人處理所有惱人的事情；有時候，卻又怕它樣樣學會了，倒過頭來取代人，欺負人，甚至傷害人。這種矛盾的心理，在西方尤為明顯。

一九四〇年，發明位元的克勞德·夏隆(Claude Shannon)，在他的論文中，將布林代數應用在計算機科學。因為他想建造一部能模仿人類思考的機器，這是個難度很大的挑戰，所以他先將目標界定在一部會下棋的機器。一部能夠下棋，最終能在棋力上勝過人的機器，表示已具有優於人類的思維能力。一九五六年，夏隆率先將人工智慧

以下棋的方式來展現，另外也發展了機械鼠走迷宮的遊戲，證明電腦可以透過學習、回饋、試誤等方式來提昇判斷品質。他提出的論文、理論與研究成果，令他成為這一學科的開山鼻祖。

一九五八年，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發明程式語言Lisp之後，他隨即投入教導電腦進行嘗試推理的重要研究中。這目標看似簡單，但是問題重重。常識推斷需靠經驗來獲得，但是經驗有可能是錯的，所以需要不斷修正。對於人類這是簡單的事，但對於電腦卻不然。艾得華·費根本(Edward A. Feigen-boum)與他的研究群在一九六五年發展了第一套專家系統。這系統內含一個大資料庫，龐大的質普資料與化學專家的規則。這些程式顯示了如何建構專家系統，並可以加以創造應用於多種工業上，從飛航控制計畫到借貸計畫等決定。而後來除了以資料庫來推論外，人們還想出以模擬人類腦袋的方法來做推論。這就是「類神經網路」的起源。還有薩爹(Lotfi Zadeh)在一九六五年提出的模糊理論(Fuzzy Theory)現今被廣泛應用在各類型的裝置控制。還有一種演算模式叫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是由約翰·荷蘭(John Holland)提出。這理念是由達爾文(Darwin)的生命演化、適者生存而來。他將問題的各种解答比成微生物個體，彼此交互作用而產生出最優越的個體，也就是最後的答案。

八〇年代，日本傾全國之力，提出令舉世震驚的研發計畫：具備了人工智慧的第五代電腦。這個計畫從硬體到軟體，無所不包，嚴重地挑戰了美國在電腦工業的地位。到了九十年代，日本正式宣布放棄這個計畫。

進行這個課題的研究，不論派別，都必須面對一個基

本問題：人真的已經瞭解人了嗎？真能知道人的智慧與能力是如何產生的？科學家認為，智慧開始於感官接受刺激訊息，辨識後，得到認識、感受，然後留下概念；再透過語言、文字與他人溝通後，得到回饋。並在不斷模仿、學習後，進而創造、思考，這才使得人類與其他物種產生明顯的不同。科學家對整個智慧階段進行全面、廣泛的研究。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就所發表的成果來看，並沒有人清楚地指出何謂智慧，且採用一套精簡有效的方式來表達。

由於人工智慧是電腦科學界的最後堡壘，但全球菁英多次攻堅都無功而返。對於這個難題，學人們真是又愛又恨。這將是電腦界的最後一頂桂冠，人人意欲得之。而若真的圓夢了，一定會造成人類的恐慌。人們自忖，大權是否就此旁落？或者全人類將落入少數人的控制，成為他們的奴僕？請看一段對話：

赫爾(Hal)，請把艙門打開。赫爾，你聽到我說話嗎？

我聽到，戴夫，可是我不能那麼做。

為什麼？

這次的任務太重要了，我不能讓你破壞它。

赫爾，你在說什麼？

你和法蘭克密謀要拉掉我的電源，我不能讓此事發生。

赫爾，你從哪裏得到這印象？

雖然你們在艙裏想方設法使我聽不到你們的聲音，可是從嘴唇動作我可讀出你們談話的內容。

對話中的赫爾並不是人，而是發現號太空船上的中央電腦，它不只能導航太空船、與太空人下棋，尋找木星周圍的外星人，最後還能設計殺死船上的太空人。好萊塢導演

庫柏利克(Stanley Kubrick)在一九六八年把克拉克(Arthur Clarke)著名科幻小說《二〇〇一年太空歷險》(2001: a space odyssey)拍成電影，這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這個能看能聽能想，又具有感情的赫爾(HAL 9000)型的超級電腦，成為許多人心目中未來電腦的模型。討論人工智能對人類的影響，科幻電影、小說比比皆是。電影《魔鬼終結者》系列，機器人則與人類不停地爭鬥，人類起而反抗組成軍隊，機器人則矢言要消滅反抗軍。《駭客任務》則描述電腦母體將渴望自由的人們視同「恐怖分子」。諸如此類，都極端鮮明地表達了人們的憂慮。而這些陰影隨著研究的突破，更加揮之不去。

IBM研發的「深藍」電腦在一九九七年五月的公開比賽中擊敗世界棋王卡斯帕羅夫(Garry Kasparov)，創造電腦戰勝人腦劃時代紀錄後，許多人又擔心起來，擁有高等人工智慧的Hal是不是快出現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曾召集一群電腦專家，以赫爾為例子探討電腦科技各領域的發展。研討內容最後收集在《赫爾的傳說：二〇〇一年夢想及現實中的電腦》一書，人工智慧專家斯多克(David Stock)總結各家看法之後在總論中說：

二〇〇一年快到了，大家或許會問，為什麼還未實現造出赫爾的夢想？廣義來說，在電腦發音、電腦硬體、電腦下棋及電腦任務策畫方面，我們甚至已超越 Hal 的水準，這些都是範圍比較狹窄的科技專業。可是在不易界定的語言解讀及常識方面，我們比 Hal 落後太遠了。或許我們應該問個非科技的問題，大家是否要支持類似研究計畫去發展這類人工智慧？

## 五、新型的經濟與社會型態

我們已活在由縮小中的電腦及擴張中的通訊所建立的新經濟中。這個新經濟有三項明確的特徵：它是全球性的；它偏向無形的事物——理念、資訊和關係；而且它的一切組成因素緊密地交互連結。這三項屬性產生了新型的、根植於無所不在的電子網路的市場和社會。新興的硬體、軟體和通訊標準重塑商業和消費行為。「網路工作型態」(Web Workstyle)和「網路生活方式」(Web lifestyle)這兩個用語，強調員工和消費者大量應用數位連結所帶來的影響。十年之內，許多人在工作或家中，都會常態性地使用個人電腦，習於使用電子郵件，上網，隨身攜帶內含個人和商業資訊的數位配備，能讓我們和其他系統及個人隨時保持聯絡。新的消費裝置會出現，幾乎所有的各種資訊——文字、數字、聲音和影像——都將數位化。日用的裝置如水、電錶、保全系統和汽車也能連網，隨時報告其使用度數和狀況。每種數位資訊的應用，都即將進入「轉折點」——消費性的使用突然大增時，生活方式和商業世界，都將為之徹底改變。有了網路，醫生可以經過網路看到一個在遠方的病人的病歷，看到他的X光照片。幾個在不同地方的醫生可以同時為一個病人會診，可以遙控不同的儀器同時為一個病人開刀。

## 六、解開生命奧秘的生物晶片

微處理晶片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每秒數百萬次的運算能力，將人類帶向資訊世紀。二十世紀末，

微處理晶片上遇上了生物科技，創造出更驚人的後代——生物晶片(biochips)。它是應用到生物科技方面的晶片，製造過程和一般電腦晶片類似。但是最大的不同是生物晶片負載的不是電晶體，而是數萬顆極微小的化學反應器，能夠每秒進行數萬次的生化反應。就是因為如此驚人的速度，生物晶片將使破解人類基因密碼的工作，加快千倍以上。將來，醫生可以用裝有生物晶片的儀器，迅速找到致癌的基因；新藥的開發時間，可以大幅縮短。甚至，新生命還在母體，就能預測長大後的身心狀況。生物晶片企圖幫助人類解開基因之謎，徹底改變目前的醫療方式。甚至，人類得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這場跨世紀的科技創新，主角不只生化廠商，還包括半導體公司。

## 七、對人文學的衝擊

電腦和網路的結合，成為極有效的遠距教學的工具。大量的課程資料可以存在伺服器裏面，學生不出房門在網路上上課。人們也建立「電子圖書館」，把書本、期刊和其他影像資料放在網路上。「數位圖書館」不單是平面的、靜態的，除了文字圖片之外，可以有立體的影像、電影、聲音，這些資料經過高速的網路讓任何地方的讀者使用和瀏覽。它使得傳統的研究方式、研究領域甚至於思考模式都要作大幅的調整。舉例而言，網路搜尋引擎技術的成熟，使得過去皓首窮經的人文學者，可以省略許多機械性的文獻搜尋的工作，而進一步從事更具有創發性的研究。它也使得過去難以處理的龐大數據資料可以運用電腦做快速的處理，進而從統計分析中汲取人文學的養分。如歷史學家

可以利用數學的要素分析、定量變數分析等方法對史料進行很精細的分析，視野很廣，但也容易造成研究不夠深入。因此在獲得益處的同時，人文學卻面臨素質低落的危機。由於電腦複製、排版與編輯的速度極快，過去得來不易的書籍，可以在短時間內大量的產生。

## 八、文化工業

電腦加上廣義媒體電訊科技的發展，固然為人類生活帶來許多便利。但於此同時，也對精緻文化帶來致命的傷害。關於這一方面的問題，以左派史學家的批評最為猛烈，以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文化工業理論為代表。阿多諾認為二十世紀媒體科技的進步（網路、電訊、媒體），表面上造成了大眾文化的蓬勃發展，這種現象看似人民活力的展現，但事實上，卻只是一種受到資本家操縱的文化工業。這個文化工業的主要特徵，便是在資本主義原則的支使下，一切的文化產品變得通俗化、規格化，完全失去了內在的生命力。配合上大眾低俗化的傾向（不單創作變得容易，閱讀也變得簡單，如網路文學、手機文學等），更造成人文作品價值的低落。譬如傳統電影在電腦動畫的侵蝕下，已經逐漸失去原有的藝術內涵，而趨向於感官的消費。左派學者痛心疾首，右派學者也同感哀愁，因為電腦技術所帶來的速度與影響，同樣也威脅右派所珍視的傳統倫理與價值。譬如電子信件與電子資訊的快速性，破壞了過去文化智識與人際關係的傳統模式，使得人們誤以為智識的吸收與感情的建立，是如此輕易，以致於也如此脆弱。這種不分左右同聲一嘆的現象，毋寧是一個嚴重的警



## about history

人類都有想對過去了解的願望，想要從歷史中找出個人及大我的意義。但歷史一去不復返，史實又浩瀚無邊，如何編一本在有限的時間中能讓讀者增長見識的教材並不容易。本書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中促成關鍵性轉變的事件或人物中，選出最重要的十四件，整理出其來龍去脈及其與今日的相關性，最後再加上一講，對此進行反思，因而有「歷史的轉捩點」的出現。

歷史是吾人向前邁進的動力來源，有無窮的能量待我們開發及動員，以完成我們個人小我及大我的目標，而歷史的轉捩點即是啟動這些能量的關鍵。希望此書能增進讀者的歷史知識，更希望藉此能學得經驗，汲取處理生活中各種問題的力量與智慧。

ISBN 986-00-6604-3



00360

9 789860 066043

